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邁向酷兒修復：陳思宏小說的情感戰術

Toward Queer Reparation:
The Affective Tactics in Kevin Chen's Novel

洪祥庭
Hsiang-Ting Hung

指導教授：鄭芳婷 博士

Advisor: Fan-Ting Cheng, Ph.D.

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May 202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邁向酷兒修復：陳思宏小說的情感戰術
Toward Queer Reparation: The Affective Tactics in
Kevin Chen's Novels

本論文係洪祥庭（學號R10121001）在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114年1月15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on 15 (date) January (month) 2025 (year) 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HUNG HSIANG TING (name) R10121001 (student ID) 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黃乃芳 洪祥庭 張利群
(指導教授 Advisor)

系主任/所長 Director: 張文蕙

謝辭



當下，我幾乎完成這本碩士論文，僅差在這篇謝辭而已。在真正敲下這篇謝辭前，我早已預想今天的到來，當初覺得，若沒有寫個三十頁以上，完整地感謝幫助我的人及完成這本碩論的自己，似乎是很划不來的。但三十頁似乎又真的太多了，我會盡量寫，盡量感謝一路上以來的恩情、親情、友情及愛情，以紀念這本以「情感」為研究主軸的碩士論文。

看著寫完謝辭就要立刻搭捷運往中山站買新包包的我，首先，就得感謝我的父母，洪明德及陳宛妮。在我做最後的論文修訂時，正好碰上媽媽因為子宮肌瘤而必須將內生殖器摘除，雖然並不是太嚴重的手術，但我真的非常害怕，害怕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會因為一丁點閃失而離去。我日夜向蓮花生大士祈禱，搭捷運、穿越校園、吃飯時，都唸誦著蓮師七句祈請文及心咒，時刻希望能將功德迴向給媽媽，讓手術一切順利。我僅以這段小故事來回應對於父母的感謝，沒有你們，就沒有洪祥庭，也沒有洪祥庭所感知到的一切。你們的日夜勞動及關愛都塑造著我的所有，無微不至的「媽媽覺得冷」也是在人生中那宛如情感修復的動能。以此寥寥數語，感謝永遠無法止盡的愛。感謝我的爸爸，由於我們家是開豆花店的，媽媽主要負責接待客人，爸爸負責外送，因此從小上下課都是由爸爸接送。這件事一直持續到我上大學後才中斷，真的想不到18年的青少年生活如此迅速，我依然懷念住在公園路的生活，這絕對是非常重要的。感謝我的妹妹，我和妹妹就讀同一所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但她命理有財庫，真的非常會存錢，常常在我戶頭剩下17塊時，贊助我這個愛花錢的哥哥生活費。以上，誌謝我最愛的家人。

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鄭芳婷老師。如同家人一般的叮嚀遍及生活及學術上的一切。回想起碩一還在中文所時，若不是芳婷老師的接洽，我完全無法如願進到臺文所就讀，這本碩論的產生要歸因於與芳婷老師的緣起，我銘記於心。老師以形塑形的指導方式，最大程度地引領我完成這本碩論，讓我在以自己想



法為核心的角度，不斷地雕塑稜角，一筆一刀地創製出屬於我的思維模式及我的態度。我很驕傲自己擁有芳婷老師的指導，也以身為老師的學生為榮，這份感謝或許也只能以愛來形容了。

感謝我的同學及朋友們，感謝博班的學長們，皓棠、士銘及智帆，擁有如同土地公般的學長是我最大的福報，充滿鵝黃色調、溫馨氛圍的332研究室，承載著我們的集體記憶，學術與生活流串在彼此之間。感謝與我共同修課的學弟妹們，由於我是轉所的緣故，所有的必修課程甚至大部分選修課都是與他們一起上的，頊姍、楷博、軒羽、芷琦、冷樺、池內，謝謝你們填滿我的研究所生涯，無論是在國青、洛杉磯甚至紐約都有留下我們的足跡，這些絕對也是撐起這份情感研究的情感。感謝我的學術好夥伴宗洧及曉元，是你們的鞭笞及修復使我得以逐漸建立屬於自己的體系。感謝無邦學舍的夥伴們，不僅讓我接觸不同領域的思考，也讓我更熟悉師大及師大夜市。

感謝我的人生摯友，Lulu、朱育瑩、程閔瑜、劉思妤，以及還在聯繫的高中朋友及大學朋友，沒有一一羅列出你們的姓名是怕你們害羞，也擔心影印費吃光我的晚餐錢。只能偷偷告訴你們，我還記得拿到書卷獎要請客這件事，每個人25塊的扣打。在一切的生活、政治、法律、文化、歷史、文學、工作、生涯、愛情、友情及親情上，或是我根本地統括為生活，你們幾位都是我人生中微乎其微的朋友。無論是一起討論生活上的雞掰郎、一起罵小草的無知、國民黨的邪惡、討論好看的小說、亂噴貴死人的香水還是好吃的食物，甚至前年說要去，到現在根本沒有影隻的日本，我其實都記得。另外，我的部分法學知識也來自於朱育瑩，論文中關於同婚的法學論述，必須感謝他，放假回臺中的記憶也大多建立在與Lulu出去玩之上。感謝我的前男友承緯，除了那段日子的陪伴外，你也是唯一一個見過我指導老師及參與我的研討會的前男友，這份碩士論文的英文摘要也出自你的潤飾。這都是我學術生涯以外最珍惜的情感，感謝你們，也愛你們。



感謝我的臺北好夥伴，博淮及昆，我的朋友真的不多，你們是我除了同學以外少數的朋友，謝謝你們在沒有人陪我吃飯的時候出現。

感謝我的口試委員陳佩甄老師及張俐璇老師，精闢又歡樂的口考使這本碩論及我的生涯更加豐富，佩甄老師對於情感理論的獨到、俐璇老師對於文學史細緻，能邀請你們擔任我的口考委員，真的是日夜燒香的功德。感謝在人生中給予一切啟發及時光的老師們，劉文老師、謝欣芩老師、張文薰老師、楊雅儒老師、蘇碩斌老師、曾秀萍老師、汪宏倫老師、李玉珍老師、周婉窈老師、陳昭如老師、葉德蘭老師、劉伊涵老師、翁家傑老師、劉雅詩老師、洪淑苓老師、梅家玲老師，以及我大學時期的大專生計畫指導老師余育婷老師。感謝臺文所的助教們，秋蘭姐及詠萱，是你們的大力鼎助，才使得這本碩論得以產生。

我的人生主要由親情、友情、愛情、文學、音樂、香氛及宗教組成。我已經花費了整整一百多頁書寫我對文學的愛，也用了26年的人生實踐親情、友情及愛情，現在我必須感謝我的宗教信仰。我的宗教信仰是一般人較少接觸的藏傳佛教，從國中開始接觸的上師，康薩仁波切，接受《龍欽寧體·苦自解觀音秘密成就法》的灌頂，前陣子的仁珍千寶仁波切，並授予《更深如意寶之庫藏部·祈願任運內成如意寶序列莊嚴》，一路至最新接觸的蘇南給稱仁波切，並授予《意伏藏度母深滴·聖綠度母曼達儀軌二糧心要》的灌頂。我相信因果，知道這是累世因緣的具足，才使得我能在此生中修習密法。每天起床刷牙、洗臉、化妝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供佛，供養水、燈及香，數十年如一日。感謝釋迦牟尼佛、蓮花生大士、阿底峽尊者、宗喀巴大師、四臂觀音、文殊菩薩、綠度母、吉祥天母、獅面空行母、北港朝天宮的媽祖以及大龍峒保安宮的保生大帝、狐仙堂的狐仙大仙，還有我的狐仙夥伴淇淇、漂漂、沛沛。在我人生最困頓的時候，我時常跪在自己的小壇城前，祈請四臂觀音加持，讓我沒有畏懼，斷除內心的煩惱，謝謝你，觀世音菩薩。



要感謝的人、事、物及地方還非常的多，感謝提供我閱讀及書寫論文的半路咖啡、潘寓咖啡及Sugar Man，感謝我現在的住所，我的整個研究生生涯都在這裡過夜。感謝那些傷害過我，也讓我傷害過的前任們，祝福你們找到更好的另一半。

最後，我還是得感謝一下洪祥庭，我是個報喜不報憂，有苦不說出的人，強調不要內耗，要修復的人是我，但最內耗、最偏執的人也是我。在愛自己的表面上，很可能是最不放過自己的一體兩面，有幸人生貴人相助，一路順遂，無風無浪，平安喜樂。希望未來的旅途同樣順遂，也希望臺海無戰事，世界和平。謹以此簡單的謝辭交代短暫的人生。

2025年5月 乙巳蛇年 於永和 永和路二段

摘要



在同婚合法化後的臺灣語境中，酷兒敘事逐漸面臨從「婚姻權的訴求」轉向「情感政治」的思維重整，陳思宏小說於此語境中所開展的情感書寫，既揭露創傷歷史的持續效應，也形構另類親密關係與倫理想像的修復實踐。本文以陳思宏的「夏日三部曲」：《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與《樓上的好人》為核心材料，分析其中所展演的「修復」如何作為一種充滿情感的行動：它不指向健全且不依循線性修復的邏輯，而是經由悲傷、痛苦、幻滅等情感狀態的層層堆疊，生成酷兒主體與群體在情感層面的生存戰術。

首先，本文從《鬼地方》切入，提出「集體酷兒修復」的概念，論述記憶如何在《鬼地方》中作為承載創傷與重組情感連結的關鍵場域；接著，延續打破「創傷→修復→和解」的和解時間性邏輯，繼而聚焦《佛羅里達變形記》，闡釋小說中的主角如何於地景流變與身體變形中展演「酷兒生存戰術」，成為在殘缺與斷裂中發展出足以棲身的倫理形式與感知位置；最後考察《樓上的好人》，進一步提出「非正典修復」的閱讀途徑，揭示小說如何通過對異性戀機制與正典價值的抵抗，發展出一種串連非正典主體且拒絕和解的生存戰術與倫理姿態。

本文論證，陳思宏的小說，並非旨在邁向一種健全的生命樣態，而是在歷史創傷、親密倫理崩解的情境中，召喚一種「集體創傷的修復」倫理。透過集體記憶的召喚、異地生存的實驗、與非正典關係的串連，小說中的主體性呈現出不指向穩定自我與情感終點的動態模式，在社群幻滅、家庭失語等多重關係中，尋求片段性的共感與鬆動性的連結。酷兒修復之於當代臺灣，既是一種對異性戀親密秩序的質疑姿態，更是一場對於「進步敘事」的感性抵抗。由此，本文希冀開拓酷兒文學研究、情感研究與當代臺灣主體的情感政治潛能。

關鍵詞：後同婚、情感情理論、修復式閱讀、酷兒小說、陳思宏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st-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queer narratives have increasingly shifted from demands for marriage rights to a reconfiguration centered on the politics of affect. Within this evolving discourse, Kevin Chen's oeuvre unfolds a mode of affective writing that not only unveils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historical trauma, but constructs alternative models of intimacy and ethical imagination through practices of affective repair. This thesis focuses on Chen's summer trilogy—*Ghost Town*, *Florida Metamorphosis*, and *Die Guten Menschen von Oben*—to analyze how “repair” is portrayed not as a path toward wholeness or linear healing, but as an internally conflicted and affective proces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sorrow, pain and disillusionment, these texts provide tactics of affective survival for queer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his thesis first engages with *Ghost Town*,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queer repair” to examine how memory functions as a crucial field for garnering trauma and reconfiguring affective connections. Chen’ novels then challenge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logic of “trauma → repair → reconciliation” by turning to *Florida Metamorphosis*, where the protagonist performs the “queer tactics of living” through the becomming of landscapes and bodily transformations, thereby developing an ethical mode of existence. Finally, the analysis turns to *Die Guten Menschen von Oben* to propose a reading of “non-canonical repair,” revealing how the novel resists heteronormative mechanisms and dominant canonical values to articulate a living tactic and ethical stance grounded in the alliance of non-normative subjects and a refusal of reconcil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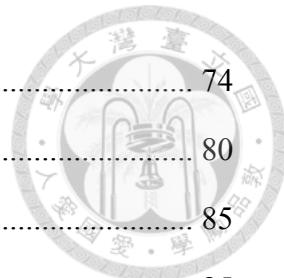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Kevin Chen’s novels, rather than envisioning a ‘wholesome’ life, articulate an ethics of ‘collective trauma repair’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xts of historical trauma and the collapse of intimate ethics. Through the invoc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experiments in displaced modes of living,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non-canonical relationships, the subjectivity portrayed in these narratives is not oriented toward a stable self or emotional resolution, but instead unfolds as a dynamic mode of being. Amid fractured communities and silenced familial ties, these queer subjects seek fragmentary moments of resonance and flexible forms of connec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queer repair serves not only as a critique against heteronormative regimes of intimacy, but also as a sensuous form of resistance to dominant narratives of progress.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endeavors to excavate the critical potential of queer literary studies, affect studies, and the emotional politics of Taiwanese subjectivity.

Keywords: Post-same-sex marriage, Affect theory, Reparative reading, Queer novel, Kevin Chen

目次



謝辭.....	I
摘要.....	V
Abstract.....	VI
目次.....	V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自由與困境：在同婚通過時.....	1
一、同婚通過後的酷兒困境.....	2
二、文學作為一種生存策略.....	9
第二節、何謂情感修復：當代情感研究的回顧.....	24
一、情感與修復理論回顧.....	24
二、情感與修復理論在臺灣的挪用.....	30
第三節、臺灣酷兒文學與情感修復的碰撞.....	35
一、陳思宏在酷兒文學的定位.....	35
二、酷兒修復：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	37
第四節、章節架構.....	40
第二章、不願弭平的創傷：《鬼地方》的集體酷兒修復.....	44
第一節、前言：小說作為集體記憶的載體.....	44
第二節、集體記憶的修復性.....	48
第三節、《鬼地方》中的創傷事件與創傷狀態.....	52
第四節、發展集體酷兒修復.....	57
第五節、小結：對於集體記憶的不同理解.....	62
第三章、闕限時空的幻滅：《佛羅里達變形記》的酷兒生存戰術.....	66
第一節、前言：想像闕限時空作為一種方法.....	66
第二節、佛羅里達的闕限時空.....	70



第三節、打造酷兒生存戰術.....	74
第四節、小結：危脆生命的希望.....	80
第四章、動態親密關係：《樓上的好人》的非正典修復	85
第一節、前言：作為修復方法的非正典性.....	85
第二節、非正典修復的動態關係.....	93
第三節、小結：陳思宏的自我修復.....	100
第五章、結論：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	103
參考書目.....	112



第一章、緒論

陳思宏的《鬼地方》在文學上就像一個滿到不行的文學行李箱，人物、回憶、遺憾、選擇、後果、秘密、歷史、政治、地產、性等元素緊緊貼在一起，有如長途旅行後待洗的衣物；稍微打開箱子，髒衣服就會溢出來。

——《紐約時報》¹

臺灣酷兒分身並非純粹在臺灣產生，而是受到與術語、性學、心理學、文學和電影有關的多種外國因素的影響……隨著翻譯術語的增加，它會慢慢被接受，或許最終形成一個新的、更豐富的讓外國讀者了解臺灣獨特的酷兒文化。

——《臺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²

第一節、自由與困境：在同婚通過時

回顧近年來同志婚姻及酷兒權益的重大成就，荷蘭作為全世界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於2000年經由修改《民法》的立法方式，將婚姻重新定義為「婚姻可以由兩位異性或同性之人締結」，³ 並於2001年正式生效。此波浪潮中，與臺灣同樣經由司法權介入立法權的美國，因屬於聯邦國家的制度，最早於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最高司法法院宣布釋憲，限定立法機關於期限內修改法律，賦予同性締結婚姻的權力。一直到2015年6月26日經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美國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後正式於全美國合法化。反觀同樣以釋憲的方式介入立法權的臺灣，則於2017年5月24日時，由司法院公布的《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宣告《民法》中未有保障相同性傾向的婚姻關

¹ Peter C. Baker, "Title of Article or Pag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0/books/review/kevin-chen-ghost-town.html>

² Wen-chi Li, "Made in Taiwan: Reading Chiu Miao-chin's Lesbian Tales as World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ed. Pei-yin Lin and Wen-chi Li (London: Bloomsbury, 2022), 171-187.

³ Burgerlijk Wetboek November 11, 2024. <https://wetboekplus.nl/burgerlijk-wetboek-boek-1-artikel-30-huwelijk/>



係，要求立法機關於2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並於2018年11月24日經過公投的方式，決定以民法以外的形式執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⁴ 2019年5月17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正式於立法院三讀通過，於同年5月24日生效。臺灣也正式於法案生效的同一天，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反觀美國及臺灣的實際境況，除了時間進程的差異，反映出不同歷史條件、文化在同志議題上的在地部署外，同志及邊緣族群的權益皆看似完成一個跨時代的里程碑，並持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過程。然而，無論在酷兒群體的內部及外部，卻仍不斷地傳遞出對於該族群更為嚴厲且細緻的壓迫。

一、同志婚姻通過後的困境

在酷兒群體內部，實際上也關鍵地反映了全球化的政治部署。其中，「同性戀正典化」（homonormativity）正是辯論中重要的一環。「同性戀正典化」一詞由杜根（Lisa Duggan）率先提出，將美國同性戀婚姻放置於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進行分析，強調正典化的論述將同志平權轉化為私領域的擁有權和個人隱私的保障。⁵ 杜根將新自由主義政治稱之為同性戀國族主義的原因，在於它植根於家庭生活和消費的非政治化同性戀文化，這種新自由主義政治無法對抗主導社會文化的異性規範和機制，反而是維繫運作機制的可能。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主流論述，將隱私定義為一種限制，一種保護「公眾」情感的警戒線，並以「濫交」及「同性戀生活方式」的共構為理由，將同性戀的私人領域定義為一

⁴ 關於〈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詳細內容可參閱法務部，〈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B0000008>）

⁵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58（2015），頁104。



個完全超出任何公共場所範圍的孤立的家庭場所。⁶ 在新自由主義的文化脈絡下，雖然「同性戀正典化」的風潮兇猛，但不同的國家也有各自因應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在強調自由經濟及跨國之下，重新部署同性戀主體，例如羅費爾（Lisa Rofel）便以「慾望」（desire）為途徑，分析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如何將中國人民對於性及情感的理解與國家政策結合。羅費爾認為認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除了讓經濟制度走向市場經濟外，同時也是一個「全國性地重塑國家公共文化以製造慾望的計畫」，讓中國民眾透過對於經濟的慾望，重新想像自己成為一個躋身世界公民的新人類，與國家一起讓中國加入後冷戰的世界秩序，因此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也與人民的性及情感連結。這些政策也直接地與跨國經濟產生聯繫，也就是在新自由主義中追求利潤的渴望。然而，她也指出在中國以統一的公民慾望「中國夢」發展國家主體時，中國人民卻沒有產生統一的公民身分，因此新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同質性策略，在中國境內便因各種慾望的體現，而形塑成異質性的動態聚合體。⁷ 由此可知，不同國家對於同性戀主體的想像仍因文化脈絡的不同，各自差異。

而在臺灣方面，臺灣的同運及同婚法案與美國同樣面臨宗教教義、家庭結構、滑坡理論爭議等，與美國同志權益擁有類似的困境，在議程上也大多以美國同婚進程為借鑑，⁸ 再加上與同婚相關的批判也取自北美酷兒理論的即時挪用，進一步置入於臺灣的同運觀察。⁹ 因此在臺灣同婚通過的同時，「同志公

⁶ 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49-53.

⁷ 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⁸ 任杰，〈同性婚姻合法化歷程：美國經驗，臺灣借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2016），頁85-108。

⁹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頁107。



民」也被「酷兒左翼」（queer left）¹⁰ 批判為是被美帝國收編的同性戀正典化。然而，劉文在2015年，同性婚姻尚未通過時，曾以〈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¹¹ 一文討論臺灣同志運動的現象。劉文將酷兒左翼對於「臺灣同志運動必然走向同性戀正典化的批判」，視為一種偏執閱讀（paranoid reading）的決斷性預測，可能造成非正典的性少數被迫陷入更為低階的社會地位。酷兒左翼的負面情感不僅抵制「婚／家」體制，更是武斷地批判人們對於「婚／家」的情感牽絆。因此劉文援用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的修復式閱讀（reparative reading），重新理解臺灣的同志運動。修復式閱讀鬆動被危機意識（賽菊寇以愛滋危機為例）所凝固的時間性，詮釋目前所處的境地，採取非二元的思考模式看待「同志公民」及「酷兒左翼」的立場，認為同志主體試圖在霸權的籠罩下，「不斷地去和現實需求及結構的限制爭鬥、交換、策略性地達成自身的想望」。劉文認為將同性戀正典化無縫接軌地平行移植到臺灣的脈絡上，實則是忽略臺灣地緣政治的現實，排除同運圈內對於國族與國家狀態的各種意識型態，更是將臺灣這一在國際上缺乏政治資源的國家，與身為全球帝國的美國，放置於同等的參照當中，披露出酷兒左翼的菁英式策略無法提出議程的可行性。因此以修復式閱讀的立場涉入同志運動，強調酷兒理論中跨越身分認同、串連政治（coalition politics）的重要性，看見酷兒理論除了以「性身分」思考婚姻邏輯外的其他範疇。劉文同時引用陳彥仁於大眾媒體的研究，指出臺灣酷兒以詼諧荒謬的迷因、梗圖，嘲諷親中陣營自我矮化國家地位，帶出一條非正典修復路徑，想像

¹⁰ 酷兒左翼不僅在性別議題上忽略實際的地緣政治問題，於最近臺灣大罷免風潮的議題上，仍然忽略國際主義角度下的臺灣國家安全。對於美帝的激進批判轉化為「中國被動論」的中國官方敘事，暗藏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扁平化臺灣內部對於中國威脅的抵抗，夢幻式地思考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左派世界。左眼看世界，〈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苦勞網》（2025年4月12日，參考來源：<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9228>）；Wen Liu, Facebook（2025年4月11日。<https://reurl.cc/YYezOX>）。

¹¹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



新的酷兒臺灣（暫時）共同體。¹² 而上述依據同性戀正典化而來的婚姻觀點，同時也反映在對於單身歧視的壓迫之上，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便質疑婚姻制度內所產生的不平等，同婚的通過實則並未消除「婚姻至上論」（marital supremacy）所帶來的壓迫性結構。即使同性伴侶在《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通過後獲得「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的權力，但未婚者、單親家庭和選擇不婚的伴侶仍然面臨法律與社會的不平等待遇。法律及社會規範的體制仍然建立在父權結構的基礎之上，婚姻紅利制度偏袒已婚者，讓未婚者在租稅、年金等方面處於劣勢，形成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此外，社會對婚姻的重視亦使得不婚成為「次等」的選擇，非婚者的處境因而也被邊緣化。¹³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酷兒左翼的本土論述模式，雖嘗試以北美以外的視角為立場，然而卻有本質化西方與本土的文化本質論嫌疑，正如酒井直樹批判西方作為理論生產，東方作為經驗生產的參照系，認為這是一種具有主從關係的「文明移情」，強調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及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間的滲透及糾纏關係。¹⁴ 更如同阿尚（Sa'ed Atshan）所謂的「帝國批判」（empire of critique），¹⁵ 在將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視為兩個本質化且固定的文化的同時，忽略臺灣的酷兒主體如何重新部署、內化、重新配置在地化的LGBTQ類別及身分。在批判美帝文化的同時，反而成為壓迫性少數主體生存空間的推手，也忽略了酷兒主體如何在面對懸崖困境的生命情境當中，展演的各

¹² 劉文，〈非西方、亞洲或中美冷戰結構？重置酷兒臺灣的戰（暫）時主體〉，《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6（2021），頁19-30。

¹³ 陳昭如，〈非婚法學——婚姻之外的（不）平等〉，《台灣法律人》，3（2021），頁1-18、Chao-Ju Chen, "Catharine A. Mackinnon and Equality Theor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ed. Robin West and Cynthia Bowman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171-187.

¹⁴ 酒井直樹，〈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1998年6月），頁205-236。

¹⁵ Sa'ed Atshan, *Queer Palestine and the Empire of Critique*.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種生存戰術。然而，新世代的酷兒主體已不同於1990年代以社會運動等現實層面介入酷兒論述，由於數位科技的普及化，數位媒體形成另一條傳播同性戀正典化及少數集結的可能。¹⁶ 新型態的交友模式也藉由數位媒體的形成，進一步成為主流酷兒論述的場域。

在社群媒體方面，「同性戀正典化」則體現在對於負面酷兒經驗的排除，形塑出典型的同志情侶模板，進而對於非主流同志進行排斥，例如Hornet, Grindr, Tinder, Omi, 探探等交友軟體，在自我介紹欄時常常出現以「#」(hashtag) 的方式，宣稱「拒C、拒娘、拒胖、拒醜、拒熊」等一系列賤斥(abjection) 的行為。對於非主流的排斥除了是同性戀正典化的特質之一外，其中「拒C」的同志集體文化更展現出厭女情結，¹⁷ 形成酷兒與異性戀機制交織共謀的排斥。¹⁸ 而這種主流身分認同正是正典化的過程，在試圖擺脫酷兒負面的經驗同時，實則淺藏著身分認同的僵固化，維繫異性戀規範運作的機制。在臺灣的同運及反同運團體中，便時常將同志主體的身分政治絕對化，支持同婚的一方被貼上「私產擁有、一對一長久單偶、陽光健康」的標籤，而「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多夫多妻、亂倫、人獸交、性虐待、多人性愛趴」則被視為反同婚的主體，如此粗糙的分類方式，實則是將特定的性主體進行切割，並且視身分政治為超越同性戀正典化的影響。¹⁹ 因此在同志婚姻通過後的酷兒群體內

¹⁶ 陳彥仁，〈邁向酷兒荒謬：臺灣當代大眾文化生產中的國族與性別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頁38-42。

¹⁷ 范綱皓，〈同志的「厭女」情結：交友軟體上的拒C文化〉，《性別力 GENDER POWER》（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womanly.net/read/article/8910>）；李奇絃，〈男同志的網路交友文化及其潛在的數位性暴力〉，《Medium》（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reurl.cc/Q5XAGZ>）。

¹⁸ 曼恩（Kate Manne）著；巫靜文譯，〈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

¹⁹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頁107。



部中，正典化的危機正積極地耗損酷兒的政治性，也讓同志婚姻在看似擺脫國家的權力控制後，持續加強酷兒族群內部的自我內耗，忽略異質性，造成有著與同志婚姻通過前不遑多讓的劇烈壓迫。

在酷兒群體外部，除了反同團體「下一代幸福聯盟」所提出的公投法案，在公投結果中同意及不同意的懸殊比例，²⁰ 反映出除了反同團體外，臺灣社會對於酷兒及性別教育的整體歧視，藉由政治行為的表態一覽無遺。另外，近期在臺大經濟系學生會長的選舉中，候選人對於性別及種族的強烈歧視不僅暴露出個體對於多元性別的偏差，同時在2018年第十一案公投「你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在被否決的同時也反應了學校對於性別教育失敗的現象。尤其是經濟系學生會選舉政見的第二條：「LGBTQ與狗不得在會中辦打傳說對決」、第五條「A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2學分」、第六條「4410公分以下要上家政課」、第七條「大四畢業母胎單身進行結紮手術」。²¹ 不僅暴露出對於酷兒族群的性傾向歧視，同時也對男性及女性的身體進行壓迫，如同正典化的運作邏輯一般。對於母胎單身的歧視則暴露出異性戀時間性的本位思維，除了對於酷兒的規範外，更反過頭對於異性戀本身進行宰制。

因此在美國及臺灣的同性婚姻相繼通過的同時，雖然賦予了酷兒個體擁有婚姻權的自由，但生活中的各種歧視及生存的窒礙難行，仍然尚未解決。甚至可能因為同婚通過所造成的假象，使得臺灣社會大眾誤以為社會上已經沒有性別及性傾向的歧視，因此歧視的行為也變得更加理所當然。斯貝德（Dean Spade）便利用量化數據研究在同婚通過後所產生對於福利法案的看法，指出當同性戀權利話語利用統計數據將同性戀描述為「良好父母」，並因此獲得同性

²⁰ 中央選舉委員會，〈107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結果〉，《中央選舉委員會》（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www.cec.gov.tw/upload/file/2018-12-03/9617f16e-8616-42d9-b052-a6efa6595712/c0e7ec8903c018054138e2f7b5a409cc.pdf>）。

²¹ 吳哲宜，〈台大經濟系學生「歧視政見」遭炎上 系上教授首發聲！3點譴責：我們的教育沒做好〉，《風傳媒》（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795390>）。



伴侶的認可和利益時，實則是闡明了關於「養育子女」的資格問題，而這些主張支持了種族國家規範，使得黑人父母、在監獄中的父母、原住民父母、貧困父母和有身心障礙的父母將被兒童福利體系表達關切。²² 雖然同性戀養育權的相關論述並不是直接地對於同志戀群體造危害，而是反應在種族、階級等面向上的弱勢群體之上。然而酷兒理論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視角而言，早已打破異性戀與同性戀間的二元對立關係，²³ 交織性強調同時具備不同且重層的受迫／特權身分，諸如性／別、性傾向、種族、階級等所引起的賤斥、歧視與壓迫。因此在同時將各軸線上的差異納入分析的考量時，更能理解並彰顯受壓迫的經驗，突顯出這些交織且疊加的各種身分所經驗及呈現的特權及困境，呈現出同時賦予權力卻又壓迫的雙向複雜性。例如在被冠上「懶惰」標籤的非裔單親媽媽，可能與同時被正典化排除的「娘炮」與「陽剛女性」產生結盟，其結盟的原因在於，同性戀正典化與異性戀正典化同時標舉消費能力及單偶制婚姻制。²⁴ 日治時期的臺灣也藉由「現代愛」的相關論述，對於自由戀愛進行字面下的定義，在標舉解放的自由之下，卻將「愛」與性的規範化綁在一起，使得女性及各種從屬者（subaltern）在身體、慾望及性的諸多方面受到規範，「愛」也成為具有解放與壓迫的雙重機制。²⁵ 因此同性婚姻的通過同時也在各種規範化的機制底下，對酷兒主體進行解放及壓迫，其所造成的同性戀正典化，同時也埋藏了關於其他形式問題的產生，酷兒族群的生存空間也由此受

²² Dean Spade and Rori Rohlf, "Legal Equality, Gay Numbers and the (After?)Math of Eugenics," S&F ONLINE: The Scholar and Feminist Online, October 23, 2023.

²³ Patricia Hill Collins,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Aristea Fotopoulou, "Intersectionality Queer Studies and Hybridity: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Soci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13 (2)(2012): 19-32; Kevin Duong, "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Intersectionality?" *Politics & Gender*, Vol. 8(3)(2012): 370-386; Kimberle Crenshaw,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3 (6)(1991): 1241-1299.

²⁴ Cathy J. Cohen,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Vol. 3 (1997): 437-465.

²⁵ 陳佩甄，〈愛的文化政治：台韓現代親密關係的殖民系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2023），頁25-54。



限，對於同性戀正典化的平移批判，同時也可彌補臺灣脈絡下，與北美所形成的不同壓迫。

二、文學作為一種生存戰術

社會體制與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困境，使得同性戀正典化成為酷兒社群內部不得不然的抵抗戰術。各式生存戰術的誕生及對於酷兒創傷及情感的重新理解，都為我們提供一條審視在同志運動階段性的成功前後，酷兒群體中對於歷史發展的不斷塑造與再塑造所產生的「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²⁶雷夢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謂「情感結構」意指一種文化假設，是源於對一代人或一個時代內的元素及其關聯的嘗試，它不同於一般的社會結構，而是作為反映及解決社會經驗的方案，並且是一種將藝術和文學中的形式和慣例，定義為與社會物質性過程不可分割的方法。強調情感與認知的強烈連結，實際反映在主體性（subjectivity）與關係性（relationality）之上，威廉斯對於文化形構過程的關注，提供我重新思考主體與他者對於關係性的想像。因此我也由此嘗試探討在臺灣同志權益邁向下一個里程碑的同時，酷兒主體藉由什麼方式面對同性戀正典化的壓迫，以及操作著什麼樣的生存戰術。在異性戀機制仍然主宰著社會運作邏輯的時刻，身分的游移提供酷兒主體生存的空間，而各式各樣的創傷修復及生存戰術皆支撐著酷兒生命的延續。

其中，「文學」（literature）由原先被認為是直接反應人類經驗的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具有細節性及實際的意涵，轉變為著重於物質性層面分析的，也就是情感結構的分析，²⁷ 提供理解在當代酷兒情感研究的一條路徑。文學文本對於酷兒情感的描摹，無論在創傷、生存模式等諸多層面，皆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及創意性塑造，而其形式本身就具有意義，並不一定根植於

²⁶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²⁷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45-54.



內容的書寫。²⁸ 因此我嘗試以文學為媒介，分析文學創作如何根植於當代酷兒的情感結構，進而提供酷兒群體重新思考情感修復，及集體社會中生存的可能，開創酷兒面對創傷的修復戰術。

有關臺灣酷兒文學的系譜，紀大偉在《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一書以「公眾歷史」（public history）²⁹ 的角度進行文學史的研究，而公眾歷史指稱的是一種非主流的歷史書寫，以由下而上的方式發揮抵抗的力量。在其擘畫的章節中，便依序由1960年代在白先勇作為酷兒文學的里程碑之前的歷史背景、1970年代女工的生存環境、1980年代以白先勇為核心對於家庭的重新想像，到世紀末解嚴後，酷兒理論進入臺灣時，重新將這段文學轉捩點的契機，放置於情感危機的脈絡下進行討論。³⁰ 紀大偉將同志文學的發展扣合臺灣歷史的發展，文學從歷史脈絡中汲取養分，以文字書寫為媒介，展演無數代人的情感結構，持續至今。紀大偉在臺灣酷兒文學具有豐富著作的同時，進一步歷史化與理論化自1950年代迄今的同志書寫系譜。該書以：弱勢歷史、同志時間觀、同志歷史撰寫方法、同志主體論為其文學史史學方法論。紀大偉將同志文學史視為一種弱勢歷史，並強調同志身分並不是單一的存在，其中種族、階級與性別的交織使得他在置疑主流文學史時不僅著重於同志文學本身，更批判將同志視為一種「族群」所犯下的去歷史化錯誤。就根本而言，紀大偉所要挑戰的「霸權」包括三個面向：一、抗衡帝國（日、美、中）的霸權史觀；二、異性戀霸權及同性戀正典化之下的時間觀；三、「同志主體」的既有疆界與定義。³¹ 上文曾提及紀大偉以公眾歷史的角度進行文學史研究，將弱勢文學比擬為一種公

²⁸ 劉乃慈，〈奢華美學：台灣當代文學生產〉（臺北：群學出版社，2015），頁142-170。

²⁹ 紀大偉關於公眾歷史的啟發源自於王德威，王德威視小說為晚清最重要的公眾想像領域，藉由閱讀小說的方式，人民得以虛擬國家的過去及未來。詳可參閱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頁16。

³⁰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16-101。

³¹ 劉文，〈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帝國、酷兒時間、置疑同志主體〉，《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3（2018），頁128。



眾歷史，正是由下而上地以公眾歷史抵抗主流歷史的方式，紀大偉將此書視為「以文學為基地的『文化史』」，旨在將昔日社會的多元樣貌一一呈現於讀者面前。其中處理「美國時間」的部分，紀大偉並非純粹將美國的酷兒時間性轉嫁於臺灣的酷兒身上，而是著重於臺灣的同志文學如何部署、內化、重新配置本土化的同志主體，質疑了一味朝向美帝國發展的同性戀正典化議程。另外，也藉由「修復式閱讀」的方式，拆解「九〇年代是台灣同志文學的黃金時期」和「解嚴之後，同志文學興盛」的兩項說法。紀大偉將「愛滋」視為臺灣同志文學的轉捩點，原因在於愛滋的出現，促成了同志與酷兒等詞彙的誕生，並且愛滋的文化符碼曾在世紀末的80年代的臺灣造成恐慌，將以「解嚴」為切割聚焦於國內政治變化的視角，擴展到將臺灣同志文學置於跨國的脈絡進行分析，以「哀悼」為核心，考察臺灣同志主體的重新定位。³²

紀大偉不僅以美學的角度分析文學，更將文學視作承載公共性的媒介。同志文學可以反映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同時也是一種抵抗主流歷史的戰術，對未來進行幻造（fabulation）。³³ 例如楊双子的《花開時節》³⁴ 便藉由穿越回臺灣的日治時期，逆反以往穿越回古代中國的慣例，並形塑與北美酷兒時空不同的脈絡，打造屬於臺灣的酷兒敘事學，³⁵ 以女性的／臺灣的歷史對抗主流論述。

紀大偉採用「同志文學史」而不使用「酷兒文學史」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同志一詞的目的在於「求同」的人道主義，而酷兒則是「求異」的反人道主義

³² 該段落「酷兒時間」及「修復式閱讀」的發現主要參考自劉文，〈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帝國、酷兒時間、置疑同志主體〉，唯內文主要由我論述。

³³ 幻造的意思援引自尼昂奧（Tavia Nyong'o），尼昂奧以「從未意味著存在」的具有預言性檔案發展其「擬造」理論，而這個「從未意味著存在」的概念延伸自德勒茲的「失蹤的人民」，意味著在歷史中被遺忘的群體。並注意「非事件」中的關係，揭示擬造中每一個重複的差異。Tavia Nyong'o, *Afro-Fabulations: The Queer Drama of Black Lif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

³⁴ 楊双子，《花開時節》（臺北：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2017）。

³⁵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銚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2020），頁93-126。



立場，因此使用同志一詞的涵括度更為廣泛，可將「酷兒」的範疇納入「同志」的概念當中，因此以「求同為大」的態度，將此書命名為「同志文學史，」³⁶ 然而，本研究認為酷兒的概念肇端於拆解性／別建構及二元論的議題之上，賽菊寇的《衣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³⁷ 及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³⁸ 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及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社會建構論為基礎，拆解性別身分及出櫃間二元對立的關係，指出其中變動及展演（performativity）的過程。直接地對男同志（gay）及女同志（lesbian）的身分政治進行質疑，也促使學界以批判理論的角度重新理解性／別研究，如男同志及女同志人類學者學會（Society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便在2010年時更名為酷兒人類學學會（Association of Queer Anthropology）。

酷兒一詞最早出現並用來形容王爾德（Oscar Fingal O'Fflahertie Wills Wilde）與道格拉斯勳爵（Lord Alfred Douglas）之間令人厭惡的同志關係，在《簡明新帕特里奇俚語詞典》（*The Concise New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中指出，於1914年時酷兒一詞被用來明確指稱為同性戀的貶義詞。然而，酷兒一詞一直到1980、1990年代的愛滋危機，經由巴特勒、賽菊寇、伯蘭特等人的論述，形成一個強調異質性、邊緣性及其中所賦予動能力量的象徵。³⁹ 酷兒文學和同志文學（gay and lesbian literature）雖然都是關注同志社群經驗的文學，

³⁶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頁61-63。

³⁷ 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中文版為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著；林玉珍譯，《閨櫃知識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4）。

³⁸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中文版為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聞翊均、廖珮杏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臺北：時報出版，2023）。

³⁹ Mollie Clarke, "'Queer' history: A history of Queer," The National Archives, November 20, 2024. <https://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queer-history-a-history-of-queer/>.



但其著眼點和文化意涵有顯著差異。同志文學側重於刻畫同志身分的生活經驗及情感世界，經常以戀愛關係和社會排斥為主題。早期同志運動的目標是以身分政治為基準點並爭取平權，以描寫同志的愛情和日常生活為主題，重心多放在同志在異性戀主流社會中的邊緣處境；酷兒文學為了回應同志文學在身分同質化上的不足，更聚焦於挑戰傳統性別和性傾向的觀念，探索多元且流動的性別與性取向身分。酷兒文學不僅涵蓋原先同志文學所書寫的同志經驗，更強調社會與文化的異質性，探索身分間的複雜性，並反映不同社會情境中對酷兒社群的壓迫與抗爭。酷兒文學具有全球及在地間不斷滲透的性質，既汲取全球酷兒運動的共通議題，也深植於在地文化中，以呈現更為複雜和具體的酷兒經驗。⁴⁰ 因此本研究亦採取酷兒理論的角度，意不在囊括所有的同志文學進行分析，而在於以批判理論的角度，進行非二元化的分析，嘗試離析小說中的酷兒性（queerness），因此採用「酷兒文學」一詞。

隨著解嚴的緣故，美國九零年代盛起的酷兒論述也逐漸輸入臺灣。最早在1994年，由紀大偉及洪凌主編的《島嶼邊緣》季刊「酷兒 QUEER」專輯，開始了臺灣酷兒理論肇端。當時的酷兒論述，主要以同時期引進臺灣的後現代理論為依據，因此「酷兒」一詞也成為具有流動性的象徵。劉亮雅便指出紀大偉以洪凌、邱妙津和他自己的小說為例，認為酷兒文學旨在「呈現身分的異變與表演」、「呈現慾望的流動與多樣」以及「性政治的批判」。然而這種訴諸於科幻小說，投射出一個遠離臺灣現實的後現代烏托邦實則是與臺灣的當下脈絡差之甚遠。邱妙津的自傳小說《鱷魚手記》則傳遞出極為深刻且曖昧的身分認同危機，因此較受當下的女同志歡迎。⁴¹

⁴⁰ Teresa de Lauretis,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 An Introduction," *Differences*, Vol. 3(2) (1991): iii–xviii. ; Rajesh Dattatray Zankar, "Queer Literature: A Glocal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Publication and Reviews*, Vol. 4(7) (2023): 953-957.

⁴¹ 紀大偉，〈酷兒論：思考台灣當代酷兒與酷兒文學〉，紀大偉編，《酷兒啟示錄：當代台灣QUEER論述讀本》（台北：元尊文化，1997），頁 13-14。劉亮雅，〈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頁61。



然而，時至21世紀，臺灣的酷兒文學已與1990年代末期剛解嚴時的背景不同，網路世代的崛起形塑出與固態化的交友網絡截然不同的集結模式，更為流動及即時的網路觸及率，不僅部分延續九零年代如同邱妙津的憂鬱菁英書寫，更由於社群媒體的興盛，網路觸及率提高，導向了一種積極獻身、捍衛權利的大眾轉向。⁴² 由此可知，酷兒文學在進入21世紀後，無論在物質性、議題及處理情感的方式都與20世紀產生差異。

本論文則為論證在同婚通過前後，酷兒群體如何陷入同性戀正典化的批判，及其他形式的困境，因此摘要出2017年1月後出版的酷兒文學，說明與20世紀酷兒文學的差異。2017年5月，〈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通過，憲法法庭要求在兩年內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這一事件標誌著臺灣同志運動的重要里程碑，也使得酷兒群體進入了新的社會與政治語境。2017年1月至今的文學作品，恰好位於這一歷史轉折點的前後，其內容不僅反映了酷兒群體在同婚通過前的焦慮與期待，也捕捉了同婚通過後面臨的新挑戰，包括同性戀正典化與酷兒內部的邊緣化問題。這一時間點的選取，正因為它同時涵蓋了前後兩個不同的情感時期，提供了一個分析酷兒文學如何應對法律進步與社會現實張力的獨特視角。此外，這段時間內的酷兒文學作品，能清晰地展現臺灣酷兒群體在社會制度變革中的情感結構，並突顯文學如何成為修復創傷與反思現狀的載體。而我的「酷兒文學」不僅限於傳統的同志文學或以同性戀主體為書寫核心的作品，而是聚焦於挑戰性／別規範、探索多樣化性別與性傾向身分，並關注酷兒群體所面臨的壓迫、創傷與生存戰術的文學書寫。這一定義既不同於同志文學對於主流平權議題的追求，也區別於強調個體愛情與親密關係的書寫重心。酷兒文學更關注於「流動性」與「邊緣性」，在文本中表現為對性別與性取向多樣性的關懷，以及對異性戀規範與同性戀正典化的批判。這些作品常以非典型的敘事策略，例如魔幻、荒誕或反正典的時間敘事，重新建構酷兒主體如何在壓迫

⁴² 林佩苓，〈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89-109。



性結構中生存並尋求修復。這樣的文學形式，往往以情感為核心，深刻描繪酷兒群體在歷史、文化與社會結構中的複雜處境。

另外，酷兒文學中的情感修復指向的是酷兒文學如何通過文學書寫，處理酷兒主體在異性戀規範與同性戀正典化雙重壓力下的創傷經驗，並進一步開展重建情感與社會連結的可能性。這種修復不僅限於個體層面的療癒，更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化實踐，透過敘述創傷與重新審視情感結構，試圖對既有的文化規範與社會結構進行挑戰與轉化。在酷兒文學中，修復表現為對痛苦記憶的重探，將原本被壓抑或邊緣化的情感經驗重新帶入公共討論，並以此挖掘出抵抗異性戀規範與內部壓迫的可能。這一過程同時承認創傷的不可抹滅，並透過文學想像開啟對未來酷兒生活的新的思考空間。修復不僅僅是對情感上的復原，更是一種積極的能動性實踐，展現酷兒群體如何在壓迫性結構中尋求突破、建立新的關係性，並重新定義文化與社會的框架。這樣的文學實踐將修復從個體層面的內在修補，擴展到對集體記憶的重構以及對社會規範的批判，從而賦予酷兒文學新的文化與政治意涵。因此以下列出2017年1月後出版的酷兒文學，且與情感修復有關的作品，以利佐證21世紀酷兒文學所開啟的新氣象：

書名	作者	出版年
少年粉紅	潘柏霖	2017
像我這樣一個拉子	陳雪	2017
女子漢	楊隸亞	2017
花開時節	楊双子	2017
獨舞	李琴峰	2017
冰裂紋：星座暗黑愛情-處女	林佑軒	2017
第九個身體	陳思宏	2018
鬼地方	陳思宏	2018
花開少女華麗島	楊双子	2018
普通的戀愛	謝凱特	2018



我的蟻人父親	謝凱特	2018
弄泡泡的人	陳柏煜	2018
藍色是骨頭的顏色	潘柏霖	2019
性意思史：張亦絢短篇小說集	張亦絢	2019
觀看流星的正確方式	鍾曼瑞	2019
無父之城	陳雪	2019
佛羅里達變形記	陳思宏	2020
臺灣漫遊錄	楊双子	2020
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	陳信傑	2020
尋琴者	郭強生	2020
山地話／珊蒂化	馬翊航	2020
親愛的共犯	陳雪	2021
倒數五秒月牙	李琴峰	2021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	程廷Apyang Imiq	2021
不穿紅裙的男孩	潘柏霖	2021
樓上的好人	陳思宏	2022
子彈是餘生	寺尾哲也	2022
北極星灑落之夜	李琴峰	2022
彼岸花盛開之島	李琴峰	2022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	何玟珒	2022
蓉蓉	盧妤	2022
你不能再死一次	陳雪	2022
男子漢	楊隸亞	2022
第六十七隻穿山甲	陳思宏	2023
星月夜	李琴峰	2023
我在等你的時候讀了這東西	謝凱特	2023
決鬥那天	陳柏煜	2023
麟東西	陳柏青	2024
努力是癮	寺尾哲也	2024



生之祝禱	李琴峰	2024
假城鎮	馬翊航	2024
致白目者	謝子凡	2024
維納斯：陳雪短篇小說集	陳雪	2024

上列作品反映出21世紀酷兒文學逐漸擺脫過去對「身分政治」的單一聚焦，轉而關注更廣泛的議題，尤其是多重壓迫與交織性。當代的酷兒文學作品不僅描述性別與性向帶來的壓迫，還深刻探討了階級、種族、地方性文化與國族政治等議題如何影響酷兒主體的生存境遇。《我長在打開的樹洞》⁴³、《山地話／珊瑚化》⁴⁴ 及《假城鎮》⁴⁵ 等融入了原住民文化的背景，探索性別與族群身分的交織壓迫。透過對地方性文化的書寫，將酷兒經驗與原住民的歷史記憶結合，展現身分的多重層次性，超越傳統的性別與性傾向焦點，並關注原住民語言與文化如何形塑酷兒經驗，挑戰國語霸權與異性戀規範的同時，呈現語言、性別與空間之間的微妙聯繫。酷兒文學的與同志文學的差異，也如實體現在這些作品中，《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⁴⁶ 以虛擬現實與遊戲敘事被用來展現酷兒主體的身分流動性與建構性，突顯了酷兒在數位場域中挑戰現實壓迫與重塑自我的可能性。《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⁴⁷ 則以幽默與荒誕的筆調解構家庭結構與地方文化對酷兒身分的限制，展現酷兒主體如何在非典型的敘事場景中突破傳統框架，挑戰同志文學中常見的受害敘事。《男子漢》⁴⁸ 則從酷兒視角出發，對陽剛氣質與性別規範進行深刻批判，揭示酷兒主

⁴³ 程廷Apyang Imiq, 《我長在打開的樹洞》（臺北：九歌，2021）。

⁴⁴ 馬翊航, 《山地話／珊瑚化》（臺北：九歌，2020）。

⁴⁵ 馬翊航, 《假城鎮》（臺北：九歌，2024）。

⁴⁶ 陳信傑, 《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臺北：啟明出版，2020）。

⁴⁷ 何玟肆, 《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臺北：九歌，2022）。

⁴⁸ 楊隸亞, 《男子漢》（臺北：時報出版，2022）。



體如何挪用並顛覆異性戀霸權下的性別制度化過程，並將討論延伸至性別表現與多重身分的交錯關係。這些作品不僅打破了傳統同志文學聚焦於愛情與認同的單一敘事模式，還透過敘事策略的多樣化，對性別規範與文化結構進行了深刻反思，展現酷兒文學如何成為重新想像社會與文化秩序的重要文學形式。

《子彈是餘生》⁴⁹ 深入討論軍事文化與男性氣質的矛盾，透過對暴力與創傷的描繪，反思國族與性別規範如何塑造酷兒生命經驗，進一步超越身分政治的框架，觸及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這些作品透過虛擬現實的探索、地方文化與家庭結構的解構，以及對性別規範的重新定義，不再僅僅聚焦於同性戀者的認同困境與愛情追求，而是擴展至對多元身分、交織性壓迫以及性別與文化結構的深層批判，不僅挑戰了刻板的性別二元化，更開創出更為開放且多元的文學敘事空間，展現酷兒文學如何超越同志文學的傳統局限。

對於身分政治的反思，除了超越二元對立的框架，擴展界線的鐵板一塊時，同時也轉而關注危脆生命在情感修復層面上的實踐。20世紀的酷兒書寫往往聚焦於情感的壓抑與個體的孤立感，而當代作品則更多地強調「修復」作為酷兒主體應對創傷的積極策略。修復不僅意味著對過去創傷的療癒，也包含了對當代酷兒情感結構的重新定義。情感修復以敘述創傷、重建關係性和開啟未來想像等的方式呈現，透過文學書寫，酷兒主體得以突破壓迫性結構的限制，建立更具能動性的生存策略。這種修復並非簡單的情感補償，而是一種動態的文化實踐，既承認創傷的存在，也試圖在矛盾中尋求和解與重生。《藍色是骨頭的顏色》⁵⁰、《臺灣漫遊錄》⁵¹ 及《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都是21世紀的酷兒文學將情感修復視為一種多層次的動態實踐，並與身體、自然、生態、在地性與集體記憶等多重面向相結合。修復不再僅僅是一種個體與創傷的和解，而是一種與內在矛盾、外部壓迫以及文化結構展開對話的過程。

⁴⁹ 寺尾哲也，《子彈是餘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

⁵⁰ 潘柏霖，《藍色是骨頭的顏色》（臺北：尖端，2019）。

⁵¹ 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臺北：春山出版，2020）。



同時不僅僅停留於描述酷兒群體如何面對壓迫與創傷，而是將焦點放在修復過程中的能動性上，強調酷兒主體在壓力中尋找新可能的創造性，展現出酷兒主體在孤立與壓迫中對生命韌性的追求。酷兒文學中情感修復的敘述方式更加多樣化，從地景與旅行的動態過程到荒誕與幽默的反叛視角，展現一種重新建構自我與世界關係的實踐。

總結來說，這些作品常透過家庭結構、地方創傷與歷史記憶等元素，揭示酷兒主體如何同時面臨內部的身分邊緣化與外部的制度性壓迫。這些議題的拓展反映了臺灣酷兒文學如何以在地經驗回應全球酷兒理論，進一步彰顯其作為批判工具的力量。酷兒文學在21世紀，面對的不僅是如同90年代國家對於性少數的暴力，更是對於整個社會的異性戀正典化的回應，並重新在看似同志友善的社會當中，同時批判同性戀正典化。此時對於社會的衝撞並不如同90年代對於同婚權益的政治性訴求，其中重拾對於情感的關注是21世紀酷兒文學的特色之一，因此酷兒情感如何藉由情感結構回應社會，便是我的研究動機之一。鄭芳婷以楊雙子的小說《花開時節》為例，發展其「鎊角」作為臺灣酷兒敘事學的行動，小說主角雪泥以穿越回日治臺灣為方法，抵抗官方歷史正典化的線性時間邏輯，並在微小的生存空間進行奮鬥，使生活中的「鎊角」成為關鍵，體現暗渡陳倉的能動，並推展歷史發展。⁵² 酷兒小說在此擺脫杜根的同性戀正典化危機，重新建立銜接私領域與公領域的可能，根植於個人情感的酷兒小說，卻在諸如「鎊角行動」的游擊戰戰術（guerrilla tactics）當中，開創其政治性，與當代臺灣的情感結構交織共譜當代臺灣文化。

此中，陳思宏的小說同樣是該脈絡的一員，身為二十一世紀注重情感修復的小說創作者群之一，陳思宏對於拆解本文所謂的「創傷→修復→和解」的和解時間性，著墨由深，⁵³ 更是此時呼應臺灣酷兒生存困境的代表之一。陳思宏

⁵²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雙子《花開時節》作為「鎊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頁93-126。

⁵³ 關於陳思宏如何拆解和解時間性，將於第二章分析《鬼地方》時詳細說明。



不僅在酷兒小說上取得重大成就（集體酷兒修復、酷兒生存戰術及非正典修復），於世界文學上亦獲得不少關注。關於陳思宏的小說如何作為情感結構的載體，並同時在世界文學中獲得關注，邱貴芬曾指出魔幻寫實（marvelous realism）是後殖民國家的文學表徵，並由此轉換成全球性的文學風潮。魔幻寫實正是卡本蒂爾（Alejo Carpentier）在旅居法國巴黎時，受歐洲當時的超寫實主義啟發，返回古巴後，以「魔幻寫實」形容拉丁美洲國家將西方與在地文化交織所形成的特殊拉丁美洲體驗。並以此小文學的姿態，反攻主流文學，受到西方中心的認可機制，傳播至全世界。⁵⁴ 陳思宏正是延續魔幻寫實的傳統，加入鬼魅元素及臺灣在地脈絡，一方面傳遞出魔幻寫實傳統日常中的非常，另一方面如同范銘如所說，將鬼魂與地域的連結，探索性別、權力與空間、土地的關係。⁵⁵ 由此，《鬼地方》不僅外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希臘文等十二種語言，更在國際書市平臺Goodreads 廣受好評，國際讀者紛紛針對《鬼地方》中光怪陸離的情節與臺灣在地脈絡的結合進行評論。⁵⁶ 同時《鬼地方》也經由「阮劇團」改編為戲劇，於2023年彰化劇場藝術節演出。⁵⁷ 《紐約時報》

⁵⁴ 邱貴芬，〈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28、131、138-139。執得注意的是，史書美曾指出邱貴芬的《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是一種「系統性」的思考模式。臺灣文學在此也被指認為一種數據，使得統計學成為分析世界文學之路的模型。然而，這其實是一種以西方為形式，非西方為內容的「體制的復活」，也就是「系統化」的數據模式。史書美，〈跨界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3），頁21-66、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發表於黃美娥主持，比較視野的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課程演講）（2025年2月21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咎其實，邱貴芬及史書美的對話對象並不同，邱貴芬身為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榮譽教授，其對話的對象為在臺學者及作家，她的目的是為了建構一個可行的模型及條件，提升臺灣文學在國際上（尤其是北美）的可見度。史書美則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Irving & Jean Stone 人文講座教授，尤其她更創建華語語系研究，對話對象主要為北美學術圈。因此兩人的主張並非分歧，而是因應對話對象的不同所產生的差異策略。

⁵⁵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2008），頁96-97。

⁵⁶ Many Authors, "Ghost Town," Goodreads, November 20, 2023.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7680782-ghost-town?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ln3WFicwbg&rank=5.

⁵⁷ 阮劇團，〈鬼地方〉，《阮劇團》（2023年11月20日。https://ourtheatre.net/2023_ghost_town/）。後又於2024年於彰化劇場藝術節演出（2024年10月27日。<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809041084228165633?srsltid=AfmBOooeqwit6PYEnTpXx-ZbjY9ceNSWcb6Fb22NbFFPFaZc8SDqHJyG>）。



的書評亦掌握陳思宏對於一系列厭惡、污穢、不倫的負面情感的披露及展演，將《鬼地方》形容為包裹著「人物、回憶、遺憾、選擇、後果、秘密、歷史、政治、地產、性」的行李箱，在長途旅程後，打開縫隙時，髒衣服便會滿溢出來。⁵⁸ 綜上所述，陳思宏的小說不僅在生存戰術上反應當代臺灣酷兒困境，更引起臺灣及國際廣大讀者的共鳴，其重要性及代表性可見一斑。

陳思宏出生於永靖，並在此成長至高中畢業，前往臺北就讀大學。對於陳思宏而言，永靖的保守使得他感到窒息，重男輕女的性別教育，結婚生子的異性戀時間性，性別身體本質化的規範，甚至視同性戀為禁忌的荒謬現實。⁵⁹ 這些切身的體會，放置於2023年的當代臺灣仍然屢見不鮮，即使同婚已然通過，但正如前文所述，酷兒主體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仍然不亞於同婚尚未通過前。面對酷兒的創傷記憶，陳思宏以文學的方式嘗試解決，然而，對於那段人生經驗的記憶，陳思宏並沒有答案，甚至某些時刻，他認為「不和解才是寫小說的目的」。他以小說為媒介，尋找不和解的原因，正因為如此，書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對於陳思宏而言，他並不是生來原諒他人或是被原諒的，而是來指認這一切不願意被和解的故事及原因。⁶⁰ 陳思宏小說披露出的並不是一系列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藉由文學的虛構性，將活生生的酷兒困境加以闡述，刻劃出酷兒主體如何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生命情境下，掙扎於幻滅後的島嶼，緊握宛如花火的希望，體現頑強的韌性。

陳思宏「夏日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鬼地方》，出版於2019年底的冬季，當時臺灣甫通過《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但《鬼地方》的創作期間正值反同歧視公投激昂的2018年間，對於陳思宏而言，身為永靖出生的子弟，如

⁵⁸ Peter C. Baker, "Title of Article or Pag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0/books/review/kevin-chen-ghost-town.html>

⁵⁹ 陳思宏，《第九個身體》（臺北：九歌，2018），頁10-119。

⁶⁰ 蔣怡婷，〈陳思宏專訪菜市場巧遇當年愛過的男孩 他感受青春流逝嚎啕大哭〉，《鏡週刊》（2023年10月26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4>）；蔣怡婷，〈他與德國男友登記為伴侶 姊弟互虧都是為了愛〉，《鏡週刊》（2023年10月26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5>）。



今在永靖卻已沒有「家」，自從十八歲北上臺北讀書後，便沒有打算回鄉。而熟悉的故鄉老宅形體雖然依然存在，但卻再也沒有任何屬於陳思宏的的房間，連提供他創作的書桌都沒有。⁶¹ 這不僅是陳思宏對於記憶可靠性及真實性的質疑，更是對於反同聲勢的強烈控訴，不僅永靖沒有他的容身之處，連臺灣都是無法立足之地，而被迫離散至德國柏林，展演他的酷兒生存戰術。問號是陳思宏小說的開端，他以書寫逼近問號，然而關於故鄉的記憶、創傷卻更加模糊。陳思宏目前共出版九本小說及三本散文。若以同婚通過為切割點，分別為同婚通過前的：《指甲長花的世代》、《營火鬼道》、《態度》、《叛逆柏林》、《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去過敏的三種方法》、《第九個身體》及同婚通過後的「夏日三部曲」：《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樓上的好人》和《第六十七隻穿山甲》，以及最新作品《社頭三姐妹》。⁶² 正如陳思宏所言，「不和解才是寫小說的目的」，⁶³ 他的目標在於揭示這些故事以及不願意和解的原因。即使通過《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仍然無法完全包括酷兒群體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陳思宏的小說成為一種啟示，向我們傳達了在書寫過程中，創傷和修復不斷產生，形成一個無休止的因果迴圈。集體記憶所形塑的集體創傷也變成了一種不願意和解的記憶，提供了超越將情感視為功能性的意義。陳思宏不僅以遷徙的策略表達對於藝文的喜好，也實際展演自身的酷兒經驗。⁶⁴ 小說所書寫的內容，更根植於臺灣當代社會的酷兒經驗，擘畫出具有臺灣歷史脈絡的酷兒修復，包括對於戒嚴／解嚴時期的酷兒生存、新自由主義的既得利益者所承載的不義，以及不同的非正典性主體的結盟戰術，不斷回顧以往的酷兒經驗及回返當下，回應「酷兒時空」（queer temporal-

⁶¹ 陳思宏，〈後記〉，《鬼地方》（臺北：鏡文學，2019），頁335-339。

⁶² 陳思宏，《社頭三姐妹》（臺北：鏡文學，2025）。

⁶³ 蔣怡婷，〈他與德國男友登記為伴侶 姊弟互虧都是為了愛〉，《鏡週刊》（2023年10月26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5>）。

⁶⁴ 蔣怡婷，〈文學獎百萬獎金得主憶兒時 全家11口擠進4人座裕隆轎車〉，《鏡週刊》（2023年11月19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2>）。



spatiality) 的一系列發展。⁶⁵ 酷兒時空由霍布斯坦（Jack Halberstam）大力發展，酷兒時間藉由典型生命歷程範例（如出生、婚姻、生殖和死亡）之外的邏輯想像，並產生另一種時間性。而酷兒空間指的是後現代主義中酷兒群體參與的場所營造實踐，同時描述酷兒抵抗異性戀正典化的產生所形塑出對於空間的新理解。⁶⁶ 提供在同婚通過後的當下，一條重新審視過往及現在酷兒情感的路徑，打破同性戀正典化中排除酷兒負面經驗的戰術，進而趨向修復的可能。

關於酷兒的情感修復研究，最早由賽菊寇提出，她在《觸摸感覺：情感、教育學、表演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中指出酷兒研究的發展歷史與精神分析將同性戀視作病理化有著極大的關聯，如果偏執（paranoid）反應了對於同性慾望的壓抑，那偏執正是一個恐同與異性戀對於同性情慾強制執行機制，因此偏執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愛滋危機中，成為恐同理論的共謀。⁶⁷ 薇格曼（Robyn Wiegman）將賽菊寇對於巴特勒《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的批評統整為偏執式閱讀的三種特質，分別是：一、透過揭示隱藏的含義，我們便能完美的解決眼前的問題；二、透過讓某些隱藏的事物變得可見，便可以解讀它所蘊含的力量，意思是忽略的社會暴力對於可見性的影響；三、具有偏執式閱讀的讀者，要求批評家揭露他們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⁶⁸

⁶⁵ 關於「酷兒時空」的相關研究，主要可參閱José Esteban Muñoz, *Disidentification: Queers of colo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9); Lee Edelman *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lizabeth Freeman, *Time Binds: Queer Temporalities, Queer Histo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ck Halberstam,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⁶⁶ Judith Halberstam,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霍布斯坦在出版《酷兒時空：跨性別者的身體與次文化生活》（*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時原名茱迪絲 霍布斯坦（Judith Halberstam），後改名為傑克 霍布斯坦（Jack Halberstam），因此在標示霍布斯坦時，我以（Jack Halberstam）稱之。

⁶⁷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6.

⁶⁸ Robyn Wiegman, “The Times We’re in: Queer Feminist Criticism and the Reparative ‘Turn’,” *Feminist Theory* 15(1)(2014): 8-12.



因此這種偏執式閱讀指向一個對於未來風險的預防，也連帶造成過度分析與超確定論 (overdetermination) 的問題。⁶⁹ 而修復式閱讀著重於原先偏執所排除的情感進行分析，將重點放在當下處境的非二元分析，建立主體與世界更持久的關係。

陳思宏的小說便建立在主體與世界的關係之上，面對小說中一系列厭惡、污穢、不倫的負面情感，陳思宏以修復式閱讀的方式展演酷兒對於情感的理解，嘗試提出一條不必訴諸於和解的路徑，重新面對臺灣在集權政治統治時的政治及情感創傷。而在異性戀正典化的大蠹及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剩餘中，陳思宏亦嘗試提出各種酷兒生存戰術的可能，以書寫的方式回應整個酷兒群體。因此我便以陳思宏的小說的範疇，嘗試分析小說內部的酷兒情感，如何在酷兒群體的內部及外部皆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候，以各式游擊戰戰術的方式，重新面對生命中的各種創傷，安身立命於你我共生的世界當中。

第二節、何謂情感修復：當代情感研究的回顧

一、情感與修復理論回顧

將社會問題肇因於情感（affect / emotion）所遇到的困境，最早可追溯至十八及十九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⁷⁰ 而自1980年代以來，包括賽菊寇、伯蘭特（Lauren Berlant）等人在情感研究上的貢獻也造成了所謂的「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然而何謂情感？情感一詞在英文的脈絡下，主要有情感（affect）與情緒（emotion）兩種符號，部分學者⁷¹ 認為情緒是指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情感，而情感則是根植於生理學的情感及人們對於情感的生理反應。例如

⁶⁹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頁121。

⁷⁰ Ann Cvetkovich, *Mixed Feelings: Feminism, Mass Culture, and Victorian Sens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⁷¹ 如布倫南（Teresa Brennan）及阿妹（Sara Ahmed）等。



阿妹的《情緒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強調透過公領域的文本透過將「他人」歸因於我們感情的「來源」，因此將主體與集體相互結合，並使用「情緒」一詞進行指稱。⁷² 安妮（Sianne Ngai）引用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和馬蘇米（Brian Massumi），指出在情感研究中，情緒需要依靠主體的存有才能存在，而情感則不需要。這種區分反映了情感的主觀維度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削弱了它作為唯物主義探究對象的有效性，因此安妮主張不用特地區分兩者使用上的差別，因為她認為區分情感與情緒是基於區分第一人稱及第三人稱的感覺，是透過擴展和區分包含在身分中（社會性），及非身分中（生理性）所產生的感覺。⁷³ 在臺灣的情感翻譯中，胡台麗則認為情緒隱含著較為生理性、且不受控制的意涵，並認為自蘇格拉底（Socrates）以來，情緒便具有負面的、貶抑的意味，更是對理性（reason）造成威脅的野蠻感覺，因此將emotion翻譯為「情緒」，同時引用羅沙度（Michelle Rosaldo）討論思想（thought / cognition）與情感（affect / feeling）間對於對立的辯證，認為情感同時也是文化所形塑的。⁷⁴ 綜上所述，關於“affect”，“emotion”、「情感」、「情緒」間的內涵及翻譯眾說紛紜，本研究亦無意在此治絲益棼，然而，我所關注之議題除根植於生理性的情緒外，亦同時關懷由文化所形塑的情感，並將重心放至於情感與公共之間的關係，因此援用胡台麗的翻譯，將“emotion”翻譯為「情緒」，“affect”翻譯為「情感」。

根據安妮的定義，情感無論採用情感與情緒的指稱，都必須建立在一種關係性（relationality）的理解上，而非本質上的差異，將情感與社會的聯繫，意

⁷²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⁷³ Sianne Ngai, *Ugly Feel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 Kristyn Gorton, "Theorizing emotion and affect: Feminist engagements," *Feminist Theory*, vol. 8(3) (2007): 24, 334-335.

⁷⁴ 胡台麗，〈導論〉，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2），頁1-15、胡台麗，〈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頁50-52。



味著強調私領域與公領域的關係在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切割下，重新連結。杜根便在《平等的黃昏？：新自由主義、文化政治與對民主的攻擊》（*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披露出新自由主義邏輯造成的經濟與文化間的罅隙，將依照階級、種族、性／別的類別將資源重新分配並去政治化，同時將身分政治定位為特殊利益團體的問題，將其排除於經濟市場之外。⁷⁵ 因此伯蘭特早期在《美國女王前往華盛頓之旅》（*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研究中所稱的「親密的公共領域」（intimate public sphere），便是探討私領域如何介入公領域的情感情論，伯蘭特認為女性主義強調的「個人即政治」邏輯，是在將日常生活中的親密情感視為國家及性政治倫理的指標。然而，在美國右翼政府的治理下，「個人即政治」被重新部署為「政治即個人」，這暗示著私領域與公領域的罅隙將造成國家的動盪，因此國家需要積極維護各種傳統或保守理念，例如傳統家庭的價值觀。⁷⁶ 克維特科維奇（Ann Cvetkovich）更延續伯蘭特等人對於情感與政治的論述。她在《感覺的檔案庫：創傷、性向與女同性戀公共文化》（*An Archive of Feelings: Trauma, Sexuality, and Lesbian Public Cultures*）一書中指出，美國文化導向了創傷文化的轉變，這代表政治文化的失敗以及被情感的感傷文化或奇觀式的窺探文化所取代。她以好萊塢電影為例，指出當創傷被視為必須以團結的名義修復創傷時，將會落入一種以修復創傷為名的民族主義模式。並嘗試把創傷鑲嵌於歷史的物質性當中，將同性戀公共文化視為公共創傷的實例，強調性創傷的國家層面意義。⁷⁷ 阿妹延續對於物質性的關注，強調身體、物體和空間之間的新型態互動關係，以現象學的方法為核心，強調身體與周遭環境的關係性。指出當人們與物體互動時，物體不僅引導人們的動作，同時也

⁷⁵ 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⁷⁶ Lauren Berlant, *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⁷⁷ Ann Cvetkovich, *An Archive of Feelings: Trauma, Sexuality, and Lesbian Public Cultur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在接觸的過程中與身體互相塑造。身體和物體的互動方式形成了我們對周遭世界的熟悉感，並塑造了社會中的一般觀念，影響了人們對物體的理解和使用方式。阿妹的酷兒現象學概念打破了身體和物體之間的傳統關係，創造出一種失向（disorientation）狀態，開啟了對外部世界不同感知方式的可能性。⁷⁸ 因此，情感並不啻意味著由身體內產生的各種心理情緒，也並僅作為外在於自身的社會力量，情感本身就是由主體與外在之間的界線所構成。凡是主體與外在事物、語言、主體及實踐方式的關係及感知，皆屬情感。情感修復的概念，延續賽菊寇，修復指得並不是在質疑偏執式閱讀的同時，而獲取「新知」，以賽菊寇的話來說就是並非拆解愛滋神話，而是在懷疑愛滋神話的同時，如何共同面對的集體政治行動。因此，情感修復便是在進退維谷的時候，如何串聯彼此的情感，並訴諸於集體的行為，分析主體與外在事物、語言、主體及實踐方式的關係及感知，進而安身立命於你我共生的世界當中。

從前述阿妹、伯蘭特、克維特科維奇等人對於情感理論的闡述，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將私領域與公領域切割的運作模式，藉由情感研究重新產生聯繫，並提出感知外部世界的不同方式。然而，對於創傷的懺悔很可能導向一種脫罪的目的，正如伯蘭特認為公共的哀傷很可能是認同特權結構的群體的防衛性反應，因為他們害怕會因為默許某種對他們有利的結構性暴力而被披露為不正義。⁷⁹ 因此情感不僅可以形塑公共文化，更可被權力結構挪用為延續暴力的策略，進而成為一種對目的的偏執。安妮在《醜陋的感覺》（*Ugly Feeling*）中也揭露出過分強調情感的政治意義可能造成的問題，她從美學的角度出發，考察藝術家對於晚期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各種負面情緒，如嫉妒、焦慮、憤怒，如

⁷⁸ Sara Ahmed, *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⁷⁹ Lauren Berlant, ‘The Subject of True Feeling: Pain, Privacy and Politics’, in *Transformations: Thinking Through Feminism*, ed. S. Ahmed, J. Kilby, C. Lury, M. McNeil and B. Skeggs (London: Routledge, 2000), 33-47.



何轉化為具有豐富生產力的藝術。⁸⁰ 即使情感的美學層面無法推翻晚期資本主義的結構，但這仍然是藝術家在面臨資本主義的情感回應。

情感研究的範疇在與政治及公共文化的相互對話中不斷被擴大，究其實，這是為了回應精神分析及精神病理學壟斷對於處理創傷的社會文化方法，⁸¹ 以克維特科維奇的話來說，就是情感研究所關注的「治癒」（cure）並不訴諸於醫療治療，而在於日常生活中的藝術層面，並拒絕將生活簡化為症狀式的條列式描述。⁸² 而對於以情感研究批判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系譜，可上溯至賽菊寇所提出的「修復式閱讀」。賽菊寇指出佛洛伊德將偏執的病症歸因於對同性慾望的壓抑，將精神分析把同性戀者視為一種偏執的病理化現象，因此偏執成為反同性戀和異性戀主義強制運作的機制。賽菊寇對於偏執與恐同的異性戀機制的運作理解，建立在1980年代美國的愛滋危機之上，關於HIV的起源，被視為一種陰謀論，民眾猜測HIV病毒可能是被故意製造或傳播，也可能是美國軍方的陰謀失控後的結果。賽菊寇引用與帕頓（Cindy Patton）的對話，他們想要使民眾對大規模且系統性的壓迫脫離神秘化及引起廣泛憤怒的情緒，以及這些資訊並不本質上或必然地要求群眾遵循特定的知識論或敘事結果。⁸³ 恐懼及懷疑的情緒和積極傳播由國家所策劃的假訊息，反應在酷兒社群當中，而偏執所產生的陰謀論，也導致社會信任的崩潰，因此修復式閱讀正是在面臨潰堤邊緣的生存中，顯示出基於脆弱性的自我保護潛力。⁸⁴

然而，修復式閱讀並不是取代偏執式閱讀的方式，而是在討論問題的立場上有所差異及延伸，對於賽菊寇而言，她將偏執視為一種情感，是我們面對於追求真相的一種「附著」（attachment），因此人們在思考問題時，總是希望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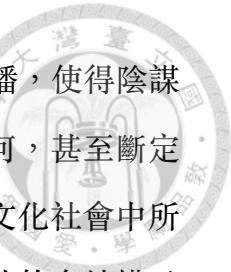
⁸⁰ Sianne Ngai, *Ugly Feelings*.

⁸¹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123-151.

⁸² Ann Cvetkovich, *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9-161.

⁸³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123-151.

⁸⁴ Wen Liu, "Pandemic paranoia: Toward a reparativ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psyche," *Psychoanalysis, Culture, & Society*, 26(4)(2021): 608-622.



以追求一個「目標」或「真相」。⁸⁵ 這種方式常常助長陰謀的散播，使得陰謀論成為三人成虎的「真相」。賽菊寇並不關注所謂的「真相」為何，甚至斷定這些妄想在根本上的錯誤，而提出修復式閱讀的概念，將我們的文化社會中所欲排除的慾望，包括負面情緒等，重新拾回，成為非單向、非線性的在結構及生命的掙扎中的延續及滋養。

綜上所述，情感研究自賽菊寇開始，由一種精神分析的偏執式閱讀轉向關注情感的修復式閱讀，形成具有系譜脈絡的情感轉向。阿妹、伯蘭特、克維特科維奇、安妮等人也紛紛將情感研究擴展到文學、電影、公共文化等層面。然而，面對不同的時空脈絡，情感研究也產生不同的意義及理論框架，對於賽菊寇等人而言，情感研究是根植於精神分析的批判及1980年代的愛滋危機。阿妹、伯蘭特、克維特科維奇除了批判精神分析外，也在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分析情感如何介入公共文化。本研究所關注的情感情論，根植於臺灣脈絡所產生的小說，除了回顧情感研究的經典文本外，臺灣學者及關於臺灣的情感研究，在理論框架上也勢必與美國脈絡下的情感研究有所差異。然而強調地方與西方在文化本質上的差異很可能陷入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的二元對立當中，因此本研究強調情感與修復理論在臺灣的挪用採取如同薩維奇（Evren Savci）在討論酷兒翻譯時的態度，將酷兒相關的詞彙及概念，視為非單方面的輸入，而是根植於文化歷史的物質性脈絡中。⁸⁶ 利文祺在其主編的《臺灣文學作為世界文學》中討論邱妙津的作品時，以世界文學的角度切入，同樣說明臺灣的酷兒身分受到了外國術語、性學、心理學、文學和電影的多種因素影響，隨著翻譯的傳播，獨特的、新的酷兒文化將更加突顯跨國滲透的邏輯並邁向世界文學的研究方式及機制當中。⁸⁷ 因此在臺灣的脈

⁸⁵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123-151.

⁸⁶ Evren Savci, *Queer in Translation: Sexual Politics Under Neoliberal Isla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⁸⁷ Wen-chi Li, "Made in Taiwan: Reading Chiu Miao-chin's Lesbian Tales as World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ed. Pei-yin Lin and Wen-chi Li, 171-187.



絡下思考情感理論，並非陷入文化相對主義的邏輯，而是對於單語霸權（英語）的質疑，更是強調不同語言中的理論詞彙如何可能形成不同的知識體系和存在方式，下文便針對臺灣學者及臺灣研究中的情感研究進行回顧與開展。

二、情感與修復理論在臺灣的挪用

廣義的酷兒研究自90年代伊始，經由臺灣學者的引介，大量進入臺灣學術圈，對於名詞、概念的翻譯及重新部署，使得酷兒理論在地化，根植於臺灣歷史的物質性脈絡。然而，其中以賽菊寇的修復式閱讀為參照系，或情感研究的相關著作必須到2000年後才開始出現。⁸⁸

重新思考臺灣脈絡下的情感研究，如胡台麗的〈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⁸⁹，透過排灣族不同種類的笛系統，提出對於情感的重新思考。不同系統的排灣族吹笛者皆指出笛聲與哭聲的相近，使人聯想到哀傷思念（tarimuzau / mapaura），然而這種哀思卻受排灣族人喜愛，更是一種由愛而產生的不捨情感，因而進入美感的領域。胡台麗藉由笛聲及聲音「文本」的研究，嘗試建構排灣族的情感認識論，重新賦予情感理論在臺灣及排灣族中的脈絡。而其中關於酷兒生存的戰術，主要有鄭芳婷的 "Visioning a queer documentary: Huang Hui-chen's Small Talk"⁹⁰、〈影子戰術：台灣當代數位創作的修復性幽默〉⁹¹、劉文的〈弱情感與「新冷戰」：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下的網路

⁸⁸ 例如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

⁸⁹ 胡台麗，〈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頁49-85。

⁹⁰ Fan-Ting Cheng, "Visioning a queer documentary: Huang Hui-chen's Small Talk ",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Vol. 34(2020): 530-542.

⁹¹ 鄭芳婷，〈影子戰術：台灣當代數位創作的修復性幽默〉，〈中外文學〉，53(2) (2024) ，頁17-54。



迷因與中介情感〉⁹² 陳佩甄的〈「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⁹³ 〈重思女性同性親密性：台灣歌仔戲和韓國女性國劇文化再現中的性身分政治與情感聯盟〉⁹⁴ 曾秀萍的〈身障・底層・跨世代：周美玲《漂浪青春》中的同女漂浪與女同志情慾實踐〉⁹⁵ 四人皆以臺灣研究的角度，與北美情感研究對話。鄭芳婷透過質疑導演對於電影敘事的完全控制權，賦予紀錄片中採取的紀錄個人的動態戰術。將《日常對話》中「牽亡」（khan-bong）的戲劇性服飾，及誇張的展演方式，與臺灣社會溫柔敦厚的女性規範對比，指出阿女對於異性戀及家庭規範的抵制，不僅以牽亡指向生死間的臨界，更是一種對於性別規範與家庭典範的越界。同時與臺灣國民黨政治及中國儒釋道典範所形塑對於酷兒的沈默對話，指出沈默並不是一味地掩蓋對於酷兒的排斥，反倒是強調了互惠的恐同規範與酷兒能動性之間的關係，超越壓迫與不壓迫的二元對立關係。另一篇文章中，鄭芳婷通過「可理解性」與「多重拼貼」產生的「可連結性」，闡述了一種酷兒激進性，以《眼球中央電視台》及「第一屆向中國道歉大賽」為例，論證一種以幽默為基礎的感知結構。這種激進性指向自反、開放、複調且無終局的數位協作景觀，進一步形成修復或補給「可連結性」的影子戰術。透過幽默，臺灣的數位創作群體能夠反映長期受壓迫的情感，並以共情與內在理解來連結不同立場的觀眾。這些幽默創作指向一種不以暴力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姿態的立場，打造「受弱狀態」的激進效果，並開拓了情感動能的未來發展，推動了在數位協作中共融與

⁹² 劉文，〈弱情感與「新冷戰」：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下的網路迷因與中介情感〉，《中外文學》，53(2) (2024)，頁55-98。

⁹³ 陳佩甄，〈「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 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文化研究》，31 (2020)，頁7-42。

⁹⁴ 陳佩甄，〈弱重思女性同性親密性：台灣歌仔戲和韓國女性國劇文化再現中的性身分政治與情感聯盟〉，《中外文學》，53(2) (2024)，頁99-138。

⁹⁵ 曾秀萍，〈身障・底層・跨世代：周美玲《漂浪青春》中的同女漂浪與女同志情慾實踐〉，《臺灣文學學報》，44 (2024)，頁37-65。



支持的創新動力。劉文置疑「新冷戰情感結構」在臺灣地緣政治分析中的慣性應用，並批判「反中親美」框架被視為既定情感事實的現象。通過網路迷因的分析，文章展示了「弱情感」如何在「反抗中國」與「反對仇恨中國」的情感之間，以嘲諷式幽默將愛與恨的極端情感轉化，呈現去二元地緣的聯盟。幽默的弱情感不僅降低了對中美對峙的情感反應強度，還提供了一種低度的政治回應形式，讓臺灣民眾在面對國際緊張情勢時得以找到共感的可能性，揭露新冷戰情感框架的局限，並開拓在多元地緣背景下的多重情感反應空間。陳佩甄同樣強調《日常對話》中的阿女在生命及身分上的破碎，指出非典型記憶所形塑的酷兒時間對於線性歷史的質疑。根植於物質性的基礎結構，以修復式閱讀的方式回顧非典型記憶，關注酷兒主體生命經驗的情感、結盟和愛，重新形構批判方式。另一篇文章中，陳佩甄回溯臺灣歌仔戲與韓國女性國劇自1950年代以來的三個歷史轉型階段，以「非認同化」與「情感聯盟」為核心理論框架，重新檢視臺灣歌仔戲與韓國女性國劇的歷史與當代詮釋。透過「非認同化」，提出這兩種表演藝術中的同性親密性，不應單純以性身分的視角理解，而更應聚焦其跨越性別的表演實踐如何挑戰既有的性別規範，形成一種情感性的社群支持網絡。並以「情感聯盟」概念強調韓國女性國劇與歌仔戲中的親密關係與社群連帶，並非只是性身分的展現，而是一種在表演、情感與生活方式上的多元聯結，形成了抗衡現代西方知識框架的酷兒史觀，主張「重構酷兒史」應超越性別身分，注重情感的集體聯繫，以抵抗被西方主導的酷兒敘事。曾秀萍則探討情感共同體的概念，指出這種共同體是透過情感上的連結與相互支持來抵抗主流社會對邊緣群體的壓迫。在《漂浪青春》中，角色們藉由建立情感共同體，特別是老年同志角色之間的相互扶持，展現了另一種非異性戀婚姻的家庭模式。這些角色透過情感勞動，彼此照顧、安慰，形成了多元成家的實踐。這種情感共同體不僅僅是為了生活上的支持，也是對抗社會體制壓迫的方式，因為弱勢群體在情感支持中找到了重建生活意義的力量。因此情感共同體被視為跨世代連結的重要橋樑，透過電影角色的互動，展現了情感支持如何幫助她們



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難和創傷，這種關係模式不受異性戀家庭結構的束縛，使民眾反思主流婚姻體制的限制與不平等。

此中，對後同婚時期的抵抗方式，早已不如戒嚴時代般的硬性抵抗，正如鄭芳婷及劉文對於新冷戰下的考察，新冷戰框架在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的背景下塑造了兩極化的情感結構，如「反中親美」與「反反中」，導致偏執情感的普遍化。劉文分析網路迷因等數位文化所揭示一種低強度、嘲諷性的情感表達方式的「弱情感」及鄭芳婷聚焦於臺灣當代數位創作《眼球中央電視台》與「向中國道歉大賽」所提出的影子戰術，都是串情情感、試圖舒緩緊張的政治氛圍，重新理解可以突破傳統批判中的二元框架，將焦點放在創傷經驗的共享與修復。⁹⁶ 這些修復性策略特別強調情感的連結性與協作，通過數位創作與幽默挪用的形式，形成非對抗式的回應，既展現臺灣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的自主性，也為創傷情感提供了新的出口。未來的修復理論同樣需要更加深刻地處理新冷戰框架下的矛盾，新冷戰起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的升溫，川普（Donald Trump）將新冠病毒（COVID-19）指摘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及對病毒起源的一系列陰謀論，使得美中及多邊政治的角力形構新型態的冷戰模式。面對中國，尤其是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雙重張力下，若僅將新冷戰視為情感結構的原因（cause），而非權力關係間的動態形塑結果（effect），則容易陷入國與國之間的國家尺度分析，同時忽略社群內部及交織性之間的權力關係。⁹⁷ 正如汪宏倫指出，中國的壓迫策略主要深植於民族主義與政治控制的結構中，以內外交互作用達成政權穩定與國際競爭的目標。對內，中國以少數民族政策推行文化、宗教和語言的同化，通過高壓監控與經濟開發，削弱地方自治的實質內涵。同時，愛國主義教育滲透社會各層面，強化「日常國族主義」

⁹⁶ 劉文，〈弱情感與「新冷戰」：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下的網路迷因與中介情感〉，頁55-98、鄭芳婷，〈影子戰術：台灣當代數位創作的修復性幽默〉，頁17-54。

⁹⁷ 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劉文，〈弱情感與「新冷戰」：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下的網路迷因與中介情感〉，頁57-69。



的實踐，構建敵我分明的「戰爭之框」。這種框架不僅合理化對異議聲音的打壓，還引導群眾內化政權的價值觀，將愛國情感轉化為壓迫工具。對外，伴隨全球化的經濟崛起，中國利用國際體系的不公與西方霸權，激化民族情緒，塑造反美與反日的群體認同。這種「新民族主義」既緩解了國內矛盾，又在全球舞台上為中國的強勢擴張尋求輿論支持。情感操控成為壓迫的重要手段，使壓迫從單純的政治控制延展為一套結構化、情感化的治理邏輯。⁹⁸ 面對中國民族主義及對於全球資本及政治的介入，尤其自2019年通過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全面對香港的政治及文化性控制來，逐漸邁向對於邊緣政體更為強烈的主權控制（臺灣、香港、西藏、新疆）與帝國憧憬，⁹⁹ 探索如何維持酷兒群體內部的平等與連結，跳脫民族國家之間的對立及連結關係，更是修復理論需要著重論述的部分。

鄭芳婷、劉文、陳佩甄及曾秀萍等人以情感研究的角度切入臺灣脈絡的文本當中，皆針對純粹壓迫／不壓迫的二元論述進行批判，承襲賽菊寇的修復式閱讀，更開展出具有臺灣脈絡的理論框架，包括「同志公民」及「酷兒左翼」的辯證關係、「幸福、快樂」及「憂鬱、倒退」分別如何壓迫酷兒生命及未來想像及形塑二元化的酷兒負面情感、牽亡的越界政治、沉默的互惠互利、物質性非典型記憶的延續、連線政治的共生、幽默弱情感的激進性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延續鄭芳婷、劉文、陳佩甄及曾秀萍等人對於臺灣的情感情理論示範，說明「情感」以情感結構的姿態作為時代記錄的關鍵功能，同時連結了不同的歷史與身分差異。本研究不僅將「酷兒／情感」視為研究方法，同時也成為學術探索的核心對象，讓當代個體得以面對政治事件和日常議題，以情感作為回應的媒介，從而為歷史留下豐富且多元的記憶記錄，並開展

⁹⁸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19（2014），頁189-250。

⁹⁹ 汪宏倫，〈淺論兩岸國族問題中的情感結構——一種對話的嘗試〉，收入曾國祥、徐斯儉主編，《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臺北：左岸文化，2012），頁181-231。



由陳思宏小說為範疇的情感修復，探索酷兒主體在戰爭框架、族群政治、異 / 同性戀正典化下的各種生存戰術、連線政治及共生共榮的可能。

第三節、臺灣酷兒文學與情感修復的碰撞

本論文除了思考情感理論在臺灣的脈絡及理論化過程外，同時也是研究當代臺灣酷兒小說的專家論，因此除了情感與修復理論在北美及臺灣的回顧外，下文亦針對當代臺灣酷兒文學進行說明，並試圖闡釋陳思宏作為當代臺灣酷兒小說家的重要性及位置。

一、陳思宏在酷兒文學的定位

陳思宏小說的重要性正呈現在他對酷兒主體的擬造，及情感修復上的不同理解，然而，目前關於陳思宏小說的研究大多建立在鄉土、家國、性別等面向進行論述。邱美銜的《地方、空間、創傷記憶敘事 / 陳思宏《鬼地方》的家鄉書寫》¹⁰⁰便以「地方與地方感」、「空間書寫」、「創傷記憶敘事」三個視角為切入點，將《鬼地方》視作「新型態家鄉書寫」，是個人經驗的再現、地方空間元素及後設價值觀交織的批判性書寫，使家鄉的面貌呈現紛陳的多元面貌。邱美銜認為陳思宏遷徙的書寫角度，反應移動經驗對於主體發展的影響，以家鄉為起點，並在故事的結尾將角色們召喚回故鄉，強調家鄉作為發展根基的重要性。趙帝凱的《華語語系台灣鬼魅敘事的性別與家國：以聶華苓、李昂與陳思宏為例》則以華語語系（Sinophone）的視角切入，認為陳思宏將永靖作為一種卑賤（abjection）的指涉，充斥著異性戀父權主義的暴力、全球化資本主義中的落後者，以及各種人性的陰暗面，援用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

¹⁰⁰ 邱美銜，〈地方、空間、創傷記憶敘事 / 陳思宏《鬼地方》的家鄉書寫〉（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碩士論文，2021）。



卑賤理論，¹⁰¹ 指涉陳天宏回到故鄉的這段旅程，是一段探討自我與原鄉之間的辯證。

兩篇碩士論文雖皆以暴力、記憶、創傷為範疇，然而，他們所欲處理的核心要點仍然是建立在對於鄉土及家國的想像當中，未脫離由范銘如所定義的一系列鄉土小說論述，¹⁰² 尤其邱美衡宣稱《鬼地方》並非僅僅扣合臺灣的當代社會環境，更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進行詮釋。但兩者皆並未針對小說所反映的情感結構進行論述，限縮小說介入社會的政治性，及幻造異質性的可能。誠如蔡孟哲所言，陳思宏的小說以酷兒創傷預／寓言新國族主義及轉型正義的操作性實踐，本身也是創傷修復與和解的創造性實踐。¹⁰³ 鄭芳婷亦將《佛羅里達變形記》置入當代臺灣的邏輯當中，指出幻滅的主體不僅是小說中的龍子龍女及其父母輩，更是在當下閱讀這部小說的我們，面對全球瘟疫的失控，中國極權政治的更集中、LGBTQ生存的壓迫、移工人權、生態危機，在保持優雅的同時似乎才擁有喘息空間，然而，這正是幻滅後所共謀的罪孽、共享的不義。《佛羅里達變形記》便是提供我們看見「這些貪嗔癡的過程中，為求生存的那星點般的頑強韌性」。¹⁰⁴

上述研究皆提供本研究初步詮釋的基礎，但陳思宏小說對於創傷修復的理解仍具有其他多維面向，在面臨異／同性戀正典化的大纛下同時也具有不同方式的生存戰術。這不只體現在《鬼地方》及《佛羅里達變形記》中，陳思宏在第一本小說集《指甲長花的世代》便已顯示出對於酷兒情感的修復跡象，而至「夏日三部曲」成形為本研究所謂的「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究其實，此中

¹⁰¹ 我在行文中將克莉斯蒂娃的abjection翻譯為「賤斥」。

¹⁰²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

¹⁰³ 蔡孟哲，〈酷兒創傷與歷史修復——簡評陳思宏的《鬼地方》（兼及《夏日三部曲》）〉，《臺灣出版與閱讀》，23（2023），頁100。

¹⁰⁴ 鄭芳婷，〈純真早就滅頂了 評陳思宏長篇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聯合文學》（2023年11月12日，<https://www.unitas.me/archives/20448>）。



的關鍵建立在「不訴諸弭平創傷」的開端，由此發軔，一步一步開展陳思宏小說的酷兒情感修復。

總而言之，陳思宏在文學史的定位上不僅榮獲2020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年度大獎，更是以魔幻寫實般糅雜酷兒情感的小說將臺灣文學躋身世界文學之中。關於情感修復的獨特寫法也更豐富臺灣酷兒小說的範疇，融合在地臺灣脈絡與銜接情感修復系譜的一系列小說創作，使得陳思宏無論在臺灣文學史上抑或世界文學之中都具有深刻的地位及代表性。

二、酷兒修復：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

當《鬼地方》在2020年獲得臺灣文學獎年度金典大獎時，評審鍾文音認為「陳思宏說自己的出生地是『鬼地方』，表面蔑視，暗底卻是珍視。」另一位評審張國立也指出《鬼地方》：「將整個家族的悲歡離合與主角坎坷的成長歷程牢牢扣在一起，透過家鄉那小小江湖，一窺飄浮於歷史塵埃間的廟堂，充分展現寫作自由，打破敘事觀點的束縛。」¹⁰⁵ 陳思宏亦在得獎感言中表示：「我花了很多力氣與自己的同志身分搏鬥，逃離原鄉，懼怕回家……《鬼地方》寫返鄉，主角重回不自由的島嶼年代，痛哭一場……希望，下一代的自由臺灣人，再也不需要為了爭取自由而損傷，再也不用為了自己的性向、性別而哭泣。」¹⁰⁶ 面對過往島嶼對於酷兒主體的壓迫，及原鄉中各種維度的暴力，陳思宏沒有選擇遺忘，他以創作的方式，重新思考過往歷史中的渣滓及養分，幻造未來。

反觀當代臺灣社會，在同性婚姻通過後的現況，同性戀正典化的馬首是瞻，使得酷兒時空被重新畫入進步史觀的世界創製當中，一系列以美帝國為首

¹⁰⁵ 陳昱勳，〈2020台灣文學金典獎 陳思宏《鬼地方》獲年度大獎〉，《自由時報》（2023年11月13日。<https://art.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341773>）。

¹⁰⁶ 陳思宏，〈陳思宏【2020金典年度大獎】〉，《臺灣文學獎》（2023年11月13日。<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4&pid=1819>）。



的酷兒議程被再度僵化，形成以正面的酷兒形象，排除其他負面經驗的正典化過程。陳思宏的小說，表現出對於未來的不同理解，以重啟記憶的方式想像不同形式的創傷修復，如同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複音聚合體」（polyphonic assemblage）提醒我們思考對於時間創製的其他可能，質疑將進步視為唯一進程的時間性。¹⁰⁷ 我借陳思宏《鬼地方》作為當代臺灣酷兒對於修復情感的其他路徑，小說訴諸一種不願弭平創傷的修復式閱讀，肯定負面經驗的意義，而不是一味地將之排除於主流酷兒經驗當中。同時，本論文亦非將所謂的酷兒正面經驗與負面經驗二元化，而是重視小說中的文本脈絡，提出不同於和解的時間性，並指出負面經驗的建立，依存於社會建構的框架當中，是酷兒主體無法逃避而必須面對的情感問題。本論文經分析陳思宏目前所出版的所有小說，其中反應對於同性戀正典化下酷兒情感的不同面向，除了不願與年少時的家庭創傷和解外，亦不願與整個異性戀正典的社會妥協，同時反映出對於不同時間製圖的共存模式。然而，在面對異性戀正典及新自由主義下資本剩餘的環境當中，酷兒及其他主體本身所承載的不義也經由延續祖父輩的血液，傳承到自我的生命經驗當中。在各種外在的光鮮亮麗包裝下，內部卻潛藏著朽壞及幻滅的痛苦與暴力，經由一代一代的傳承，終將延續結構的輪迴。小說中對於創傷的理解及在苦痛中爭執的生存戰術，正是一切逃脫的回歸，將視角回歸事發的源頭，正視原鄉中的暴力及倫理的失序，挑戰偏執式閱讀及同性戀正典化所欲排除的經驗，並以各種游擊戰戰術的生活模式，逃逸於正典的框架中，邁向酷兒世界創製（queer worldmaking）¹⁰⁸ 的圖景。

¹⁰⁷ 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中文版為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著；林浩立、謝孟璇譯，《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論資本主義廢墟中生命的可能性》（臺北：二十張出版社，2024）。

¹⁰⁸ Lauren Berlant, Michael Warner,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Vol. 24, No. 2(1998): 547-566; Andrew Gayed, *Queer World Making: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ern Diasporic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Hailey Nicole Otis,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ort Collin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021).



本論文挪用情感研究及酷兒研究的各種論述，以賽菊寇的修復式閱讀為出發點，指出陳思宏小說中對於不訴諸和解的創傷修復，嘗試鬆動單一性的進步史觀。挪用情感研究及酷兒研究為切入視角的文學研究，不僅著重於理解其情感的運作模式，更帶入物質性的歷史脈絡，分析作家對情感結構的洞見，提出不同於進步史觀的酷兒時空。情感及酷兒理論的介入，除了開拓文學研究中的酷兒創製外，另一方面本論文也積極回應當代臺灣的情感研究，鉅細靡遺地知悉情感研究與文學作品的交織。

首先，本論文帶入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¹⁰⁹ 及創傷研究¹¹⁰ 的相關論述，藉由歐力克（Jeffrey Olick）對於記憶的歷史性與公共領域的相關研究，將記憶理解為建立在集體之上的關係性研究，拆解個人記憶作為承載個人記憶的唯一途徑，將個人的主體建構擴展至集體主體的建構之上。並援用亞歷山大（Jeffery Alexander）的創傷社會學研究，將創傷區分為創傷事件及創傷狀態的不同層次，分析創傷狀態如何造成主體身分的剝奪，進而以酷兒時空對於歷史的理解，重啟回顧傷疤的可能。在同時採用修復式閱讀的觀點時，可以指出酷兒主體對於創傷的反思是建立在知悉但不必然尋求和解的互動之上，避免將和解的驅力視為唯一的目標，這有助於塑造本論文所謂的「集體酷兒修復」。在提出與和解不同目的的創傷修復方法後，接著，為了面對異性戀正典化下的酷兒生存，及在秩序、形象、生殖規範下的主體困境，延續情感修復的理論框架，本研究帶入人類學視野下的「闕限時空」（liminality）概念，¹¹¹ 指出酷兒主體如何在經歷闕限時空的幻滅後，藉由闕限時空的想像，而得以生存於社會結構的暴力當中，將此眾生相，解讀為一種酷兒生存戰術。並在此框架回應當代臺灣民眾所共同承受的不義歷史與壓迫現狀，探問危脆生命的彼此支持。延

¹⁰⁹ Jeffrey Olic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¹¹⁰ Jeffery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¹¹¹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77). ; Richard Schechner, *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續「集體酷兒修復」與「酷兒生存戰術」的理論框架，「非正典修復」揭示了在異性戀正典化框架下的家庭暴力、菁英主義、容貌壓迫及老化排斥，「愚笨」的行為模式象徵在正典規範外的無助與掙扎，亦表現出規訓的機制來自於法律及社會規範，同時也來自於受法律及社會規範制約的父母／家庭，使得酷兒主體在在異性戀正典化的規範下，無法辨識自身及手足間的創傷及修復行為。然而，當「時空物質化」（spacetimemattering）的條件得以成立時，不同的時間、空間及物質基礎促成動態親密關係的考察，酷兒主體因而重新部署這一系列的非正典化記憶及經驗，將原先被賤斥於異性戀正典化規範之外的非正典特質轉化為修復的動能，彰顯修復行動的多樣潛力與多元面向。

本論文指出陳思宏的小說為情感修復提供三種不同的路徑，其一為逾越進步史觀的時間性，提出除了和解之外的其他方法。其二則是藉由想像闊限時空的方式，展演酷兒生存戰術。其三藉由非正典化的特質，於動態親密關係中的不斷碰撞及糾纏，達到修復創傷的目的。藉由陳思宏的小說與情感理論、文化研究、酷兒理論及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本論文擬提出「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的理論框架，說明小說指出可行及不可行的戰術，提供在面對當代酷兒生存時的不同理解，邁向多元化的酷兒世界創製。

第四節、章節架構

本論文緒論首先說明同婚通過後的酷兒生存困境，並不亞於同婚尚未通過前，同時反映於酷兒群體內／外的全球化政治部署。酷兒左翼的在地批判框架雖反對被美帝國收編的同性戀正典化，然而，其仍陷入本質化在地與西方的二元對立當中。因此本論文嘗試分析根植於當代酷兒情感結構的文本，進而提供酷兒群體重新思考情感修復，及集體社會中生存的可能。回顧情感理論在北美的發展及在臺灣的脈絡化過程，以文化研究、情感理論、酷兒理論、人類學及社會學的框架理論化陳思宏小說中的情感戰術，提出「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



的情感情理論，開展酷兒世界的多元化想像，及面對各種異／同性戀正典化的生存戰術。

第二章〈不願弭平的創傷：《鬼地方》的集體酷兒修復〉，在本章中，我主要分析陳思宏的《鬼地方》，小說從主角陳天宏意外在德國殺害同志伴侶的懸案開始，由此展開其出獄後回到家鄉永靖的旅程。旅程中，主角在離／返家的辯證中不斷趨近原生家庭污穢、失倫的各種「真相」，其他的陳家人亦各自揭露自己與家庭之間層層裹覆的拉扯與扞格。此中，無論是主角或是陳家人，他們在離／返家的過程之中，正是透過對於家庭的物質性經驗與精神性想像，達到己身的主體建立：陳家人對於「鬼地方」（永靖）的連結，正是建立在「厭惡」（disgust）的情緒之上，因此即使出逃，未來也必須不斷地回家，持續地回顧這段腐敗的記憶。小說結尾更僅以「阿蟬張開嘴巴」（知了）做結，沒有答案、沒有和解。由此，我將此離／返家眾生相，解讀為一種不訴諸弭平創傷的集體酷兒修復旅程。不同角色的記憶回顧藉由交叉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因此當讀者發現某件事件的真相時，同時也開啟另一件事件的開端，創傷與修復環環相扣，形成一種因果迴圈。我指出《鬼地方》並不以批判的角度進行瓦解鄉土主流情感政治，而是聚焦於小說角色的情感展現及其彼此間的連結，突顯集體酷兒修復旅程對於情感物件與記憶的重新組裝，擬造對於未來的一種動態願景。

第三章〈閹限時空的幻滅：《佛羅里達變形記》的酷兒生存戰術〉，我由《佛羅里達變形記》為切入點，小說描述六位在1976年出生的龍子龍女，於2020年收到當年遊學團團員之一的遺書召喚，飛回當年相聚的佛羅里達，掀開遊學當年彼此不堪回首的記憶。旅途中，記憶中的性、酒精、大麻、炸雞的剩餘，堆疊出「椰子樹旅社」的魔幻性質，與龍子龍女原先倍受拘束的規訓生活鮮明對比。破格脫軌的紊亂狀態，在他者死亡之際，戛然而止；龍子龍女回歸正規生活，並約定忘卻「那件事」，從此退出彼此的生活。然而，在回憶鋪天蓋地而來之際，源於上一代的不堪真相不意揭露：原來龍子龍女的誕生及其家



庭生活的秩序，皆是「蓮觀基金會」創辦人的精心策劃，企圖創造所謂「人間淨土」。其苦心孤詣造就一切污穢的誕生，其塑造的「垂蓮小佛堂」標誌，早在龍子龍女的父母時代便埋下變形的因子。在此，我援用特納（Victor Turner）及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的「闕限」（liminal）概念，將龍子龍女赴「椰子樹旅社」的遊學時間視為一種闕限時空（liminal time and space），並將此依據闕限時空的想像而得以生存於社會結構的眾生相，解讀為一種酷兒生存戰術。龍子龍女原先約定好遺忘「那件事」，卻在日後無法停止地不斷參與彼此的生活，藉以在「好好做人」的社會結構中重溫「那件事」時的脫序及旖旎，同時介於（between）也屬於（belonging）1991及2020兩段時空的闕限主體（liminal subject）得以在性別、生活、職業等秩序的邊緣生存。最後，在闕限時空埋下的不穩定因子，也在彼此重回佛羅里達時達到不穩定的高峰，彼此放下偽裝，終於鬆脫。由此，我認為作為一部臺灣酷兒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描述了，遭受宗教及家庭箝制的酷兒角色如何以闕限時空幻滅後的想像維繫生存，並進一步回應了當代臺灣民眾所共同承受的不義歷史與壓迫現狀，探問危脆生命的彼此支持。

第四章〈動態親密關係：《樓上的好人》的非正典修復〉，在本章中，我主要分析「夏日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樓上的好人》。故事描摹被黑道追債的大姐，逃離至小弟居住的柏林躲避風頭，進而迎來「遲到」的性啟蒙及「協助」小弟修復幼時所受到的集體創傷。然而，故事中的創傷皆是依靠無法辨識性向、以及無法理解創傷的大姐，藉由大姐愚昧與小弟聰穎的個性張力，以達到彼此的救贖。我將此基於「非正典性」的修復行為，解讀為一種非正典修復。大姐不斷上演自我批判及自曝其短的戲碼，看似陷入父權結構的網羅當中，實則藉由柏林經驗所打造的「時空物質化」條件，促成不同時間段的角色經驗及記憶，共同化成當下的「網內互打」（intra-action），反思原先在異性戀正典化結構下各種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老化排斥等特質。進而駁斥現代



性思維下的線性進步史觀，視柏林比員林更開放及進步，而是在重部署合這一系列的記憶與經驗後，選擇透過修復的行動來處理這段經驗。

結論，在本章中，我指出陳思宏的小說為情感修復提供三種不同的路徑，第二章指出逾越進步史觀的時間性，提出除了和解之外的其他方法。第三章延續集體創傷的基礎，藉由想像闢限時空的方式，展演酷兒生存戰術。第四章則透過非正典修復及時空物質化的概念，促成網內互打的交織，反思異性戀正典化中的各種賤斥行為。藉由陳思宏的小說與文化研究、情感理論、酷兒理論及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我提出「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的理論框架，說明小說指出的各種生存戰術及修復性思考，提供在面對當代酷兒生存時的不同理解，建立酷兒理論／情感理論的地脈絡，不僅複雜化作為旅行理論的北美理論，更加使臺灣的酷兒文學邁向多元化的酷兒世界創製，披露異性戀正典化下的多種生存模式。

第二章、不願弭平的創傷：《鬼地方》的集體酷兒修復

風要她對小兒子說：「別哭了。」來自波羅的海的風，來自白宮遺書的風，來自楊桃園的風，都一直說，別哭了，別哭了，別哭了。

——《鬼地方》¹¹²



「厭惡」這個詞是由主體表達出來的，作為描述事件的一種方式，它的作用是將事件創製為一個邊界對象，作為我們不是什麼也不可能什麼的標記。

——《情緒的文化政治》¹¹³

第一節：小說作為集體記憶的載體

2020年，陳思宏的《鬼地方》榮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年度大獎，旋即於2022年出版英文版，各大報章雜誌及書評的刊登，顯示出《鬼地方》在國際版面上一定的能見度。其中，《紐約時報》對其的評語則顯示出陳思宏對於記憶處理的態度：「陳思宏的《鬼地方》在文學上就像一個滿到不行的文學行李箱，人物、回憶、遺憾、選擇、後果、秘密、歷史、政治、地產、性等元素緊緊貼在一起，有如長途旅行後待洗的衣物；稍微打開箱子，髒衣服就會溢出來。」¹¹⁴ 陳思宏將大量原鄉中的資訊量鑲嵌進小說的敍事當中，並不在於以文學的方式，進行自我披露，¹¹⁵ 亦不在於以大量的後現代拼貼技法，炫人耳

¹¹² 陳思宏，《鬼地方》（臺北：鏡文學，2019），頁334。

¹¹³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97.

¹¹⁴ Peter C. Baker, "Title of Article or Pag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0/books/review/kevin-chen-ghost-town.html>

¹¹⁵ 關於文學與自我／真實間的關係，可參考，高行健，〈文學的見證——對真實的追求〉，《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頁165-174。



目。¹¹⁶ 而是在披露原鄉污穢的一面的同時，對於記憶的可靠性及真實性提出質疑，更是對於反同立場的強烈控訴，¹¹⁷ 面對各種性／別／家庭／種族／階級等多方面的暴力，正如我於緒論所述，陳思宏對這段暴力記憶的回應，似乎沒有答案，甚至認為「不和解才是寫小說的目的」，¹¹⁸ 陳思宏以小說為媒介，創製與「創傷→修復→和解」不同的時間性。在臺灣文學史中，文學敘事時常既是個體與國族經驗的再製載體，同時也是構成創傷記憶的文化重塑過程，¹¹⁹ 陳思宏不僅同樣承接臺灣文學史的脈絡，更思考對於和解時間性的創製，為我們開啟一條不訴諸弭平創傷的必然和解之路。因此本章旨在探問，陳思宏的小說，以什麼樣的策略，在進步的線性史觀的背景下，提出不訴諸弭平創傷的另類修復路徑，關照「危脆生命」（precious life）¹²⁰ 間的彼此聯繫，展現本章所謂的「集體酷兒修復」。

¹¹⁶ 劉乃慈，〈奢華美學：台灣當代文學生產〉（臺北：群學，2015）。另外，陳思宏的〈平的歪的直的〉曾獲第八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然而，楊照卻在決審會議時認為「這篇很像創作所學生寫出來的作品，有很多ingredients：它必須處理諸多社會問題，並用各種方式顯現，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最後需要寫出那場葬禮，因為作者必須告訴我們為何小禿禿會禿頭等……每個人都代表一種社會的病症，或折射一般通俗心理學會告訴我們的東西。但整篇小說讀起來感覺不自然，像是經過set up，一塊一塊的東西拼起來只為了給我們理由，把該有的議題都放進去，但每一個象徵意義都過於直接、缺乏節制。」並給予零分的批評。楊照的評價不僅忽略小說作為情感結構的載體所呈現的物質性記憶，也沒有關注龐雜的集體性如何拆解和解時間性的動能。孫梓評紀錄，〈【自由副刊】尊重小說的技藝－第八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決審會議紀錄3之3〉，《自由副刊 文學庫》（2025年1月24日。<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637274>）。

¹¹⁷ 陳思宏，〈後記〉，《鬼地方》，頁335-339。

¹¹⁸ 蔣怡婷，〈他與德國男友登記為伴侶 姊弟互虧都是為了愛〉，《鏡週刊》（2023年12月27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5>）。

¹¹⁹ 張俐璇，〈重慶之民，自由之國：「後1949」臺灣小說中「民國文學機制」的承繼與演繹〉，《中國現代文學》，26（2014），頁89-105。

¹²⁰ 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規範圖式的角度進行闡述，思考媒體如何藉由規範圖式定義什麼樣的生命可以成為人類、活生生的生命抑或是哪種死亡才是可供弔唁的，而被規範圖式排除在外的脆弱性生命，則稱之為危脆生命。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中文版為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申昀晏譯，《危脆生命》（香港：手民出版社，2023）。



其實，早在其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指甲長花的世代》中，陳思宏便已質疑線性時間所產生的正典化傾向：

我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妳才要有節制呢！妳要走進婚姻了，那個人，懂妳多少，那個人，妳懂多少？哈哈哈哈哈哈，我早有節制了，事實上，我早不玩了，那關於如何成功如何成為CEO如何致富如何促進親子關係，我早就不在體制內了，林靜姿，我們現在說的是不同的語言，戴不同的面具，關於節制，我們必須放在不同的領域來說。妳，是節制的最好典範，不亂，規矩，不離開，只留下，記不記得……¹²¹

小說中不僅重新看待服用百憂解的小說主角，更對於制度、家庭關係、成功人生等進行質疑，拆解個層面正典化的束縛，各種漫漶的性與毒品，也開啟性／別間流動的界線。然而，正如孫梓評所言，在小說翱翔至看似逾越一切束縛的時候，最後卻仍回歸父親身上，無法逃脫身為「大他者」（big Other）的父親象徵的陰霾。¹²² 小說的結尾也以看似逃脫束縛的絢麗及荒謬的文句作結，實則是映照出自我的困境。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陳思宏的小說創作生涯中，對於情感的關注早在《指甲長花的世代》問世時，便已奠定：

我把這些聲音寫成一篇篇小說。有憤怒、悲傷、歡慶，都是我對於這個世界的觀察。我相信每個面孔背後都有個龐大的過去，都是一篇篇獨特。我喜歡挖掘筆下角色的過去，就像我喜歡翻閱自己的過去。¹²³

陳思宏對於各種情感的理解，建立在角色各自獨特的歷史性上，他不以批判或是讚揚的口吻評論這段歷史，拆解作者的權威性，而是披露這段歷史，將詮釋權力留給讀者完成。

¹²¹ 陳思宏，〈指甲長花的世代〉，《指甲長花的世代》（臺北：麥田，2002），頁160。

¹²² 孫梓評，〈太陽之屋——陳思宏小說裏的「父親形象」〉，陳思宏，《指甲長花的世代》，頁8-9。

¹²³ 陳思宏，〈後記：依戀過去式〉，《指甲長花的世代》，頁235。



延續對於情感及創傷的關注，在陳思宏的小說創作中，〈廁所裡的鬼〉¹²⁴是在披露原鄉的污穢及創傷的作品中的範例之一，小說扣合臺灣的產業發展歷史，在九〇年代，臺商大舉西進中國的背景下，臺灣企業渴望在中國賺大錢，¹²⁵並以企業獨子回鄉舉行婚禮為故事的主軸。故事所披露的污點，除了母親因父親前往中國投資時包二奶的創傷外，¹²⁶更是主角於年幼時遭受鄉長獨子脅迫男男口交的創傷。故事結尾於婚宴辦桌時，突然狂風大作，整個帆布都被掀翻，大家都急於逃難，母親最後卻笑著說：「你走，現在。」對於年幼時的性別創傷，陳思宏以第三者的角度進行披露，娓娓向我們道來一則故鄉中的創傷事件，最後卻以戛然而止的方式終結，只隱隱留下母親的一句「你走，現在」，暗示著「混亂的荒謬劇場尚未結束」，¹²⁷而荒謬的結局則是在《鬼地方》這部小說中予以完成。

延續這股對於情感的剖析與解構，陳思宏的《鬼地方》重新看待這些情感所產生的能動性。故事描繪主角陳天宏及陳家人如何面對家鄉永靖中各種見不得人的幻滅、污穢、創傷所形塑而成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並藉由重新返家的旅途，揭開不為人知的創傷。小說共分為三個部分，四十五個小節。每一個小節的主角皆不同，從陳天宏到大哥陳天一、大姐淑美、二姐淑麗、三姐淑青、四姐素潔、五妹巧媚、爸爸陳天山及媽媽阿蟬等人。不同角色的故事彼此交織成《鬼地方》一書，同時暗示著不同角色的主體建構必須建立在彼此的記憶之上。另外，在每個小節中，僅有死去的角色如爸爸及五妹以第一人稱出現，其他以仍然活著的角色為主角的小節則以第三人稱敘述，某種程

¹²⁴ 陳思宏，〈廁所裡的鬼〉，《去過敏的三種方法》（臺北：九歌，2015）。

¹²⁵ 耿曙；林琮盛，〈全球化背景下的兩岸關係與台商角色〉，《中國大陸研究》，48(1) (2005)，頁1-28。

¹²⁶ 關於臺商於中國「包二奶」的研究可參閱邱錦添，〈台商在大陸包二奶所衍生之法律問題〉，《市師社教學報》，2 (2003)，頁57-72。

¹²⁷ 季季，〈【第十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廁所裡的鬼 評審意見〉，《自由副刊》（2023年12月28日。<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839323>）。



度而言，似乎也預設著藉由全知的「鬼」，訴說一個關於「鬼地方」的故事，嘗試帶出關於陳家人集體記憶的真相。

本章將進入《鬼地方》的文本結構，論述其如何藉由不同角色彼此交織的記憶形塑並修復集體創傷。小說中的集體記憶並不是完全建立在歷史社會學為了探討歷史責任的咎責而探討的集體記憶之上，而是透過彼此見證所形成的主體記憶，站在修復式閱讀的角度重新理解主體的意義，體現我所謂的集體酷兒修復。接著，我嘗試釐清角色離／返家的必要，細緻分析角色的創傷事件及創傷狀態，嘗試釐清不同角色作為彼此見證人的身分如何建構其主體性，藉由創傷事件的見證及創傷狀態的不斷記憶，交織成集體創傷敍事，並以集體記憶為工作途徑，發展集體酷兒修復的概念。

第二節：集體記憶的修復性

在論述文本內容及結構前，勢必得先釐清「創傷」、「集體記憶」及「修復」間的交織關係，及集體記憶如何與修復產生聯繫，並形成本文所謂的「集體酷兒修復」。由於創傷及創傷的修復，都是在創傷事件（traumatic event）發生後的行為，因此都必須建立在對於記憶的想像之上，而正因以想像為成立基礎，創傷成為一個不可再現的事件。克維特科維奇（Ann Cvetkovich）將創傷視為描述資本主義生活的一種情感語言，並將分析重點放在創傷事件的輻輳之上，視之為一種產生集體反應的集體經驗；她並以酷兒理論的角度思考創傷，將創傷去病理化（depathologizing），使得對於創傷的理解，超越醫學的範疇，擴展並包括至文化與公共建設當中。¹²⁸ 對於克維特科維奇而言，創傷的不可再現不只是反應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以精神分析為基礎所得出的結論，也就是檔案從根本上無法是記憶的來源，這標誌著創傷經歷的記憶的缺失最終導向所有記憶的邏輯，而即使在無意識中，記憶也無法被歸檔。記憶的缺失所掩

¹²⁸ Ann Cvetkovich, *An Archive of Feelings: Trauma, Sexuality, and Lesbian Public Cultur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48.



蓋的創傷，更是體現在各種外部歷史的物質性層面，建立在杜根（Lisa Duggan）所謂的「公共萎縮」（shrinking public）之上。¹²⁹ 伯蘭特（Lauren Berlant）便以「親密的公共領域」（intimate public sphere）重新銜接私領域與公領域間的界線，並思考親密關係如何介入公共空間，進而影響社會變革。¹³⁰ 克維特科維奇延續伯蘭特對於「親密的公共領域」的研究，以文化形態將創傷性歷史帶入公共領域，並利用情感體驗的敘述來改變我們對公共組成的認識。因此無論在克維特科維奇或伯蘭特的論述中，創傷都不在僅僅是精神分析學上的心理創傷，而是因社會文化上的創傷事件，導致主體的被遺忘所產生的物質性創傷。

延續對於創傷事件的無法再現，亞歷山大（Jeffery Alexander）更加細緻地區分創傷的不同模式，他同樣視創傷為文化及社會建構的產物，並以自然主義的謬誤批判啟蒙式及精神分析式，兩種看待創傷形成過程的態度。亞歷山大將創傷區分為創傷事件及創傷狀態（traumatic status），認為創傷事件本身並不具備創傷性，而是在創傷事件過後，對於創傷事件的捕捉、聯想、濃縮，甚至審美創意，將事件本身塑造成某種特定的狀態。而創傷狀態被認定為想像的創傷性，並不是因為實際上它們所造成的危害，而是在這個狀態中傷害了集體身分，也就是個人安全感根植於提供安全感和能力的情感和文化結構。¹³¹ 在此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亞歷山大以創傷事件發生後的想像形容創傷狀態，並不意味著創傷狀態的想像模式必須建立在創傷事件發生的一段時間後，而是類似於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dasein）」。「此在」是一種人類存在的特殊方式，意指一種能夠意識到自身存在、並對存在本身提出追問的存在者。對海德格而言，人不是單純地活著或存在，而是總是帶著一種對自身處境的理

¹²⁹ 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22-42.

¹³⁰ Lauren Berlant, *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³¹ Jeffery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30.



解與關切，活在與世界密切相連的關係網絡中，因此「此在」必然是「在世界之中存在」。¹³² 亞歷山大以認識論的角度及海德格「此在」的概念，重新審視創傷如何對集體及個人造成影響，旨在銜接創傷及創傷對於建立在情感結構的身分上的撼動，以一種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式的「宗教想像」（religious imagination）¹³³ 產生作用。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歐力克（Jeffrey Olick）認為個人雖作為承載記憶的主體，但若個體的記憶沒有與他人產生關係性，便如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言的單一聲調的獨立存在般，無法產生意義的理解，因此個人主義式記憶的來源仍然是由社會建構而成。歐力克細緻化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間動態化的關係，強調對於創傷的理解必須建立在「記憶工作」（memory work）之上。¹³⁴

上述對於創傷、檔案及記憶間的研究，都提供我們重新審視這幾個概念間的複雜性，以《鬼地方》為例，當陳家人彼此記憶相互建構的同時，接踵而至的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污穢真相及「鬼地方」永靖對於陳家人所造成的集體創傷。而這種對於創傷事件的想像，對主體身分造成結構性的撼動，及酷兒主體的形塑並不是藉由創傷事件本身所造成影響，而是藉由後續一連串的創傷狀態，也就是對於創傷事件的想像所構成。¹³⁵ 然而，對於賽菊寇（Kosofsky Sedgwick）而言，面對集體創傷事件／狀態，人們往往以偏執式（paranoid）的方式進行一種防禦，這種偏執狀態標誌出對於仇恨和嫉妒部分客體所產生的預

¹³²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¹³³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¹³⁴ Jeffrey Olic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7-37.

¹³⁵ Jeffery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6-30.



防性投射，就根本而言，偏執式閱讀反應出對於同性慾望的壓抑，因此理解偏執式閱讀的同時也是理解恐同及異性戀的運作機制。¹³⁶

延續緒論對於賽菊寇修復式閱讀的理解，她將偏執同樣視為一種情感，是我們面對於追求真相的一種「附著」（attachment），因此當人們在思考問題時，總是希望可以追求一個「目標」或「真相」。¹³⁷ 也就是當我們以偏執式閱讀的方式看待《鬼地方》時，便會訴諸於一種需要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鬼地方》的價值卻恰恰體現在其對於創傷的沒有解方／和解的結局之上，強調一條不以線性發展為依歸的修復路徑。本章以「酷兒修復」的概念取代「情感修復」一詞，意在著重於酷兒本身具備的邊緣性、荒謬性及對於身分政治的思考，因此，酷兒修復指得是關注於具身分邊界特性的情感修復。

陳思宏的《鬼地方》正是藉由重新返家的過程直面原鄉的集體創傷，在離／返家的過程之中，透過對於家庭的物質性經驗與精神性想像，達到自身的主體建立。小說中的實際時間僅有一天，但藉由回憶的方式回顧數十年來的記憶，不同角色的記憶回顧也以交叉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不同主體也在想像創傷事件的過程中，形成所謂的創傷狀態，進而撼動原先穩固的身分結構。而當讀者發現某件事件的真相時，同時也開啟另一件事件的開端，創傷與修復因此環環相扣，形成一種因果迴圈。

小說中創傷與修復的不斷產生，使得集體創傷成為一種不願弭平的記憶，在面對真相的幻滅、污穢及主體所承受的集體創傷時，故事的結局並非訴諸和解，而是跳脫偏執式閱讀預防性的窠臼。由此，本文將此離／返家眾生相，解讀為一種不訴諸弭平創傷的集體酷兒修復旅程，正如同陳思宏所言：「敞開，是我的書寫策略。我寫疾病，寫傷口，寫長大，寫失落，其實都是為了爭自

¹³⁶ Sedgwick, Eve Kosofsky,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Wen Liu, "Pandemic Paranoia: Toward a Reparativ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Psyche" *Psychoanalysis, Culture, & Society*, 24(4)(2021): 608-622.

¹³⁷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123-151.



由，一步一步，奪回身體的自主權。」。¹³⁸ 集體酷兒修復旅程的目的不在於避免集體創傷的可能，而在於藉由彼此連結的事件當中，同時作為當事人及見證者（witness），將集體記憶視為一種中介，分析它的運作，¹³⁹ 如何在所有事件交織、糾纏成混亂不堪的真相當中，建構其主體性。藉由永靖的物質性基礎及創傷事件的精神性想像，回顧腐敗的集體記憶，達到修復的可能。

第三節：《鬼地方》中的創傷事件與創傷狀態

《鬼地方》中不同角色所面臨的創傷事件非常多，並且各項事件及事後的創傷狀態皆互相交織、糾纏，使得要離析彼此事件對於角色作為事主／見證人所造成的創傷並不容易，諸如親屬／婆媳／夫妻間的各種家庭暴力，以及對於女性和同性戀的歧視與壓迫。¹⁴⁰ 然而，在面對如此繁複又如同偵探小說般一一抽絲撥繭、揭開真相的集體敘事中，大量的物質性基礎及精神性想像藉由碎片化的不同小節拼湊而成，原鄉中的秘辛、醜聞如被塞滿的行李箱般，在被逐漸鬆脫的過程中，傾囊而出。不僅可以對讀者造成知識性上的滿足，¹⁴¹ 更重要的是，突顯出故事中並沒有單一主體建立的存在，同時意味著故事中個體的記憶建立在彼此的關係性之上。

創傷事件的成立依賴集體共同完成，個人對於事件的記憶也依附在集體記憶之上，因此在分析小說中角色的主體性建構時，同時也是在釐清造成彼此關係的創傷事件如何成立。《鬼地方》中陳天宏酷兒情慾的揭露建立在與鄰居菁仔欖同榻而眠時，被母親阿蟬發現後，同時父親陳天山與菁仔欖也有一段不可

¹³⁸ 陳思宏，《鬼地方》，頁4。

¹³⁹ Jeffrey Olic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¹⁴⁰ 邱美衡，〈地方、空間、創傷記憶敘事／陳思宏《鬼地方》的家鄉書寫〉（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¹⁴¹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74；趙帝凱，〈華語語系台灣鬼魅敘事的性別與家國：以聶華苓、李昂與陳思宏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系碩士論文，2021），頁85。



告人的同性戀情，另外陳天山與菁仔欖的戀情也是在阿蟬發現陳天宏與菁仔欖共眠時，憤而向政府檢舉菁仔欖與書店胖瘦老闆共組讀書會，閱讀左翼思想一事，造成胖瘦老闆被捕，菁仔欖逃亡的後果。事件與事件的連結無法果斷地切割，在每個角色返回家鄉，重新面對集體記憶的同時，牽連出真相與創傷的聯繫，同時具有事主及見證人的雙重身分，彼此厭惡永靖這個鬼地方，卻又重返鬼地方，嘗試修復創傷。

小說中每位角色對於鬼地方的「厭惡」（disgust）正是建立彼此聯繫，及確認主體建立的情感依據。阿妹（Sara Ahmed）指出將「厭惡」的情緒視為一種品味低下的狀態，人們在接觸／食用到被視為厭惡的事物時，反應出不悅的情緒及排斥的狀態，使得主體意識到與厭惡客體的差異，進而形塑其主體意識。然而厭惡的情緒並不基於純粹的精神性想像當中，必須建立在實際觸碰之上，只有當主體的嘴巴親自品嚐到具有壞味道的食物時，這種「壞味」才會被感知為一種品質。¹⁴² 這反映出《鬼地方》中各個角色的主體建立，正是因為意識到厭惡的情緒，甚至接觸到讓其感受到厭惡情感的物質、記憶與空間，才得以存在。

然而，《鬼地方》中的角色並不完全如阿妹所謂主體因厭惡的情緒而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反倒是反客為主，以作為一個客體的對象因他人厭惡的情緒，而意識到自我的存在，進而展現在被賤斥的過程所產生的能動性。不同的角色經由不同的創傷事件及狀態反思作為主體的意義，即使創傷使得主體承受偌大的傷害，但也正是創傷使得主體性彰顯。陳天宏作為間接導致菁仔欖逃亡的事主兼見證人，在陳天山設宴殺蛇款待陳王兩家，為慶祝老王及陳天山投資有成時，阿蟬將蛇湯捧至王家給受傷的菁仔欖食用，不小心誤見陳天宏枕在菁仔欖的腰間，雙手緊握著菁仔欖的那根，並注意到菁仔欖只是在假睡。¹⁴³ 這使得阿蟬對菁仔欖心生怨恨，即使背後真正的原因是阿蟬發現菁仔欖與陳天山

¹⁴²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82-100

¹⁴³ 陳思宏，《鬼地方》，頁163-165。



有染，但阿蟬將對於菁仔欖的厭惡轉架到陳天宏身上，因此對陳天宏的酷兒情感感到厭惡，憤而對其辱罵及毒打，並且認為陳家會家破人亡都是因為生了「法捨」（[khioh-kàk]）的陳天宏的緣故，甚至後悔生下他。¹⁴⁴ 藉由事主及見證人的雙重身分，陳天宏與菁仔欖、阿蟬、陳天山建構了對於創傷事件的集體記憶，其中，阿蟬對於陳天宏的厭惡情緒更使得陳天宏意識到自己如何無法見容於鄉土主流性別政治當中，同時身為一個被厭惡的存在。

此中，當我們討論到鄉土性別政治的「主流化」時，實則反應了當代對LGBTQ身分和社群的理解，同性戀社群的出櫃與未出櫃的個人，這組二元對立的關係映射到了地理和文化劃分當中，似乎使我們將都市與出櫃聯繫在一起，而將鄉村與封閉和恐同聯繫在一起。然而，研究鄉村酷兒（queer rurality）的學者早已指出這不僅本質化鄉村及都市的差異，也忽略鄉村地區蓬勃發展的LGBTQ社群及個人政治。¹⁴⁵ 因此本章在此所謂的鄉土主流性別政治，意味著對於性別意識的低落、較不注重性別平等、忽視多元性別及對於各種性傾向的友善對待所形塑的異性戀正典化，¹⁴⁶ 並非忽視鄉土中展現各種生命韌性的酷兒社群及主體。¹⁴⁷ 另外，此處以見證人作為主體建構的創傷概念，不僅涵括阿岡

¹⁴⁴ 陳思宏，〈鬼地方〉，頁162、225。

¹⁴⁵ Katie Schweighofer, "Rethinking the Closet: Queer Life in Rural Geographies," in *Queering the Countryside: New Frontiers in Rural Queer Studies*, ed. Mary L. Gray, Colin R. Johnson, and Brian J. Gilley (New York: NYU Press, 2016), 223-225.

¹⁴⁶ 許振傑，〈台灣中南部大學生之性別意識、語言性騷擾知覺及語言性騷擾態度之關係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2021）。

¹⁴⁷ 曾秀萍曾以《失聲畫眉》為例，破除對於「純淨」鄉土的看法，正視建立在鄉土背景的《失聲畫眉》中所展現的各種女同志情慾及酷兒能動性。曾秀萍，〈鄉土女同志的現身與失聲：《失聲畫眉》的女同志再現、鄉土想像與性別政治〉，《淡江中文學報》，35（2016），頁1-35。



本 (Giorgio Agamben) 以見證人的集體記憶嘗試再現歷史事件的真相，¹⁴⁸ 更重要的是著重於見證人如何藉由「見證」一事建構其主體性。

陳天宏得以經由「見證」菁仔欖逃亡、陳家家破人亡的原因正在於創傷狀態的體現，也就是想像創傷事件。對於創傷事件的想像建立在固有經驗的思考，通過聯想、濃縮重新創造記憶，創傷的建構必須經由再現的方式提供信息，使得創傷主體 / 見證人具有臨場感，因此創傷狀態屬於建構式的集體記憶，而創傷狀態被理解為再現的傷害意味著它並非具有實際的危害性，指得是這種現象傷害了集體身分，轉變個體根植於情感及文化結構的安全感。¹⁴⁹ 阿蟬在陳天宏導師到家裡指控陳天宏勾引導師兒子時，經由精神性的想像，重新建構對於創傷事件的理解，形成創傷狀態，將早已發生過的事件：見證陳天宏握著菁仔欖的那根、菁仔欖與陳天山的曖昧戀情、檢舉菁仔欖與胖瘦老闆的讀書會等事件重新組配。這些創傷事件動搖阿蟬對於鄉土性別政治的想像，破壞既有的安全感，伊德曼 (Lee Edelman) 指出孩童的誕生加固異性戀生殖未來主義與異性戀機制的穩定性，因此酷兒無法生育的現象將顛覆生殖未來主義，形成一種死亡驅力 (Death Drive)，因此對於伊德曼而言，酷兒不僅擾亂身分政治的穩定，更是一種反對政治性，反對重塑社會秩序的訴求。¹⁵⁰ 然而，在《鬼地方》中，酷兒的無法生育不僅被社會秩序抹滅，更是希望酷兒主體受到精神性及肉身性的雙重毀滅。阿蟬以辱罵的方式，責問陳天宏怎麼不去死：「她說，你袂記得，你小時候，害死了菁仔欖。變態。汰捨。白目。七月半鴨仔毋知死。怎麼不去死。做鬼我們看不見，看不見就不汰捨。」¹⁵¹ 面對鄉土主流性別

¹⁴⁸ 阿岡本認為必須正視證言的不可能性及必然的空缺，以文學為媒介的再現模式方才可能，也就是說阿岡本認為必須認清本質上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因此集體記憶則由建構、再現等方式進行闡述。Giorgio Agamben,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orgio Agamben,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¹⁴⁹ Jeffrey Olic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13-15.

¹⁵⁰ Lee Edelman, *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⁵¹ 陳思宏，《鬼地方》，頁166。



政治的絕對性宰制，酷兒的出現無法如伊德曼所說撼動生殖未來主義，甚至以翻轉的方式展現，希望酷兒孩童的滅亡，以終止這段離經叛道的酷兒經驗，如此不僅維繫陳家延續香火的可能，更可保障主體對於情感及文化結構的安全感。而阿蟬及陳天宏也在鄉土性別主流政治的大蠹下，經由見證創傷事件及想像創傷狀態的集體建構，紛紛意識到其受創的主體性。

另外，陳天宏在意識到自己是被厭惡的主體後，仍然嘗試展現其能動性，他遵照母親的意願，離開臺灣，前往德國，甚至放棄臺灣的護照，從此與永靖，與鬼地方斷裂。¹⁵² 這種斷裂同時象徵受創後所形成的變形主體，陳天宏在經歷創傷事件及創傷狀態後，創造了一個新的主體，一個未經歷過先前事件，與過去經驗斷裂的主體，¹⁵³ 即使不是以死亡的形式回應，仍然是被排除在永靖的主流性別政治規範外的裸命（bare life）。¹⁵⁴ 然而，正是這個被視為非人的酷兒身分造就陳天宏主體的能動性，阿蟬將陳天宏貶斥為鬼，欲將之排除於視線之外，以抹殺挾掩的缺陷。武雅士（Arthur Wolf）與埃亨（Emily Ahern）在討論中國及臺灣民間信仰時，曾提出一個天庭與人間的平行象徵結構，分別是天庭：「神明——祖先——鬼」，對應人間：「官員——人民——化外之民」。¹⁵⁵ 因此在「鬼」的實質意涵及象徵上皆具有被排斥出文化之外的意義，在此意味著將陳天宏貶斥為鬼，同時也象徵將之排斥於家庭社會當中。趙帝凱進一步指出《鬼地方》中具有幻魅寫實主義（phantasmagoria realism）的鬼魅手法，將鬼打造為敘事者之一，作為敘事結構中的一個環節，具有革命性的力

¹⁵² 陳思宏，《鬼地方》，頁226。

¹⁵³ Catherine Malabou, Steven Miller(Trans.), *The New Wounde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1-153.

¹⁵⁴ 阿岡本的裸命指得是被國家排除身分、剝奪權力的人，因此著重於國家權力的強制性，探討國家如何藉由身分的排除操控裸命的人。而本文則是借用裸命的排除概念，探討主流性別政治如何排除酷兒的身分及剝奪其權力。Giorgio Agamben,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D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⁵⁵ Arthur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182; Emily Ahern,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量，造成小說線性時間的斷裂。¹⁵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陳天宏在此並非真正的死亡，並成為鬼魂，而是阿蟬以鬼為象徵，將其身分進行排除。此處將鬼魂與酷兒連結，除了象徵鬼魂沒有實際肉身性（corporeality），因此無法被看見外，更是賦予陳天宏超越人類時間界線的意義及化外之民的象徵，人類生存所必需面對的壽命的限制，對於鬼魂而言已不再是無法逾越的障礙。¹⁵⁷ 即使陳天宏並非真正死去，成為亡魂超越時間的限制，但其被視為鬼的酷兒身分所形塑的酷兒時間性（queer temporality）不僅瓦解異性戀線性的時間，更埋下對於過去記憶可塑性的因子，¹⁵⁸ 證成未來進行集體酷兒修復時的有效性。在此陳天宏無法生育的酷兒性（queerness）不僅不如伊德曼所謂的反對政治性，反對重塑社會秩序的訴求，而是極具對於未來擬造的驅力，以記憶中的酷兒經驗，嘗試在未來進行修復。

由此，陳天宏與阿蟬經由彼此及菁仔欖、陳天山、胖瘦老闆等人的集體記憶，以事主及見證人的雙重身分，見證彼此的創傷事件，並經由精神性想像將創傷事件轉化為創傷狀態，最後交織而成彼此的集體創傷。阿蟬也因集體創傷排除陳天宏的身分及權力，嘗試毀滅酷兒帶來的死亡驅力，維護鄉土性別主流政治的霸權，形成一種在多重創傷事件及創傷狀態中所形塑的主體性。然而，陳天宏的酷兒主體雖然是建立在被厭惡及集體創傷之上，但酷兒時間性的意義同時為未來埋下伏筆，開啟陳天宏在離／返家的集體酷兒修復旅程中，重啟傷疤的可能。

第四節：發展集體酷兒修復

¹⁵⁶ 趙帝凱，〈華語語系台灣鬼魅敘事的性別與家國：以聶華苓、李昂與陳思宏為例〉。

¹⁵⁷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2006），頁124-125。

¹⁵⁸ Jack Halberstam,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鬼地方》中的「鬼」象徵的不僅是實體意義上的鬼魂，更是對於角色內心創傷的隱喻，鬼影充斥的永靖預示著女性遭受各種父權體制的壓迫、酷兒身分遭受鄉土性別主流政治的排斥及黨國暴力的荒謬。¹⁵⁹ 每個角色都曾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集體創傷：阿蟬、陳天山與殺蛇人彼此間受到倫理束縛的壓迫、陳天宏、陳天山與胖瘦老闆的酷兒身分、三姊淑青受到主播老公長期的家庭暴力、四姊素潔、五妹滿妹與王家大兒子間的戀愛搶奪等等。

究其實，這一切暴力及宰制的力量都原於倫理作祟：「她（阿蟬）依照婆婆指示，重新煮了一桌，結果被痛罵錯過祭拜吉時，一定是故意讓祖先餓肚子，一巴掌撞上她的臉。」¹⁶⁰ 「阿嬤的巴掌不斷撞上她們的身體，打累了，阿嬤衝進教室跟老師拿了教鞭，往三姊妹身上甩去。」¹⁶¹ 「老公善用那短短五分鐘，拿剪刀把她的露背洋裝剪爛，拳頭撞上她的身體，絕不打臉也不抓髮，從衣櫃抓了一件紅色長袖套裝逼她換上。」¹⁶² 「母親毆打他（案：陳天宏），拳是刀，腳是劍，但最凶狠的是嘴，傾倒各種台語咒罵，字字火燙。」¹⁶³ 「『警方破獲同性戀犯罪雙人搭檔，彰化永靖明日書局老闆假開書店之名，實為拍攝淫亂色情片，散播販賣，妨害風化。』」¹⁶⁴ 根植於婆媳、長輩晚輩、夫妻、同性戀異性戀、政府平民間的倫理關係，在《鬼地方》中一一以荒謬弔詭的形式展現，親人間的身體及精神暴力建立在父權宰制之上，而

¹⁵⁹ 趙帝凱，〈華語語系台灣鬼魅敘事的性別與家國：以聶華苓、李昂與陳思宏為例〉。

¹⁶⁰ 陳思宏，〈鬼地方〉，頁52。

¹⁶¹ 陳思宏，〈鬼地方〉，頁88。

¹⁶² 陳思宏，〈鬼地方〉，頁46。

¹⁶³ 陳思宏，〈鬼地方〉，頁225。

¹⁶⁴ 陳思宏，〈鬼地方〉，頁323。



酷兒情感的展現也被鄉土主流性別政治排斥於外，戒嚴時代的政府也將同性戀污名化，羅織販售色情片以掩蓋其組讀書會閱讀左翼書籍的罪行。¹⁶⁵

然而，當倫理界線產生模糊的狀態，抑或主體逾越倫理的規範時，集體酷兒修復便成為可能。正如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拒絕將酷兒視為純粹的解構性舉動或純粹消極的立場，弗里曼以身體的感官經驗及物質性，分析「色情歷史學」（erotohistoriography），視S / M關係是使用身體作為重新部署時間的工具，成為一種歷史記錄，其中歷史本身的線性時間受到質疑，而過去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或消失，反而形成一種與線性時間異步的「色情時間機器」（erotic time machine）。¹⁶⁶ 陳天宏與菁仔欖的情慾關係雖非弗里曼所言的S / M關係，但彼此在權力的配置上仍有一定的差距，陳天宏的年紀較小於菁仔欖，¹⁶⁷ 家庭的經濟條件也遠落後於地方大亨小兒子的菁仔欖，因此面對年紀及階級的懸殊差距，懵懂年幼的陳天宏在菁仔欖慇惠下，半推半就地與其發生同性性關係，形成了如同S / M間的主奴關係，使得在未來中，這段個人及集體過去的創傷經歷可以透過特殊結構的情慾動力重新組織，從而表現出另一種看待過去時間性

¹⁶⁵ 白色恐怖時期，執政者時常將「變態情慾」與共產黨畫上等號，這是一種以國家安全為名，肅清社會內部的異意分子，因此所有影響社會秩序的行為都可能與共產黨產生聯繫，並以去人性化的論述方式，從政治異意擴展到性別主體上的策略。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41-64。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頁88-99。

¹⁶⁶ 弗里曼指出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在被罷黜爵位後，不僅擾亂法國共和曆的時間秩序，而在S / M行為中，透過對一種失落的皇權的形式進行性寓言，其所實現的歷史異步，與透過鬆解行動所實現的時間異步相結合，使得S / M不僅不是反對一切持久性的規範，而是對於復興歷史上特定的社會角色的堅持，但通過性與身體的感官，重新部署的一種新的時間性。Elizabeth Freeman, *Time Binds: Queer Temporalities, Queer Histo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7-169.

¹⁶⁷ 根據基進女性主義法學的論述，年齡的形式化區分，會導致荒謬的「推定同意」觀念，例如在法定性自主決定年齡之前，未成年人被視為無法同意，而過了該年齡後卻被推定為有能力同意。這種觀點忽視了年齡本身並不能準確反映性自主決策能力，進而使某些年齡段的個體在實際上可能依然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因此採取「積極同意」的性行為模式。該模式強調合意應為積極且在每一階段中持續給予，而非基於默示或推定。這種模式的引入是為了避免過去法制對於「默示同意」或缺乏明確拒絕的過度依賴，並確保性行為中的所有參與者能夠在自主且平等的條件下明確表達同意。因此《鬼地方》中的菁仔欖在陳天宏未採取積極同意的半推半就狀況下，便進行身體上的侵犯仍屬強暴罪的範疇，也造成陳天宏尚在未知發生了什麼事的狀況時，承受性創傷的可能。陳昭如，〈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思想》，23（2013），頁207-233。



的方式。同時，也在如同上文所述中，酷兒時間性的出現動搖了原先線性的異性戀時間性，將過去發生的事件視為仍然不斷變動的一段歷史，為未來重啟傷疤的可能埋下伏筆。

淑麗也在年幼時因不小心暴露出胖瘦老闆的藏身處，而導致自我以見證者及告密者的雙重身分，一輩子身處在創傷狀態的自責當中。胖瘦老闆不僅是同性戀伴侶，更販售成人性愛光碟，白色恐怖時期一連串的禁舞、禁書、禁歌、禁左翼圖書，¹⁶⁸ 及《刑法》、《出版法》對於「妨害善良風俗」的規範，不僅做實胖瘦老闆被逮捕的理由，其與陳天山共組讀書會閱讀左翼圖書一事，更觸碰執政者的敏感神經，最終導致雙人被捕的下場。淑麗將時代的罪惡完全攬於自身，認為是自己的告密才導致胖瘦老闆被捕，因此陷入創傷狀態當中。淑麗結婚後時常獨自入住臺北的廉價飯店，並全天候觀看成人影片，在一次在機緣巧合下，飯店誤將成人影片頻道播放成同志成人影片，淑麗瞬間體會到被溫暖泥巴包裹的感覺。這段同志成人影片經驗使淑麗想起與胖瘦老闆相處的過程，溢出戒嚴規範的酷兒經驗，重新部署了戒嚴時間性的規範，而書店閣樓的空間也在戒嚴體制的壓迫下，形成一個暫時遁逃的空間。同志成人影片的能動性，使得淑麗意識到這一切並非自我的過錯，而是白色恐怖及異性戀正典化的荒謬，因此如小說所形容，「她記得很清楚，胖老闆吃下那苦苦的冷薯條，對她說：『真好吃，淑麗，以後，我們一起飛去美國吃。』」，¹⁶⁹ 淑麗也在回憶與胖瘦老闆相處的過程中，修復集體創傷，逐漸釋懷。

阿蟬也是在逾越了傳統倫理規範的界線後，得以重新審視陳天宏的酷兒情感，進而理解所有不符合鄉土主流性別政治的不倫事件。阿蟬和殺蛇人傾訴想要一把火將一切燒毀，因為她是個「失敗的母親」，「失敗的老婆」，沒有理由在這裡繼續活下去。並且在消防隊清理火場時，發現兩具焦屍，研判為殺蛇

¹⁶⁸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二〇二二年增訂版〉（臺北：玉山社，2022）。

¹⁶⁹ 陳思宏，〈鬼地方〉，頁160。



人和豆油蟬。¹⁷⁰ 在此，所有的人都認為阿蟬與殺蛇人已經死去，因此在自然生命及政治生命上，阿蟬皆被排除在外。然而在小說最末，阿蟬突然的出現使得阿蟬重新被意識為生命。¹⁷¹ 在這段真相未明的時間段中，阿蟬處於如同被鄉土主流性別政治排除的陳天宏般的危脆生命，她的政治生命被國家權力排除在外，同時也不受倫理規範的束縛。但正因為真相未明的緣故，阿蟬得以以危脆生命的方式存活於世間，反倒成全其與殺蛇人之間的戀情。由於被規範圖式排除的生命狀態，使得阿蟬逾越倫理規範的束縛，進而跳脫被壓抑的主體，阿蟬也在此發現所有一切造成永靖成為鬼地方的原因，便是倫理規範的作祟，這同時開展一個契機，提供阿蟬理解陳天宏酷兒情感的可能。

阿蟬在小說的最末處與殺蛇人重新返回永靖，並講出當年報警檢舉讀書會的原因不是因為陳天宏與菁仔欖的踰矩，而是她早知道陳天山與菁仔欖的婚外情，以及殺蛇人其實是她在與陳天山結婚前便在芳貢貢醬油工廠裡認識的目鏡仔。¹⁷² 阿蟬披露出自己關於永靖逾越倫理規範及失德的事件，重新審視鬼地方中亂倫敗德的污穢，不僅象徵著酷兒情感並非鬼地方中唯一不被倫理接受的事情，更意味著每個人，無論是酷兒抑或女性、男性皆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包括小船的哥哥，也就是陳天宏老師的大兒子，也要與男性伴侶結婚。這些幻滅、污穢、創傷的事件及狀態都是因為倫理規範的宰制而受到迫害。阿蟬在成為裸命的狀態後，得以進一步思考發生在永靖的污穢事件，然而，阿蟬及陳天宏等人重新回到永靖並不是為了與原生家庭進行和解，而是為了解密所有發生在永靖的故事。在這趟旅途中，所有故事的真相也經由集體記憶的交織，慢慢譜出一幅幻滅及污穢的圖像。

¹⁷⁰ 陳思宏，〈鬼地方〉，頁304-306。

¹⁷¹ 重新被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謂的規範圖式認可為生命。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陳思宏，〈鬼地方〉，頁331-334。

¹⁷² 陳思宏，〈鬼地方〉，頁333。



即使所有人的生命當中都存在著污穢的記憶，但《鬼地方》試圖擬造一個理解而不和解的共生狀態，如小說中形容，「風要她對小兒子說：『別哭了。』來自波羅的海的風，來自白宮遺書的風，來自楊桃園的風，都一直說，別哭了，別哭了，別哭了。阿蟬鼓動腹腔。阿蟬喉嚨地震。阿蟬張開嘴巴」。¹⁷³ 小說在此將阿蟬比擬為昆蟲的蟬，鼓動腹腔、喉嚨地震及張開嘴巴象徵著蟬即將發出聲音的狀態，而蟬的叫聲為「知了」。¹⁷⁴ 阿蟬在經歷了所有事件後，對於這一切的回應僅有「知道了」一詞，以看似沒有回應也似乎沒有和解的一句話代替千言萬語。阿蟬理解陳天宏的酷兒情感及其在鬼地方中所受到的集體創傷。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阿蟬必須與陳天宏達到和解的狀態，抑或說所以小說中的角色也不必得和永靖進行和解。《鬼地方》的結尾以真相的現身作結，但卻僅以阿蟬回覆「知了」收束，使得故事中的角色彼此理解，卻存在於一種不訴諸和解的氛圍當中，這不僅反映出共生當中的異質性，更反映出修復式閱讀的特色，體貼故事中角色的遭遇、情感、選擇與結果。

五、小結：對於集體記憶的不同理解

陳思宏的《鬼地方》創製具有臺灣鄉土脈絡的集體酷兒修復，且體現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傳統倫理規範下，酷兒生存戰術的實際展現，其中細小關鍵的情感推動，正如同鄭芳婷討論「鎊角」時，指出故事中藉由生活片段中的各種微小空間，推動故事敍事的關鍵點，並將「鎊角」視為「角色游移於體制邊界的戰術式（tactical）行動」。¹⁷⁵ 集體酷兒修復同樣可以視為一種策略，在面對鄉土主流性別政治的大蠹，《鬼地方》並非全然地打破傳統倫理，而是藉由酷

¹⁷³ 陳思宏，〈鬼地方〉，頁334。

¹⁷⁴ 蟬因為叫聲類似於「知了」，因此也被稱之為知了。可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知了〉，《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23年11月24日。<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13185&la=0&powerMode=0>）。

¹⁷⁵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敍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鎊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2020），頁93-126。



兒情感的介入，埋下日後進行修復及理解的契機。角色關係交織所建構出的集體記憶也在重新審視瘡疤的同時，進行擬造，創造出對於過去集體創傷的不同理解。

集體創傷強調記憶的社會建構性，及想像工程對於創傷事件的記憶工作，最後所形成的創傷狀態。想像的概念不僅經由涂爾幹的「宗教想像」的方式，對於事先發生過的事件進行想像，更如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所認為的，國家秩序的整體也在這個想像的過程中逐漸地「去地域化」。¹⁷⁶ 然而，在《鬼地方》中，這個被消解的過程體現在倫理的界線上，在危脆生命被非人化的過程中瓦解了鄉土性別政治的倫理，進而使得集體酷兒修復成為可能。集體酷兒修復的展演，除了對於創傷事件的想像外，更是與歷史、政治、經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如同趙（John (Song Pae) Cho）在分析韓國的退休男同志生活想像時，將源頭拉至韓國政府將「新家庭主義」、「新自由主義」和「信息化」相互連結所做出的政策。¹⁷⁷《鬼地方》扣緊臺灣戒嚴脈絡時的各種「禁」政策，及對於「善良風俗」的維護，披露出在一系列正典化及規範下的污穢事件，發展不同危脆生命，暴露在暴力中的修復過程。

《鬼地方》指出鄉土主流性別政治，但卻未企圖建構另一套鄉土酷兒以取代鄉土主流性別政治，而是在不同形式的親密關係中，著重於細緻情感的描繪，以推動後續故事進行及主體建構。作為一部修復式閱讀的小說，它無意以純粹批判偏執式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取代偏執式閱讀。它旨在貼近故事中的角色主體，並以集體記憶為基礎，嘗試進行集體酷兒修復，拆解「創傷→修復→和解」的和解時間性，開啟一條不訴諸弭平創傷的必然和解之路。陳思宏的《鬼地方》藉由對酷兒創傷的敏銳書寫，讓酷兒群體得以在文本中回溯自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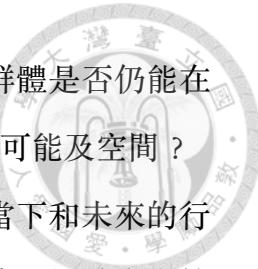
¹⁷⁶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7-65. 中文版為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臺北：群學，2009）。

¹⁷⁷ John (Song Pae) Cho, “‘Deferred Futures’: The diverse imaginaries of gay retirement in post-IMF South Korea,”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Vol 58(2)(2017): 243-259.



痛苦經歷，同時尋求情感上集體共構，從而形成「集體酷兒修復」的模式。這種詮釋模式使酷兒文學成為一種集體記憶的象徵，進而在當代臺灣文學中構築出酷兒群體的集體情感記憶場域。因此小說的結尾並未以大和解收束，而僅僅是角色間彼此的相互理解，嘗試建構出共生狀態中可能存在的異質性，也為集體記憶提供另一條不必訴諸懺悔抑或賠償的可能。

不訴諸弭平創傷的共生狀態，強調理解而不和解的共同生活之可能，然而，這種拒絕和解的修復行為，是否可能暗示出一種無解的結局？這種姿態是否能自成一種具積極性看待修復的意涵？當創傷不被和解所弭平，是否會導致一種象徵性或意義性上的缺席？即使不訴諸弭平創傷並非意味著拒絕修復，因而抵抗了進步的性時間框架，但可能在反抗和解的同時，無意中構築出另一種對於酷兒群體更為壓迫的現實問題，也就是究竟要如何共生的問題。在此的框架下，創傷的意義雖然被成功轉化，然而不和解的選擇是否成為下一個創傷成立的可能？另外，修復和拒絕和解之間是否會產生一種內在的悖論，尤其當創傷與政治存在相互牽連之際，這樣的選擇反映了酷兒記憶與政治立場之間的複雜關係。本章強調不訴諸弭平創傷的姿態，試圖挑戰現有的進步史觀與異性戀時間性，但這種立場也帶出一種潛在的政治空缺。創傷與不和解是否讓酷兒記憶成為一種去政治化的存在？在「集體酷兒修復」的前提下，的確正如修復式閱讀般，暫時舒緩了酷兒對於過去創傷的困境。然而，若無法推動進一步的政治行動，這種不和解是否反而成為一種迴避政治責任的藉口？如果酷兒記憶不具備政治動員的力量，這樣的選擇是否讓酷兒群體被局限於僅存於記憶的框架，而無法深入公共領域中發揮其政治潛力？最後，選擇不和解的可能性是否同質化了酷兒在階級上的差異？《鬼地方》中的陳天宏，可以在受到各種性別壓迫及暴力所共構出的集體創傷時，毅然覺然地選擇前往柏林，暫時地逃避這段創傷，因此集體修復的可能，顯然並非一種無可避免的狀態，而是在具有經濟及文化資本的前提下所做出的選擇。如此的修復行為也限制了不同種族、階



級在面臨創傷時的酷兒修復多元可能，當選擇權被剝奪，酷兒群體是否仍能在集體記憶的過程中進行修復，甚至在修復過程中真正找到行動的可能及空間？

因此，酷兒修復在持續處理記憶創傷的同時，仍然應關注當下和未來的行動的可能，串連不同危脆性的所形塑的酷兒互助網絡，透過記憶和經驗來支持彼此的情感需求，從而實現一種「活的記憶」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僅承載著創傷的記憶，更讓記憶成為未來行動的驅力。從個案式的創傷經驗出發，將其轉化為集體的政治認知，透過情感連結跨越個體，創造政治動能，抵抗和質疑性別異規範的霸權。這種轉化使得酷兒修復在記憶之外，也在公共領域中為邊緣群體發聲。「不和解」的姿態，既是挑戰也是侷限，它在強調創傷不可消弭的同時，也呼喚我們思考如何讓這種記憶具有更具行動性的未來，這也是我在以下章節及未來所更加關注及處理的議題。



第三章：闕限時空的幻滅：《佛羅里達變形記》的酷兒生 存戰術

但是在那個平行的時空裡，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哪裡，我們都不是有彩鑽鱗角的龍子龍女，我們就跟棲息在紅樹林理那些不起眼的小型水鳥一樣，與毛灰撲黯淡，叫聲微弱，振翅無聲，忽然消失了，從邁阿密消失了，沒有人注意。

——《佛羅里達變形記》¹⁷⁸

前言：想像闕限時空作為一種方法

我在緒論指出，酷兒群體在同志婚姻通過後，即使獲得法理上的婚姻權，但在面對「同性戀正典化（homonormativity）」及「異性戀正典化」的壓迫時，仍然產生各種更加細微的生命困境，無論在酷兒群體的內部及外部，皆反應了全球化及在地化的政治部署，對於危脆生命產生偌大的迫害。然而，不同國家的酷兒群體在面對各種身分政治及生存困境時，時常基於不同的文化脈絡、主體想像及物質性基礎而產生理解上的差異，若草率地以同性戀正典化及異性戀正典化等概念，概括全球的酷兒生命，則會忽略不同國家及區域所碰撞出的不同生命政治，更是忽略非美國，包括日本、韓國及臺灣等在內的酷兒主體如何重新部署、內化、重新配置在地化的LGBTQ類別及身分。申麗英（Layoung Shin）便曾針對韓國的脈絡，質疑同性戀正典化的普遍性，她認為韓國的女同志避免表現出男性氣質，除了是為了融入異性戀群體外，更是為了保持經濟的穩定來源。因此基於儒家思想及孝道的家庭導向文化並無法完全解釋韓國女同志不出櫃的現象，此現象正反映東亞女同志與家庭的聯繫，是為了確保經濟的生存。因此韓國女同志專注於隱藏男性氣質，是根植於生存的緣故，是對於生存的渴望，若以異性戀正典化及出櫃與否的態度評估韓國女同志，則是忽略

¹⁷⁸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臺北：鏡文學，2020），頁19。



「出櫃」與「規範性」之間的動態關係。¹⁷⁹ 申麗英詳細分析韓國女同志不出櫃的現象，提出家庭聯繫在東亞同志間的重要性。那在臺灣的脈絡底下，酷兒主體又是以什麼樣的生存戰術，面對各種來自酷兒群體內外的壓迫？來自小說的各式生存策略的誕生，及對於酷兒創傷及情感的重新理解，都為我們提供一條審視在同志運動階段性的成功前後，酷兒群體中對於歷史發展的不斷塑造與再塑造所產生的「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¹⁸⁰

回應第二章小節所提出的問題，酷兒群體如何在不和解的狀態中生存，如何串聯不同性質的創傷及不同的結構性因素，實際地面對記憶並提出具有更具行動性的未來？正如陳思宏在《鬼地方》中所披露出的並不是一系列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藉由文學的虛構性，將活生生的酷兒困境加以闡述，並訴諸一種不願和解的共生狀態。「夏日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佛羅里達變形記》更是刻劃出酷兒主體如何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生命情境下，掙扎於幻滅後的島嶼，緊握宛如花火的希望，體現頑強的韌性，實踐酷兒生命經驗的希望。陳思宏的《佛羅里達變形記》描繪主角安妮、凱文、阿曼達、克莉絲丁、萊恩、小月等1976年出生的龍子龍女，於2020年收到當年遊學團團員之一的小史的遺書召喚，飛回當年相聚的佛羅里達，掀開遊學美國時彼此不堪回首的記憶。龍子龍女們除了凱文外皆出身富貴，父母輩有蓮觀基金會董事長、臺大醫院院長、地產富商等，家庭教育更延續其所屬社會階級的文化資本，讓子女學習鋼琴、外語，及將故事的主角送往美國參加遊學團，嘗試將階級不斷複製。¹⁸¹

故事中的核心內幕體現在蓮觀基金會的幕後操弄一事，蓮觀基金會的前身可上溯至蓮社，而蓮社的起源則來自大學詩社，該社社員皆家境優渥，大多為官商二代，眾人在此舉行私密沙龍、閱讀西方詩作及佛學思想，抽煙喝酒吸大

¹⁷⁹ Layoung Shin, "Avoiding T'ibu (Obvious Butchness): Invisibility as a Survival Strategy among Young Queer Women in South Korea," in *Queer Korea*, ed. Todd A. Hen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95-322.

¹⁸⁰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¹⁸¹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麻搖滾樂，談論自由主義。由於社長是國家高階軍官的獨生女，在戒嚴各種禁錮的時代中，特殊的黨國關係，為其開啟各種方便。社長畢業後，繼承上輩的獨棟日式房舍，邀請前社員們入住社團，並命名為「蓮社」，與安妮、凱文、阿曼達、克莉絲丁、萊恩的父母親，主張揚棄一夫一妻制，每天打坐聽佛，打造人間淨土。並實施優生學，預計於龍年集體生下上述六位龍子龍女，其中，小史的父親為美國華裔，追隨社長一路飛回臺灣，然而社長因為擁有雙重性器官而無法受孕，因此小史的生母實則為社長的學妹，並在生下小史後不久便離世，蓮社社員們也因此處鬧出人命，紛紛離開社團。社長因此收養小史，更因社員們的離開而心有不甘，於是策劃各種陰謀，使得龍子龍女們的父母親在生活上遭遇各種磨難，為了撫慰內心的空虛，社員們紛紛又回歸社團。社長也為了繼續塑造各種投射與幻想，發明了不存在的「創辦人」，並將社團命名為「蓮觀基金會」。

然而，一切看似都在小史養母，也就是蓮觀基金會董事長的策劃之下，龍子龍女們卻在佛羅里達盪出預定的「生活模式」。在遊學團的日子裡，由於小史為了尋找居住在基韋斯特（Key West）的父親，也促成了龍子龍女們展開一路往南的尋父之旅。在旅途中，為了逃避美國大學生的追擊，一群人躲避至「椰子樹旅社」，旅社中的性、酒精、大麻、炸雞的剩餘，堆疊出「椰子樹旅社」的魔幻性質，與龍子龍女原先倍受拘束的生活產生鮮明對比。破格脫軌的紊亂狀態，宛如特納（Victor Turner）所謂的「闕限」（liminal）概念，¹⁸²《佛羅里達變形記》為我們提供一條以「想像闕限時空」為方法的策略，來面對危脆生命中的各種暴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認為「想像」是構成現代主體的要素，大眾媒體的普及也使得人們與土地的聯繫產生鬆動，國家秩序的整體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地「去地域化」，¹⁸³ 阿帕度萊同時指出傳統社會

¹⁸²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¹⁸³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27-65.



中，儀式與藝術提供人們想像的可能，然而這多半隸屬於某一社會階級，他所關注的像是基於大眾媒介日常生活中的元素時，如何協調個人與全球力量的重要性。¹⁸⁴ 《佛羅里達變形記》則是模糊儀式與日常生活界線的一部小說，在想像的作用下，主體同時介於（between）也屬於（belonging）兩個時空之中。由此，本文將龍子龍女赴「椰子樹旅社」的遊學時間視為一種闕限時空（liminal time and space），並將此依據闕限時空的想像而得以生存於社會結構的眾生相，解讀為一種酷兒生存戰術。酷兒生存戰術建立在霍布斯坦（Jack Halberstam）所提出的「酷兒生活模式（queer modes of life）」之上。霍布斯坦以酷兒時間（queer time）檢視次文化實踐、另翼結盟模式、跨性別體現形式等與異性戀時間性有所差異的酷兒網絡，¹⁸⁵ 而生存戰術則更強調主體的能動性，是主體對於壓迫生活的一種主動逃亡。然而，正如鄭芳婷所言，此處逃亡的意義看似是一種遁世的表現，實際上卻是對於現世的連結與依戀，試圖擬造入世的酷兒圖景。¹⁸⁶

小說在故事的前端引用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Metamorphoseon libri）「萬物變幻，無物消逝」，¹⁸⁷ 直接說明了記憶及所經歷的事物在時空遞嬗之下，並不會消逝，呼應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中龍子龍女所經歷的「那件事」如何在事件後，不斷地影響彼此的生活，甚至介入彼此的串連模式。小說以一封遺書作為故事的開端，在2020的時間段中，小史以第一人稱敍事，向大家發出遺書，邀請彼此共同參與他的喪禮。原先約定好遺忘「那件事」，並進入個體生活的龍子龍女們，在小說結構的安排下，藉由遺書的媒介，重新銜接共同遺忘的時間裂縫，交織起2020年的當下（小史的遺

¹⁸⁴ 林瑋嬪，〈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臺北：春山出版，2023），頁47。

¹⁸⁵ Judith Halberstam,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¹⁸⁶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敍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銳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3）（2020），頁99。

¹⁸⁷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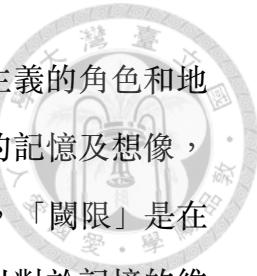


書）與1991年的記憶（夏令營經歷）。小說結構開宗明義地將兩段生活及記憶串聯，呼應闕限時空的無法間斷，在遺書的時間破口點出了即使彼此原先約定好遺忘「那件事」，卻仍然在日後無法停止地不斷參和彼此的生活，藉以在「好好做人」的社會結構中重溫「那件事」時的脫序及旖旎，嘗試擬造對於未來的生活想像，同時介於也屬於1991及2020兩段時空的闕限主體（liminal subject）得以在性別、生活、職業等秩序的邊緣中生存。

第二節、佛羅里達的闕限時空

我將《佛羅里達變形記》中龍子龍女前往佛羅里達參加遊學團的旅程視為一種闕限時空的概念。此中，特納及謝喜納對於「闕限」的相關理論實際上可以區分為「闕限」及「類闕限」（liminoid）兩類。以下，我將證成將佛羅里達遊學團及椰子樹旅社，同時被視為闕限及類闕限的合理性，突顯酷兒生存戰術中的策略及能動性。特納所提出的「闕限」指得是一種「處於闕值」的狀態，是介於正常、日常文化和社會狀態以及維繫法律及秩序的過程之間的狀態或過程的結構。這是一種不限於時間性的狀態，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在此發生。¹⁸⁸這種介於之間（between）的狀態描述來自特納對於原住民成年禮儀式的考察，在儀式的過程中，所有的參與者並沒有輩分及階級之分，特納以共同體（communitas）的概念定義這種超越年紀及社會稱謂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性是一種未經整治的關係，形成一種「反結構」（anti-structure）。然而，這並不是一種對於結構的逆反，或顛覆結構，而是一種人類對於認知、情感、意志、創造力等能力的開放式理解。在儀式（闕限）結束時，共同體的經驗轉變為共同體的記憶，人們嚮往這種融合的氛圍卻同時保有個體的獨特性，因此在往後的日子不斷地嘗試複製闕限的狀態，為了實現彼此在闕限時的關係，群體成員之間存在著資源和社會控制的必要，共同體被重新組織成一個持久性的社會體

¹⁸⁸ Victor Turner, "Frame, Flow and Reflection: Ritual and Drama as Public Liminality,"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Vol 6(4)(1979): 465.



系，而當共同體被制度化時，彼此的關係則被嵌入本質化普遍主義的角色和地位當中，每個角色都必須使個性服膺於規則。因此，對於闕限的記憶及想像，使得彼此關係性形成具有規範性意義的社會關係。¹⁸⁹ 總而言之，「闕限」是在前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特殊階段，民眾透過特殊的儀式及經驗，以對於記憶的維護，重新創造穩定社會結構的狀態。

另外，當代社會中的現代戲劇、體育及文學藝術等，則具備類闕限的特質。當主體在進行這些類似儀式性的行為時，可能產生一種暫時脫離社會結構的狀態，並且與儀式一樣，它們都具有遊戲性的特質。¹⁹⁰ 然而，類闕限脫離社會結構的方式，並不同闕限中的反結構概念，而是類似於史密斯（Brian Sutton Smith）的「遊戲」（play），史密斯認為這些行為（現代戲劇、體育及文學藝術等）可以使現有的結構變得較為人所接受，更可使其成員處於對結構更具有靈活性的狀態中，當反結構出現在規範體系中時，便會迸發出各種新奇的創意，這也是新型態文化的來源。類闕限由此限脫離了成年禮儀式的背景，更加地「個人化」，而非建立在以部落為集體文化的脈絡之上。相比於闕限大多出現在具有階級的部落社會當中，類闕限大多發生在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謂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社會中，透過「契約」關係，相互聯繫。¹⁹¹ 雖然特納考察的時間範疇，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歐洲及美國的民主自由社會，然而，其強調國家以官僚機構服務金融及上層中產階級的利益，反而在新自由主義時更加明顯，正如杜根（Lisa Duggan）披露出新自由主義邏輯造成的經濟與文化間的罅隙，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基於階級、種族、性／別的類別將資源重新分配並去政治化，同時將身分政治定位為特殊利

¹⁸⁹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20-60; Victor Turner,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131-132.

¹⁹⁰ Sharon Rowe,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Vol 12(1)(1998): 49.

¹⁹¹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20-60



益團體的問題，將其排除於經濟市場之外，¹⁹² 而這也造成了主體更加的碎片化，使得在工業社會／新自由主義社會中所呈現的類閾限，如上文所述的現代戲劇、體育及文學藝術更具有個人化的特質。

即使特納不斷強調閾限及類閾限並非截然二分的狀態，紀蔚然仍批評特納實際上並沒有對於類閾限做出後續的發展，與特納共同開創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的謝喜納也未針對類閾限進行更多的詮釋。¹⁹³ 然而，謝喜納對於「表演」（performance）的理解，卻也隱隱然地回應了特納的閾限及類閾限概念。謝喜納延續高夫曼（Erving Goffman）對於表演的理解，¹⁹⁴ 認為表演標誌著身分、彎曲時間、重塑和裝飾身體及敘述故事。無論是藝術上的、儀式，抑或是日常生活，都可稱之為表演，而這種表演是一種「復位行為」（restored behaviors）抑或稱之為「複次行為」（twice-behaved behaviors），是主體被訓練和實踐，並學習適當的文化行為，根據社會和個人環境調整和履行自己的生活角色。¹⁹⁵ 謝喜納也清楚說明這種複次行為與成年禮有關，由此，我們可以將主體將閾限時的記憶，想像並實踐為社會規範時的運作方式，理解為謝喜納所謂的複次行為。這提醒我們若將生活中看似日常的瑣事，例如煮飯、穿衣服、散步等，進行拆解，它都是以各種已知行為的片段重新排列組合，看似單一性的行為，實則都是在具有熟悉性的行為中不斷複次，因此無論是閾限抑或是類閾限，都可以視作一種表演研究。

¹⁹² 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¹⁹³ 紀蔚然，〈閾限概念與戲劇研究之初探〉，《考古人類學刊》，88（2018），頁25。

¹⁹⁴ 關於高夫曼的表演理論，可參考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56).

¹⁹⁵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8-29. 謝喜納的「複次行為」類似傅柯所謂的「自我技藝」，傅柯的「自我技藝」指得是個人運用各種方法，對自身進行修煉、改造與認識，使自己達到某種文化或倫理理想的實踐過程。然而，傅柯將「自我技術」視為與「權力」密切相關的機制，人們並非單純被權力壓迫，而是主動地配合、內化規訓。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Ethics: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Ed.Paul Rabinow. Trans. Robert Hurley et e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223-252.



謝喜納的表演研究，看似更加模糊闊限及類闊限的界線，同時也似乎否定掉類闊限的顛覆性，但正是因為闊限及類闊限兩者皆具備複次行為的特性，提供我們一條將兩者視為表演研究的路徑，也開啟兩者間看似具有差異，卻又藕斷絲連的非二元關係。在《佛羅里達變形記》中，佛羅里達與闊限時空的焊接表現在對於佛羅里達的溫度、事物及發生的事件之上，佛羅里達不只是小說的地理場景，更是構成「闊限時空」的重要異質空間。龍子龍女們的旅程橫跨不同的地理區域，從臺灣出發，抵達邁阿密，最終駛向基韋斯特，沿著美國一號公路南行。這場往南的旅程不僅是地理上的移動，更是進入異質空間的過程。在這個空間中，社會規範開始變得模糊，時間與現實也變得不穩定，主體與世界的關係發生裂解，使得龍子龍女們得以暫時脫離家庭與社會階級的規訓。小說描述佛羅里達的濕熱氣流包裹著身體，空氣彷彿粘膩地附著於皮膚，讓一切人事物變得蒸騰不定，這種生理與心理的異變暗示著龍子龍女們正在進入一個與日常秩序截然不同的時空。夜晚，他們在沙灘上看見「月光下的男孩」，這位黑人男孩既是當地社會的邊緣人，也如同異質空間的引路人，使得龍子龍女們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一個與臺灣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之中。當龍子龍女們在沙灘上奔跑、戲水，極盡所能地遊戲時，他們的身體經歷了一種失序的快感：「某一部分的自己隨著汗水排出體外，越跑越快，越笑越大聲，越來越不像自己。」這種「越來越不像自己」的描述，揭示了闊限時空的關鍵特徵：在這個異質空間裡，個體的身分與社會規範開始瓦解，身體變成一種流動的狀態。這種狀態呼應了特納對於「闊限」的定義，主體在這一過渡階段中喪失了原有的社會角色，進入一種未定的狀態。而在龍子龍女們到達椰子樹旅社後，身體性的描摹更實際的展現出脫序的生活，他們開始吸食毒品、虐待短吻鱷、玩弄煙火，這些行為象徵著闊限時空中對於社會規範的挑戰。在這個空間中，他們不再是「好孩子」，而是進入了一種全然不同的生存模式。¹⁹⁶

¹⁹⁶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24-40、121-133、190-202、212-221。



然而，重點就在於《佛羅里達變形記》中龍子龍女在闕限時空結束後，藉由不同的想像模式，同時建立臺面上的闕限及臺面下的類闕限，使得闕限及類闕限的兩種關係，並存於當下的生活之中。闕限所形塑的社會規範不斷壓抑著龍子龍女的生命經驗，此中，因戀慕於依附著闕限所帶來的關係，促使龍子龍女們即使約定忘卻「那件事」（闕限），並從此退出彼此的生活，但私底下仍不斷嘗試建立彼此的連結。正因為這段關係的不可告人，包括龍子龍女於佛羅里達誤觸槍械，殺害無證古巴勞工BK，及其中酷兒情慾的多角關係，這段對於闕限時空的想像，並沒有進一步形塑為明確的社會身分。因此，危脆生命在臺面上闕限的壓迫下，藉由臺面下的隱密關係得以緩和，打造為一種生存模式。由此，本文將此依據闕限時空的想像而得以生存於社會結構的眾生相，解讀為一種酷兒生存戰術，《佛羅里達變形記》所描摹的闕限及類闕限想像不完全如同特納認為的闕限／維護結構；類闕限／顛覆的二元關係，而是透過模糊闕限及類闕限的界線，並將兩者建立於同一段記憶上，形塑為一條不完全顛覆結構亦非服膺結構的生存模式，體現本文所謂的酷兒生存戰術。接著，本文將分析《佛羅里達變形記》的文本結構，披露出一切的事件皆是「蓮觀基金會」創辦人的精心策劃，企圖創造所謂「人間淨土」。其苦心孤詣造就一切污穢的誕生，其塑造的「垂蓮小佛堂」標誌，實際上早在龍子龍女的父母時代便埋下變形的因子。

第三節、打造酷兒生存戰術

《佛羅里達變形記》中的主角小史、安妮、凱文、阿曼達、克莉絲丁及萊恩因父母的安排，於1991年時值十六歲時，一同前往由「蓮觀基金會」舉辦的佛羅里達遊學團，參加夏令營。面對原生家庭的各種規範教育，包括以健康之



名對於子女的身體進行規訓，¹⁹⁷ 對戀愛對象的限制，及家庭的語言／肢體暴力等，龍子龍女到達佛羅里達後，不僅瞬間與家庭的聯繫產生斷裂，佛羅里達的星空、熱風、海潮、月亮也不斷地引誘著他們逾越原先的生活樣態。燠熱潮濕的空氣讓一切彷彿置身於魔幻世界，各種事物也開始躁動，龍子龍女們的內心也愈發亢奮，與原先生活的斷裂使得佛羅里達的時空處於一種中介的狀態，漸漸地開始形塑「闕限」的時空特質。佛羅里達不僅是一處地理空間，更是一個由酷兒生存戰術所構築的庇護所。這個場域象徵著一種與主流社會秩序相抗衡的異質空間，亦是龍子龍女們在遊學團旅程中意外抵達的「他方」（other place）。小說描繪旅社內的空間混亂、時間錯置、規範失效，一切都違反著他們原先生長環境的邏輯，使其成為一個臨時性的逃逸地。如小說所形容，「某一部分的自己隨著汗水排出體外，越跑越快，越笑越大聲，越來越不像自己」，¹⁹⁸ 龍子龍女們開始變形，脫離社會稱謂所帶來的家庭、階級、種族、性別的規範。

龍子龍女們也因小史為了一路往南至基韋斯特尋找與母親離異的父親，而在旅途中為躲避哈雷學生的追逐，誤入由傑克所開設的「椰子樹旅社」。旅社所塑造出的世界彷彿一個平行時空，如小說所形容，「籬笆以內，萬物脫序，夜空日出，晴日銀河新月，白天見流星，黑夜閃彩虹」，¹⁹⁹ 與闕限中所謂的「反結構」不謀而合，「椰子樹旅社」的異質性體現在其時間性的混亂。小說多次強調這裡「沒有時間」，日夜循環失序，食物的氣味瀰漫於房間，炸雞與煙霧充斥著空氣，人物在半夢半醒間迷失。這種時間的斷裂與延宕，使龍子龍女們暫時從線性歷史的敍事中解放，脫離回到臺灣後必須「好好做人」的社會

¹⁹⁷ 規訓指得是人民在社會的約束下，被迫／自發地遵循「正確」的行為，規訓的技術具有權力介入、訓練、監控身體以及生產知識和話語的功能，構成了「知識權力」的話語體系，並且通過這些機制來規範和控制個體的行為。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紹中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時報出版，2020）。

¹⁹⁸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102。

¹⁹⁹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190。



期待，暫時脫序。在此，酷兒主體的時間並非服膺於異性戀正典化的生命週期，如異性戀家庭結構所規定的結婚、生育、成家等階段，而是一種「酷兒時間性」的體現，一種偏離社會既定時序，試圖在暫時性的空間中尋求自我定義與認同的時間感。小史在目睹於月光下展現胴體的傑克時，不僅在此刻愛上了傑克，也忘記了前往基韋斯特尋找父親的目的，想要就此長留於椰子樹旅社，並在密室中與傑克發生性行為。安妮因來到此地而不再每天吃藥，反而每天食用炸雞，凱文與小史每天一起捕捉並玩弄綠蠶蜥。椰子樹旅社內的空間結構強化了這種混亂與不確定性。密室、閣樓、隱藏的門、潮濕的浴室等元素，讓這個空間充滿神秘與未知。小說中，小史發現的密室不只是物理性的密閉空間，更是酷兒身體與慾望的隱喻：這裡發生了小史與傑克的親密關係，而這場性接觸不僅是對於異性戀家庭規範的反抗，也是對自身酷兒認同的確認。旅社內的共同體關係也極具流動性，並非傳統家庭或社會規範下的穩固關係，而是基於臨時的互助與情感連結所形成的酷兒共生模式。在「椰子樹旅社」，龍子龍女們短暫地擺脫了原生家庭的約束，他們的身體不再被健康、優生學、階級再製等規範所控制，安妮暫時擺脫對於藥物的依賴，凱文與黑人男孩的親密接觸突破種族與語言的隔閡，克莉絲丁探索自身慾望，而小史則在與傑克的關係中找到了某種短暫的歸屬感。在這個空間內，他們的關係並不依循社會所規定的異性戀關係或家庭倫理，而是如霍布斯坦所描述的「酷兒親屬關係」（queer kinship），透過彼此的情感流動與身體接觸來建立親密連結。然而，這種庇護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暫時的，小史沉溺於此，但他無法永遠停留；旅社的庇護效能終將結束，因為現實世界的結構性壓迫並未真正改變。這種「臨時庇護」的概念回應了霍布斯坦在《失敗的酷兒藝術》（*The Queer Art of Failure*）²⁰⁰ 中所提出的酷兒生存戰術，指得是透過臨時性的聯繫與空間建立逃逸路徑，而非試圖永久建立一個與主流社會抗衡的完整體制，這種暫時性地臨時逃逸時空，也與闕限在時空的特定段上相同。

²⁰⁰ Jack Halberstam,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就在一切失序及情感的逆發狀態，龍子龍女們卻在失誤中，開槍射死了戴著草帽的BK，身為帶團導遊的蛋頭，在此時也恰好帶著龍子龍女的家長們，一路追蹤至椰子樹旅社。小史的媽媽身為蓮觀基金會的董事長，負責統籌失序的狀態，使一切又重歸秩序當中，龍子龍女們的闕限時空，也在他者生命的消逝中，戛然而止，回歸本職。旅社終究無法抵禦外界的侵擾，蛋頭帶著龍子龍女的家長們找上門，這群主角不得不面對現實，被迫返回臺灣、回歸父母所設計的人生軌道。旅社的庇護性並非真正永久性的安全空間，而是「闕限時空」中的暫時棲息地，它提供了短暫的喘息與變形的可能，但最終仍難以抵抗異性戀社會的恢復與矯正。正因如此，這段記憶被刻意竄改與遺忘，象徵著酷兒生存戰術的一種矛盾：雖然這些時刻讓他們暫時獲得自由，但現實世界的壓迫結構仍然強勢存在，導致這些短暫的記憶只能透過隱晦的方式在日後的生活中悄然浮現。彼此也由於誤殺BK的緣故，約定好一起竄改這段記憶，「集體說謊，對彼此說謊，矇騙全世界」，²⁰¹ 對於這段闕限時空記憶的粉碎，不僅意味著掩埋小史開槍殺人的罪行，更重要的是必須遺忘彼此間在闕限時空中所建立的關係性，這也直接使得共同體的關係無法延續，更遑論成為特納所說的「持久性的社會系統」（*perduring social system*）。²⁰² 然而，即使龍子龍女們事先約定好忘記這段記憶，並「彼此說謊」，但正因為闕限時空是一段由多人所建構的集體記憶，它無法拆解成碎片化的，由諸多個人主義式的記憶所組成的記憶，也就是我們無法將記憶視為超越自我的先驗存在，而是一段經由歷史性的實踐所建構而成。²⁰³ 龍子龍女們在闕限時空後的關係性也由此建立，即使因為篡改記憶的緣故，彼此在臺面上無法維繫社會關係中的稱謂，但由於記憶的集體性，及對於這段特殊時空的懷念，使得彼此又處於藕斷絲連的關係狀態中。

²⁰¹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331。

²⁰²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20-60

²⁰³ Jeffrey Olic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7-37



因此，「椰子樹旅社」不只是小說中的一個地點，它是整個酷兒生存戰術的隱喻，是酷兒主體在異性戀霸權與階級壓迫下，試圖尋找喘息空間的實踐場域。小說透過這個場景，展現了酷兒生命在不穩定、漂泊與幻滅之間如何透過短暫的庇護建立自我認同，並在現實世界的縫隙中生存。這也回應了本文的核心命題，在酷兒群體難以擺脫主流社會的規範與歷史重負的前提下，如何以非典型的戰術，如「逃逸」、「隱蔽的連結」與「暫時的庇護」，來維繫自身的生命可能性。

在闕限時空後，也就是龍子龍女們回到臺灣後，彼此間的連結，不僅可以詮釋成對於集體記憶的建構，更可將私底下不斷地參與彼此的生活，解讀為一種酷兒生存戰術。在脫離闕限時空的脫序及旖旎，龍子龍女們依序回歸父母的規訓生活當中，重新好好做人。而對於未來美好生活所做出的承諾，使得主體對於從中妥協的條件產生一種依戀（attachment）關係，其中的殘酷建立在慾望客體（object a）的不斷消逝當中，並削弱主體性，慾望客體不僅意味著願望原因（cause of desire）本身，也是對主體幻想的秘寶。²⁰⁴ 因此慾望客體隱匿了沒有完整大他者的事實，使主體在社會中建構穩定的想像認同。²⁰⁵ 「此刻」（present）也成為一種看似穩定卻實際懸置的僵局（impasses）。²⁰⁶ 龍子龍女們分別面對各種「美好生活」的壓迫及剝削，安妮依照父親子承父業的期望，順利成為一位醫生，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卻因為彼此的憂鬱症問題而產生齷齪。萊恩及克莉絲丁也在父母的三角關係中，承受彼此母親及大／小媽對於父親爭奪所造成家庭暴力。其中，非遊學團成員之一的小月，在經歷闕限時空末期的殺人事件後，由於目睹小史槍殺BK的真相，卻是唯一沒有動手的人，而

²⁰⁴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I*,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Cambridge: Polity, 2015), 169;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R. Price(Cambridge: Polity, 2014) , 101.

²⁰⁵ 羅逸晉，〈存在之匱乏：論拉岡「慾望原因」之概念〉（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頁59。

²⁰⁶ 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49.



成為創傷事件的見證者（witness），在回歸一般生活的日子裡，小月的集體記憶不斷嘗試再現歷史的真相，而陷入一種歇斯底里的創傷狀態當中。²⁰⁷ 小月只能藉由演出A片的過程，體會被無數男人觸摸胴體的感受，再現闕限時空中被集體篡改的記憶，嘗試在創傷狀態中建立主體性。小史在闕限時空後，也因對於傑克的愛慕，不斷地回到椰子樹旅社，與傑克同居，另外，凱文其實也在闕限時空後回到椰子樹旅社與傑克同居一年。

面對各種「美好生活」及「好好做人」的殘酷樂觀主義，龍子龍女們以闕限的集體記憶為想像主體，雖然曾互許承諾，不再聯繫彼此，並竄改記憶。然而，龍子龍女們實際上卻在事件後，不斷地偷偷介入彼此的生活，小說也以「身體癢」及「甜味」等作為象徵，意味著龍子龍女們對於佛羅里達記憶的懷念，及嚮往闕限時空的生活狀態。小史在事件後不斷地寄信給萊恩，詢問是否有看過小月的新電影，後來因傑克身亡，而重新聯繫；安妮也多次偷偷地參與阿曼達的音樂會，克莉絲丁也留著當時的草帽。龍子龍女們對於闕限時空的想像，正如小說所形容，「她（阿曼達）一直吃甜，就是要尋找一九九一年的特殊甜味」，²⁰⁸ 面對上文所述各種家庭暴力、異性戀正典化、線性史觀的壓迫，龍子龍女們嚮往闕限時空中那段沒有秩序及旖旎的狀態，其中的反結構不僅意味著社會稱謂的失效，更是「認知、情感、意志、創造力等能力的開放式理解」。由於彼此約定竄改記憶的緣故，共同體的關係並沒有形成「持久性的社會系統」，然而，這段關係卻以另一種臺面下的形式不斷延續，由於集體記憶的不可破碎性，對於這段記憶的回憶，以想像的方式呈現，龍子龍女們不斷想像並嘗試與彼此聯繫，回憶這段沒有規範的狀態，藉由反結構對抗殘酷樂觀主義的桎梏。由此，佛羅里達遊學團及椰子樹旅社的記憶，同時是闕限時空也是類闕限，酷兒生存戰術模糊了闕限與類闕限間的界線，更加複雜化特納及謝喜

²⁰⁷ Giorgio Agamben,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orgio Agamben,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Jeffery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13-15.

²⁰⁸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141。



納的詮釋，一個看似成年禮式的遊學團，卻因彼此對於記憶的篡改，而失去闕限所該形塑社會規範的效力，反倒以類闕限的形式對結構產生動搖的力量，進而維繫酷兒及危脆生命的延續。

第四節、小結：危脆生命的希望

《佛羅里達變形記》的結尾，並未提供一個清晰的救贖，也未將龍子龍女們的創傷與生存戰術收束為某種圓滿的敘事。相反地，小說讓角色們在回到佛羅里達後，藉由彼此的凝視、身體的觸碰、記憶的復甦，重新直視並承認過去的裂痕與幻滅，展現出一種對抗「殘酷樂觀主義」的酷兒生存戰術。在龍子龍女的成長過程中，「好好做人」成為社會對他們施加的規範性期望，這不僅包括遵循異性戀正典化的生命軌跡（異性戀婚姻、生育、建立家庭），更涉及階級再製的壓力（繼承家業、維持社會地位），甚至還涵蓋對於國族特權歷史的承繼。小說中，克莉絲丁在佛羅里達的告別儀式上，突然大笑，並高喊：「你們都是騙子！」²⁰⁹ 這一笑聲打破了過去三十年間的壓抑，也標誌著一種對於記憶篡改的拒絕。克莉絲丁的笑聲，不僅是對龍子龍女們自我欺騙的揭露，更是一種對於「好好做人」這一社會秩序的挑釁與解構。這一瞬間的狂喜與崩潰，使得龍子龍女們的身體重新進入「闕限時空」，但這次，他們的意識已然不同，並不是身處於一個可以任意逃逸的平行時空，而是回到了現實世界的斷裂中。小史的死亡、傑克的自殺、小月的創傷、凱文的掙扎、安妮的壓抑，這些創傷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消解，反而成為彼此之間難以割捨的連結。在小說的結尾，龍子龍女們重新相聚，彼此對望，在無法言說的共鳴中，尋找彼此存在的證據。他們的「回歸」，並不是對過去的否認，而是對創傷的承認。因此，《佛羅里達變形記》所傳遞出的，並不是單純的和解，也不是徹底的反叛，而是一種酷兒式的「殘存」，對既有秩序的無聲抗衡，也是一種對未來的開放可

²⁰⁹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頁330。



能性。它拒絕了殘酷樂觀主義所強加的虛假希望，並以碎裂、混沌、充滿變形可能的身體，展現酷兒生命如何在幻滅與殘存之間，緩慢地、艱難地，持續活在當下。

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討論闕限主體（Liminal Subject）的能動性時，其關注的焦點在於群體形成的過程中，如何透過「框架」（frame）的方式排除、賤斥並壓抑被視為非主體的情況，以及這些排除對於特定主體所造成的傷害。²¹⁰ 闕限並不是一種靜態的贖回權，或永不改變的界線，而是一種不斷發揮作用的邊界。²¹¹ 以特納的話來說，就是介於（between）也屬於（belonging）兩個時空的主體，不斷在當下產生能動性。²¹² 龍子龍女們由於竄改記憶的緣故，使得彼此的社會關係並沒有形成持久性的社會系統，然而，對於闕限時空旖旎的幻想，同時又以臺面下的方式，延續彼此的關係性。同時也讓想像成為一種契機，打造在各種殘酷樂觀主義的壓迫下，一絲喘息的空間，形成本文所謂的「酷兒生存戰術」。

在面對家庭暴力、異性戀正典化、線性史觀的壓迫外，變形因子實則埋藏於上一代對於人生的逃亡當中，而造成這一切事件發生的原因更在於小史養母的背後策劃，上一代遁亡至蓮社的逃亡，最後也回歸「好好做人」的人生，持續將變形的種子繁衍至下一代。小說將蓮社社長的身分刻畫為「國民黨高官的獨生女」，及在蓮社中各種逾越戒嚴體制規範的活動，在在呼應臺灣民眾所承載的不堪歷史，於戒嚴時代的禁舞、禁書、禁歌、禁左翼圖書，²¹³ 的一系列

²¹⁰ 關於巴特勒討論「框架」（frames）如何運作的過程，可參考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中文版為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申昀晏譯，《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臺北：麥田，2022）。

²¹¹ Judith Butler, “Agencies of Style for a Liminal Subject.” in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ed. Paul Gilroy, Lawrence Grossberg and Angela McRobbi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30-37.

²¹²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20-60

²¹³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二〇二二年增訂版》（臺北：玉山社，2022）。



禁忌下，蓮社卻可以國民黨高官的獨生女身分逾越《戒嚴法》的規範，而後續的陰謀實則也無法蕩開戒嚴時期所種下的種子。《佛羅里達變形記》的龍子龍女於1970年代出生，成長於戒嚴前的臺灣，雖然此時臺灣的女性及酷兒處境已非完全掌握於國民黨政策下的各種婦女協會及活動，包括由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所組織的臺灣省婦女會、反共抗俄婦女聯合會及國民黨婦女工作委員會等，但戒嚴時期形塑的威權體制國家（authoritarian state）以婦女權益包裹儒家倫理的政策及推廣仍然對臺灣的女性及酷兒處境產生影響。上述的三個婦女團體，延續於中國實施的婦女政策，以儒家的意識形態為核心，不僅宣傳女性照護的「本分」，同時強調男女分工的社會角色，強化賢妻良母的母職論述。²¹⁴ 此時期的婦女政策不僅是對女性及男性的性別壓迫，更是附和國民黨收復大陸的軍事動員目的，強化社會角色分工的重要性。對於父權及女性角色的強調同樣延續至1980年代，顧燕翎於1987年發表的〈女性意識與婦女運動的發展〉招致包括：本地婦女不需要婦運、《憲法》早已賦予兩性平等、婦女應透過社會服務贏得社會尊重等將女性視為他者及維護父權的批評。陳佩甄認為這不僅是女性主義與國族建構、社會現代化發展間的共構關係，同時也反應了臺灣以法律主導婦女運動的弔詭。法律的修改一方面反映了社會進步及改革的指標，但不僅法律的修改並無法立刻帶動整體社會的風氣改善，更可能成為提倡社會改成的阻礙。²¹⁵ 另一方面，酷兒群體在戒嚴時期更是陷入連生存空間都被剝奪的困境當無中，個案間的互動、美軍文化圈及空間集結的文化（例如：新公園）所形塑的次文化網絡並無法大量串聯酷兒彼此間的聯繫，而戒嚴時期又礙於技術的限制，同樣無法以媒體的方式打造地下連結。²¹⁶

²¹⁴ Doris Chang, 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Taiwan(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46-77.

²¹⁵ 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133-166。

²¹⁶ 吳瑞元，〈正在創造的歷史- 介紹台灣現代同志情慾運動〉，《史匯》，2（1997），頁103-107。



因此酷兒生存戰術不僅來自於一場偶然的意外，更是與臺灣的歷史、政治、經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面對戒嚴時期的各種性別壓迫及生存困境，龍子龍女們以逃逸的方式暫時地躲避於反結構的闊限時空當中，龍子龍女們不僅必須面對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誤殺BK），更承載來自父母輩的不義資本，龍子龍女們在無可避免的，椰子樹旅社的闊限幻滅後，也重新鑲嵌回各種社會身分的桎梏當中。2000年代的女性地位對比於戒嚴時期雖然大幅提升，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包括：《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及女性保障名額皆可見基進女性主義提倡「實質平等」的介入。然而，《佛羅里達變形記》呈現的家庭暴力、異性戀正典化、線性史觀仍然存在，同時亦反映出法律改成並無法涵括生活的所有層面，因此小說中的龍子龍女不得不採取酷兒生存戰術的方式，維繫生命及生活的各種可能。其中的可貴之處正在於面對毫無止盡的未來停頓，及內心的無所依歸，危脆生命彼此間的互助及酷兒生存戰術所展現，對於危殆生命的韌性。作為一部酷兒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描述了，遭受宗教及家庭箝制的酷兒角色如何以闊限時空幻滅後的想像維繫生存，同時打造本文所謂的酷兒生存戰術，並進一步回應了當代臺灣民眾所共同承受的不義歷史與壓迫現狀，探問危脆生命的彼此支持。

此中，《佛羅里達變形記》所展演的酷兒生存戰術，並非在一系列宏觀政治中複製到不同尺度（scale）的可縮放計畫性（scalable projects）。意味著小說中的酷兒生存戰術並不僅是個體／群體在面對宏觀政治中的家庭暴力、異性戀正典化、線性史觀壓迫、新自由主義時的等比例縮小尺寸（size）及層次（level），進而化約成一部小說的情節。而是一種如同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所謂的在歷史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中因緣俱足所發生的非縮放性理論（nonscability theory）。²¹⁷ 其中包含著差異性（diversity）及多樣性

²¹⁷ Anna Lowenhaupt Tsing, “On Nonscalability: The Living World Is Not Amenable to Precision-Nested Scales,” *Common Knowledge* Vol 18(3)(2012): 505-524.



(multiplicity) 的可能。²¹⁸ 因此小說中角色的生命故事並不僅是「現實世界」的再現或重複，在不同層次上擁有差異，而是關於生命尺度的製造與再製，一種巴芮德（Karen Barad）稱之為「時空物質化」（spacetimematterings）的概念，²¹⁹ 也就是在不同的條件的轉變中，時間、空間和物質也共同化成。²²⁰ 因此小說以一種差異複製的方式幻造（fabulation）「現實世界」，本文在此使用幻造而非再現的原因，如同尼昂奧（Tavia Nyong'o）認為這些重複並非是複製原型，而是對於原型的顛覆。延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自由間接」，也就是反對再現的概念，強調顛覆原型的意義，以無時態的概念以實現未來的任何可能，嘗試在變革中尋求相似。²²¹ 小說本身便是具備時間、空間和物質的完整有機體，並不為「現實世界」服務。然而，這種小說與現實世界的「尺度」差異，正提醒我們非縮放性（non scalability）的重要性，以微觀政治（micropolitical）的角度呼應宏觀政治（macropolitics），強調小說並非漫無目的一再複製現實世界，而是從不同尺度或維度上看見顛覆原型及實現未來的無限可能，也呼應我在緒論提倡以情感結構的方式看到小說對於生活的幻造。

²¹⁸ 關於差異性（diversity）及多樣性（multiplicity）在字源及翻譯上更細緻的分析，詳請參閱張君攷，《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23）。

²¹⁹ Karen Barad, "Diffracting Diffraction: Cutting Together-Apart," *Parallax* Vol 20(3)(2014): 168-187.

²²⁰ 張君攷，《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頁174。

²²¹ Tavia Nyong'o, *Afro-Fabulations: The Queer Drama of Black Lif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



第四章、動態親密關係：《樓上的好人》的非正典修復

小弟，我懂了，你大姐就是笨，美麗說得對，我笨死了，跟人家說我大學畢業沒人相信。但我現在懂你的感受了。我怎麼可以說你變態。他憑什麼說你變態不正常。

——《樓上的好人》²²²

前言：作為修復方法的非正典性

多元紛雜的當代臺灣女性／性別／酷兒文學，承襲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國策、新式教育的「新臣民」政策及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性啟蒙，²²³ 歷經戒嚴時期溢出反共文學的女性文學先聲，²²⁴ 到1980年代如白先勇的《孽子》所漸漸興起的一系列同志文學，再逢美國同志婚姻通過後所興起的同性戀正典化（homonormativity）思潮，臺灣的酷兒脈絡，同樣呼應全球化的政治部署，共同參與酷兒世界創製的一環當中：例如馬翊航在《山地話／珊蒂化》²²⁵ 中，將原住民與陰性氣質酷兒並列，呈現一種動態的身分辨正過程，拒絕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書寫策略，採用情感、瑣碎、模糊、拼貼的技術，焊接自傳式的家族系譜建構，不僅呼應有色酷兒理論對於世界的重新擬造，更突出在地化脈絡的原住民與漢人文化交織，追索身分中真實與建構的多種可能。另外，陳怡如的《女同志X務農X成家：泥地漬虹》²²⁶ 描繪酷兒、生殖、家庭與農務間的多方角力，對於異性戀生殖的焦慮轉化為酷兒成家及漬物經驗的實

²²²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臺北：鏡文學，2022），頁19。

²²³ 吳佩珍，〈自由戀愛的新世代：日治時期臺灣女作家群像〉，收入王鈺婷主編，《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頁80-81；周婉窈，〈光，遮蔽，及其再現：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年回顧與省思〉，《臺灣與海洋亞洲》（2024年9月5日。<https://reurl.cc/6dvodZ>）。

²²⁴ 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2002），頁13-48。

²²⁵ 馬翊航，《山地話／珊蒂化》（臺北：九歌，2020）。

²²⁶ 陳怡如，《女同志X務農X成家：泥地漬虹》（臺北：大塊文化，2018）。



踐，這些經驗的展開攬亂了因身體老化而無法生殖的異性戀時間性，突破關係中的生殖聯繫，呼應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親屬（kin）聯繫，在酷兒成家及漬物經驗的共生狀態中，實踐酷兒生活模式的創製。²²⁷ 陳雪的〈無有之物〉更是直接呼應同婚通過後女同志生活的困境，除了延續酷兒文學傳統中與公民參與之間的歷史聯繫，同時挑戰小說書寫虛構與自傳式書寫非虛構的二元對立，為臺灣酷兒小說系譜創造更多的可能。²²⁸ 此中，當代臺灣酷兒文學的繁複綻放，除了與性別運動相互映照，更朝向多元化當代思潮的反芻，建立臺灣文學的在地酷兒脈絡。²²⁹

延續劉文對於「酷兒左翼」的批判論述，臺灣的文學、女性主義及酷兒理論等領域並非以同樣的模板進行詮釋，將臺灣的案例視為歐美酷兒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延伸，而是重視作為亞洲區域的臺灣定位及華語語系視角，²³⁰ 基於

²²⁷ 呂樾，〈從公共行動到自我追尋：千禧世代自然導向文學史芻議〉，收入陳芷凡、詹閔旭、謝欣芩、王鈺婷主編，《臺灣文學的來世》，頁105-127。

²²⁸ Howard Chiang eds. *Queer Taiwanese Literature: A Reader*(Amherst: Cambria Press, 2021), 1-15.

²²⁹ 李淑君，〈在父權與威權的夾殺中突圍：七〇年代新女性主義運動與文學〉，收入王鈺婷主編，《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頁152-164、鄭芳婷，〈戲終後，戲才真正開始：臺灣劇場中的性別運動〉，收入王鈺婷主編，《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頁262-273、Fan-Ting Cheng, "Towards a Queer Island Disidentification of Taiwan, " *Golden Bough Theatre's Pirates and Formosa*, Vol. 28(2014): 427-441.

²³⁰ Howard Chiang, and Alvin K. Wong, eds.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 2020).



不同的文化脈絡、主體想像及物質性基礎產生理解上的差異。²³¹ 重新部署、內化、配置在地化的 LGBTQ 類別、詞彙、身分及文學想像。²³²

此中，陳思宏於2020年榮獲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大獎，常列博客來、誠品書店等新書暢銷排行版，自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指甲長花的世代》²³³ 以來，至最新的長篇小說《第六十七隻穿山甲》，²³⁴ 包括臉書的日常貼文，²³⁵ 時常表現出對於性別問題的關注及各種非正典性的討論。我在第二章曾提出「集體酷兒修復」，說明一種面對酷兒群體共同經歷的創傷過程，透過群體內部的見證與連結來修復創傷，而非訴諸傳統和解的路徑。集體酷兒修復強調創傷的修復性與集體記憶的重要性，並通過不同的酷兒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見證，重建主體性。這種修復過程拒絕以線性的時間性看待修復過程，並非旨在消弭創傷的發生，而是承認創傷的持續存在過程，並在不斷回顧與理解中尋找支撐生命的戰術。我於第三章亦提出「酷兒生存戰術」，強調在異性戀規範和壓迫下，通過闊限時空的脫序狀態、集體記憶與創傷修復，建構出酷兒主體的生存戰術。說明不依賴融入既有結構的生存模式，而是通過反結構與非線性時間的處理，挖掘生命韌性與內外壓迫的抗衡，並藉由集體記憶維持酷兒主體的生存和連結。

²³¹ 劉文，〈非西方、亞洲或中美冷戰結構？重置酷兒臺灣的戰(暫)時主體〉，《臺灣文學研究叢刊》，頁19-30。

²³² 關於臺灣文學中對於歐美現代性理論的移植不乏相關的批判性論述，甚至早自日治時期便已現端倪，如東亞殖民現代性中的「現代愛」論述看似賦予女性追求自由戀愛的權利，實則是將女性包裹於「家務、生殖、國族」的框架下，以教養為名，進行管束。冷戰時期的美援文化形塑一種「母愛的科學」的意識形態，建構政治化及現代化的「典範化女性」，排除妓女、養女、瘋女等女性主體的痕跡。詳參陳佩甄，〈愛的制度化：翻譯、文學與性學共構的現代愛〉，收入《愛的文化政治：台韓現代親密關係的殖民系譜》（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25-54；陳佩甄，〈幸福家庭：冷戰母性主義與女性主體重構〉，收入《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101-131。

²³³ 陳思宏，《指甲長花的世代》（臺北：麥田，2002）。

²³⁴ 陳思宏，《第六十七隻穿山甲》（臺北：鏡文學，2023）。

²³⁵ 關於陳思宏臉書貼文的能動性，詳可參考 Hsiang-Ting Hung, Social media as participatory art —— the collective practice of Kevin Chen's Facebook pag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9th Annual Conference Taiwan Studies Matters: Worlding the Contested Frontier (New York City, USA: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 CUNY, 2024).



而「非正典性」的探討泛指一切偏離或不符合主流、傳統、標準、普遍接受的規範、價值觀或制度的物質、時間、空間及行為。在不同的文化、性別、政治等領域，正典（canon）通常代表著被主流社會視為合法、優越或正當的標準，包括性／別規範、種族、階級、文化傳統等。非正典性則是在這些主流標準之外的性／別、性傾向、身分、行為，往往涉及對社會規範的挑戰或對壓迫性結構的抵抗。體現於酷兒、女性、少數族裔等群體的自我認同和文化表現上，並展現出這些群體如何在不被主流接納的情況下，找到自己的生存戰術與身分認同。²³⁶ 陳思宏的小說於家庭暴力／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中，探討情感位置的關係，塑造重新配置權力、身分和集體記憶的不可預測能量。如同穆諾茲（José Esteban Muñoz）所謂的「沿著創造性的逃亡路線飛行」（flight along creative lines of escape），陳思宏以文學的方式，創製酷兒世界圖景的存在及認知世界的方式。²³⁷

上述兩個章節皆嘗試說明陳思宏的小說對於非正典化群體的關注及如何提出不同審視框架及尺度（scale）差異，²³⁸ 重新看待情感修復的意義及可能。繼二〇一九年出版的《鬼地方》，²³⁹ 及隔年的《佛羅里達變形記》，²⁴⁰ 陳思宏於二〇二二出版「夏日三部曲」第三部的《樓上的好人》，延續其對於臺灣酷兒小說的書寫關懷，更加深入刻畫家庭親密關係中的修復複雜性。張文薰在替《樓上的好人》撰寫的導讀中，曾說明：「《鬼地方》的陳天宏跟《樓上的好

²³⁶ 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 Judith Halberstam,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avia Nyong'o, *Afro-Fabulations: The Queer Drama of Black Lif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傅柯（Michel Foucault）著；林志明譯，《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臺北：時報出版，2022）。

²³⁷ Joshua Chambers-Letson, *After the Party: A Manifesto for Queer of Color Life*. (New York: NYU Press, 2018), 18.

²³⁸ 張君玫，〈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頁161-194。

²³⁹ 陳思宏，〈鬼地方〉（臺北：鏡文學，2018）。

²⁴⁰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臺北：鏡文學，2020）。



人》的弟弟都要依靠不辨性向、不識創傷的姊姊從「笨」中覺醒，來獲得救贖。」這個「笨」是無關乎智力的，是在父母強大的控制之下，進而無法辨識自身及手足間的創傷及修復行為。²⁴¹ 大姐不僅擁有大學學歷，並在高中任職，除了教師的薪水外，更熟諳股票的運作，獲得不少額外利益，尤其是曾中過樂透頭獎，同時擁有一大筆意外之財。但在二弟的債主脅迫代償欠款時，大姐卻佯裝困窘，逃離至柏林。大姐從來不缺乏智力方面及物質層面的能力，而是在面臨逾越異性戀正典化框架外的事物時，方才產生「笨」的特質。正如小說所言：「她每次忽然恐慌，聽到學生喊她老處女，在街上巧遇那些已經老去的好人，身體不斷發抖，讀完小弟的小說，聽到同事結婚了，幾乎沒辦法去上班，就去銀行刷存摺，那串數字就是她的冥想瑜伽。」²⁴² 彷彿「還是」處女及老化的雙重標籤使大姐意識到自己被賤斥於員林的性別規範當中。老化是樂觀主義（Optimism）的破口，避談老化一事同時包裹著異性戀線性史觀的思維，因為面對終將到來的生命狀態，老化將打破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想像。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發現西方社會中的老化與窮困時常是並置討論的，並引用培根（Francis Bacon），說明老年人扮演經驗與顧問角色的社會位置，指出資本主義時代的快速社會變動，使得老人在面對新知／變化時，無法如年輕人般處理得當。²⁴³ 除了老化外，海瑟愛（Heather Love）認為朱伊特（Sarah Orne Jewett）的作品將原先被社會邊緣化的老處女形象，從一種傳統上被視為負面的孤獨與匱乏象徵，轉化為具有深度情感和生命力的個體。透過對孤獨和渴望的精確刻畫，賦予了老處女形象全新的意義。孤獨不再僅僅是一種痛苦的缺乏，而是一種美學與倫理的實踐。這些女性的內心世界充滿動力與可能性，她們的孤獨與情感成為挑戰既定社會秩序的力量，並塑造出一種有能力、有價值且充滿生命力的存在模式。重新審視非正典的生命經驗，並賦予其歷史與文化上的

²⁴¹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334。

²⁴²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326。

²⁴³ 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論老年》（臺北：漫遊者文化，2020）。



重要性。²⁴⁴《樓上的好人》延續海瑟愛的「老處女美學」(spinster aesthetic)，小說中的大姐雖然看似並無智力上的匱乏，然而，當其面對逾越異性戀正典化框架外的事物時，不知所措的舉動，正是焊接老化及窮困的雙向性，突顯出老化、非婚作為社會上他者的形象出現。同樣地，同性與同性結婚一事亦是外溢於異性戀正典化的婚姻模式。《樓上的好人》中員林的性別規範以異性戀正典化呈現，不僅以男性的視角為衡量基準，更是以異性戀、已婚，育有婚生子女的雙親作為典範的家庭模式，形成梅耶里(Serena Mayeri)所謂的「婚姻至上論」(marital supremacy)，強調婚姻在法律上的偏好，同時包括婚姻關係優於非婚姻關係、成婚家庭優於非婚家庭的二元化婚姻論述。²⁴⁵更加排除酷兒群體於員林及婚姻制度兩個場域上的資格，使得無論是單身女性、單身／非單身酷兒產生自我規訓的效果，這些控制不僅來自於法律及社會規範，同時也來自於受法律及社會規範制約的父母／家庭，因此也讓大姐不時地意識到這些標籤時，產生心理及身體上的恐懼。大姐及小弟在這些大蠹的網羅下，進而無法辨識彼此因社會及家庭關係所產生的創傷，遑論修復的可能。這同時也意味著，小說中小弟及大姐的修復動能與家庭暴力／異性戀機制／婚姻至上論／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之間的複雜化動態關係。

《樓上的好人》中，故事以大姐為躲避大弟的債主而避難到柏林的小弟家，及美麗紀錄每一位「好人」特徵的金色筆記本為兩條主要敘事線，本章將前者稱之為柏林敘事線，後者則為筆記本敘事線。整本小說與文本中不斷提及的《新天堂樂園》(Nuovo Cinema Paradiso)相呼應，該電影於一九八八年上

²⁴⁴ Heather Love, "Gyn/Apology: Sarah Orne Jewett's Spinster Aesthetics,"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Vol. 55, No. 3-4(2009): 305-334.

²⁴⁵ Serena Mayeri, "Marital Suprem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onmarital Famil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103, No. 5(2015): 1277-1352. 時至我書寫本碩士論文的2024年10月25日，臺灣已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賦予同性在「結合關係」的權益及「準用」部分《民法》條款的可能。然而，《民法·婚姻章》並無明確解釋「婚姻」的目的及何為婚姻，根據〈司法院釋字第554號解釋〉及《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婚姻分別指：「一夫一妻為營永久共同生活，並使雙方人格得以實現與發展之生活共同體。因婚姻而生之此種永久結合關係，不僅使夫妻在精神上、物質上互相扶持依存，並延伸為家庭與社會之基礎。」；「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映，劇情主要描寫沙瓦托（Salvatore Di Vita）因故友的去世決定回到離開多年的故鄉，西西里島的吉安加村（Giancaldo），進而重新修復童年時的創傷及心願。《樓上的好人》雖然與《鬼地方》及《新天堂樂園》的旅程方向相反，乃由原鄉員林逃離至異鄉柏林，而非一貫以異鄉回歸原鄉的敍事順序，但它們的共通之處仍然是透過回憶及物質性記憶的方式嘗試修復童年時的創傷。

正如小說內容及張文薰所指出，《樓上的好人》中的小弟依靠不辨性向、不識創傷的姊姊從「笨」中覺醒，進行修復。得確，在大姐不斷地反思童年家庭生活及成年工作環境中的家庭暴力／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面向，並在德國旅程的碰撞中得以修復。《樓上的好人》透過這種不斷地藉由自我批判及自曝其短的方式推進情節，並以此方式達到修復自我及他者的創傷狀態，創傷狀態指得是在創傷事件發生後，透過對事件的捕捉、聯想、濃縮，甚至美學創作，事件本身被轉化為一種特定的形式。這種創傷狀態被視為想像中的創傷性，並非僅因其實際帶來的傷害，而是在這種狀態下，集體身分受到侵害，個人的安全感也因情感和文化結構所提供的支持而動搖。²⁴⁶ 文本中的大姐遊走於自我批判與修復的看似分斷卻曖昧的關係中，如何超溢父權視角機制？並進而以建立在自我反思的行為達到修復目的。本章節試圖藉由《樓上的好人》中的物質性動態親密關係，探討在時間、空間及文化層面上的差異中，如何啟動大姐修復的條件。美麗、大姐及小弟間的動態關係，也在不同的基礎上產生差異，重新賦予非正典性的各種可能，追索並深化非正典修復一詞的理論意義。

大姐與在德國遇見的查票員Carsten在暫借小弟的家中發生性行為，在過程中大姐聯想到到小時候的某個好人曾送來一桶泥鰍，媽媽將粗鹽塗抹在泥鰍身上，泥鰍會在瘋狂抖動的過程中，將身體裡的穢物盡數吐出，之後便可在清洗後料理。大姊將與查票員Carsten的性行為比喻為離水泥鰍在被抹上粗鹽後的劇烈掙扎。面對彼此「非正典」的身材：隆起的肚腹、短小的陰莖、乾癟的乳

²⁴⁶ Jeffery Alexander,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6-30.



房、稀疏的陰毛、濕潤的腋下，在身體的親密接觸中，藉由經驗及肉身的自曝其短，「我不介意你的疤，你不在乎我的老朽」，兩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鬆弛，頓悟出沒有人需要為了自己的屁聲或鬆垮而道歉。在極盡能事地自曝其短中，藉由這種自曝經驗及肉身的「缺陷」，修復以往因各種層面的非正典性而造成的創傷。²⁴⁷ 大姐因「處女」、「非婚」、「老化」、「醜」、「笨」等標籤被排除於員林的正典女性中，甚至也被親生母親質疑長這麼醜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但在德國的短暫闕限時空（liminal time and space）中，²⁴⁸ 瞬間抽離原鄉員林的異性戀正典化規範，卻也並非如同小弟一般欲長居柏林，因而形成一種介於正常、日常文化及社會狀態以及維繫法律及秩序的過程之間的狀態，打造諸多可能性發生的條件。這種闕限時空也提供異性戀正典化的破口，埋下日後大姐藉由這種時間、空間及文化上差異的暫時狀態，提供非正典修復的契機。

多方面的文化衝擊、童年記憶的發明，使得大姐在不同時間段中的自我產生糾纏，自曝身體／經驗「缺陷」的修復方式實則逾越自我與社會結構間的二元化關係，《樓上的好人》重新賦予原先被認為是負面意義價值事物的能動性。小說的情節與《新天堂樂園》一樣，是一部「返鄉」，重新揭開創傷的作品，銜接《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藉由這種重揭傷疤的實踐，見證逝去的記憶，修復情感。重新審視那些原先違背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的記憶，在看似內耗至極之際，反因過於執著這些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的教條式社會規範，同時藉由柏林異國經驗的實踐，而出現失控與破口，因而指向開放性契機。如此而觀，小說的創傷修復正如張文薰所言，陳思宏小說中的弟弟，時常藉由看似愚笨姐姐的覺醒，進而達到彼此的和

²⁴⁷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256-265。

²⁴⁸ 闕限時空（liminal time and space）指得是在過度的過程中，處於懸置的生活邊緣，不僅在時間及空間上如此，情感上的多種可能狀態也在此過程中發生。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60. 詳參第三章〈闕限時空的幻滅：《佛羅里達變形記》的酷兒生存戰術〉。



解。這種象徵社會及家庭的正典化規範下的修復實踐，實則突顯出在共生過程中的酷兒生存戰術，非正典修復的雙向性即是：一方面源自於因童年的家庭創傷與成年後工作場域的焦慮而導致的共享修復感覺結構，另一方面則通過其自身來處理這個感覺結構。

第二節、非正典修復的動態關係

親密關係的修復建立在關係性的動態考察中，正因為小說自身就是一部完整的有機體，具有連續及完整性的意義，並且在各個部分：包括事件、對話及描述，都應該緊密結合，以共同表達小說本身的視角和主題。小說的完整性基於其內部元素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特性，而呈現出一幅虛構化現實的生活圖景。²⁴⁹ 因此探討小說及角色的方式，不能忽略現實自我與之前的自我在「時間性」上的差異，而這兩者的辯證關係，便建立在動態的關係性之上。「關係性」（relationality）作為哲學概念的闡述，可由懷海德（Alfred Whitehead）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過程與現實》（*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開始討論，他曾明確以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的角度切入，反對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哲學的「先驗主體」，認為我們所描述的物質身體的主要構成，實際上是由真實事件之間的內在關係所建立。²⁵⁰ 巴芮德為區分「互動」（interaction）假設在互動之前先驗單獨的個體能動，也就是笛卡爾的先驗主體，使用「網內互打」（intra-action）的概念，表示糾纏能動的相互構成，強調不同的能動並不先於其內部行動，而是透過其內部行動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能動僅在關係意義上而非絕對意義上有所不同，也就是說，能動僅在相互糾纏方面有所不同，並不作為單獨的元素存在。²⁵¹ 正如哈洛威認為關

²⁴⁹ Walter Besant and Henry James, *The Art of Fiction*. (Boston: Capples and Hurd, 1884), 51-85.

²⁵⁰ Alfred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eds Donald W. Sherburne and David Ray Griff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

²⁵¹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係是最小的分析單位般，²⁵² 個體並無法也不該進行分析，現象的成立是建立在經歷不同的條件轉變中，時間、空間和物質在此也共同化成。²⁵³ 因此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也在條件的轉變中一併共構，如此而觀，親密關係不僅是主體與主體間的互動關係的關於存有及生成模式的本體論定義，同時也是透過行為及符號感知的認識論，甚至是認知及創造動態經驗的方法論。

在《樓上的好人》中，原住於彰化縣員林市的大姐，面對大弟在外欠債，及黑道債主的暴力脅迫，而前往德國柏林的小弟家居住，暫避風頭。在此旅程中，大姐隨身攜帶的金色筆記本，不斷召喚美麗、大姐、大弟和小弟仍然一起住在員林鐵支路旁兩層樓的記憶。筆記本中的每一節都記載著一個好人的特徵及關鍵字，其中的故事也逐漸推進小說的情節發展。小說藉由「員林xx號男人」與阿拉伯數字「01、02、03」的兩類標題將柏林的敘事線與金色筆記本中記載的童年記憶分成兩個敘事線。兩條敘事線雖在事發時間線上不同，但卻是環環相扣的一體，筆記本敘事線似乎在為柏林敘事線作註解，提醒讀者關注小說中的「時空物質化」（spacetime matterings）概念，²⁵⁴ 面對童年員林與成年柏林情感糾纏的差異，也形成在不同的條件的轉變中，不同的時間、空間和物質的共同化成。²⁵⁵ 筆記本記錄中的大姐，生活在一個傳統且性別刻板的臺灣社會，不僅此時的主流性別價值參與父權結構的運作，大姐也時常在規訓的網羅之下，陷入自我批判的情結當中，正如在美麗槍殺性侵小弟的債主猩猩後，小弟因創傷而逃出家門，大姐獨自一人前往地下道尋找，並在兩人因大雨受困地下道時，向小弟傾訴對不起自己長太醜，要是好看一點猩猩就會選擇我了。²⁵⁶ 筆記本敘事線的情節中仍埋藏著同樣情節，包括在小弟被認為是鋼琴神童，而

²⁵²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²⁵³ 張君玫，〈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頁174。

²⁵⁴ Karen Barad, “Diffracting Diffraction: Cutting Together-Apart,” *Parallax* Vol 20(3)(2014): 168-187.

²⁵⁵ 張君玫，〈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頁174。

²⁵⁶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309-321。



將被送往臺北深造時，鎮長與全家一起拍攝的大合照中抹除了大姐的存在。²⁵⁷尤其大姐與小弟一起看的第一部電影：《蘇菲雅的選擇》，更是傳遞出母親在選擇女兒抑或兒子的兩難中，最終選擇兒子的後二戰電影。²⁵⁸然而，在小弟逃家的當天，大姐與小弟約好一起看《新天堂樂園》時，實則正如電影的預言，早已埋下兩人重返這趟創傷記憶的種子。

柏林敘事線及筆記本敘事線的交錯來回，鏈接上不同時空背景的大姐，使得兩個虛構的真實產生呼應，而過去在員林的童年記憶，也經由筆記本的記載及在柏林敘事線產生的條件得以被發明。對於柏林敘事線的大姐而言，柏林的經驗看似是一個現在的真實的經驗，然而，「實在的真實性」並非先驗般地存在，而是為了區分與之而言那些較不真實的經驗而存在的形式。²⁵⁹筆記本敘事線則是一個被發明的記憶，過去的經驗已成為記憶，大姐在思考筆記本中的紀錄時，重新發明了這些童年時所發生的事件，創造了可以與現在時空對話的「被發明的記憶」，但在面對現在所處的實在性經驗時，過去的經驗似乎屬於較為不真實的經驗。然而，大姐並沒有意識到這兩者的區別，因此虛構的真實性及現實的虛構性兩者共同疊加到柏林敘事線上，而所謂的「真實」經驗的「真實」也不再有一個明確的對立，兩者的疊加也促成反思在時間性上的動態關係條件。大姐在柏林的搭車經驗中想起影展得獎片的歐洲電影，眼前的柏林景象彷彿就是那些「瞎剪胡扯」的歐洲電影：站起來尿尿的男人、兩個穿著修女裝的男性在面前忘情的舌吻、比基尼女郎、比基尼男士、在座位上軟骨功的女孩、拿出吊床綁在車廂拉環上的年輕人、拿出針筒注射手臂的男孩、舔座位地板的男孩。一系列看似荒誕的景象正在柏林的大眾運輸上上演，尤其是在得知小弟要跟男人結婚的消息時，更使得大姐想起在臺灣參加的遊行，由於參加

²⁵⁷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98-104。

²⁵⁸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79-86。

²⁵⁹ Elena Esposito, ‘Fiktion und Virtualität’, in *Medien – Computer Realität*, ed. Sybille Kräm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98), 269-296.



基督教團體的緣故，大姐曾參加過幾次反同遊行，並在課堂上不小心說出反同言論，因而受到學校訓斥，從此更加沈默，跟學生更加疏離。但在柏林的經驗後，大姐在修復的過程中自問「小弟，我懂了，你大姐就是笨，美麗說得對，我笨死了，跟人家說我大學畢業沒人相信。但我現在懂你的感受了。我怎麼可以說你變態。他憑什麼說你變態不正常。」在反思過往經驗的同時聽到裸體阿嬤阿公唱的歌：

Ich war noch niemals in New York
Ich war noch niemals auf Hawaii
Ging nie durch San Francisco in zerrissenen Jeans
Ich war noch niemals in New York
Ich war noch niemals richtig frei
Einmal verrückt sein und aus allen Zwängen fliehen

我還從來沒去過紐約
我還從來沒去過夏威夷
也從來沒穿著破牛仔褲到舊金山走走
我還從來沒去過紐約
我還從來沒真正自由過
瘋狂一下，掙脫所有的束縛²⁶⁰

小說及歌曲的呈現看似大姐在員林倍受束縛，而到柏林後便豁然開朗，立刻曉得員林及家庭中的性別暴力和對於同志的壓迫，傳遞出線性進步史觀及殖民主義的意味。然而，這卻是柏林經驗的條件使得在虛構的真實性及現實的虛構性相互疊加，時空物質化的化成作用在柏林敘事線上，方才使得大姐的非正典修復得以成立，若沒有員林記憶與柏林經驗的動態考察，加上柏林的怪誕經驗作為條件，修復行為便無從可能。

美麗與大姐、小弟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樣也是推進情感修復的重要因素。美麗在小說中扮演著從事性交易並因此扶養大姐及小弟母親，但由於其執業的特質，同時導致大姐及小弟受到校園及家鄉群眾的霸凌，致使大姐在美麗死後還

²⁶⁰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105-119、273-284。



打算訂大蛋糕及珍珠奶茶慶祝「鐵枝路邊的美麗終於死了」。²⁶¹ 在德國旅程遇見的白色睡衣瘋女人同樣使大姐想起母親的形象，母親會不時地謾罵大姐：「但誰知道生下妳這個倒霉鬼」、「幹，我當初把妳丟掉就好，醜死人。生下來幹嘛。幹」、「三個爸爸，就妳的最醜啦。胸部小不要怪我，去怪妳的水電工」。²⁶² 甚至在大弟的債主找上門時，欲選擇與一個小孩發生性行為以抵押大弟的債款時，母親也將大姐推入火坑，宛如《蘇菲雅的選擇》再現般，在兒子及女兒的兩難抉擇中，仍然需要親手扼殺其中一個。即使債主猩猩做後仍選擇小弟進行償還，並進一步造成小弟的童年性創傷，但美麗的選擇仍然讓大姐留下被厭惡的陰影。《樓上的好人》中的母親角色美麗逾越了典型母職的論述，而以身體及情感上的「偏離，瘋狂、憂鬱、情慾旺盛、守墓般懷抱無法釋懷的舊日戀情、壞掉的、歪掉的、莫名其妙等等媽媽狀態」示現，然而，正如劉人鵬所言，與其使用「母親神話的破滅」進行文本及人物批判，不如依據節情，說明小說中孩子角色對於潛在的「死媽媽」（The Dead Mother）依戀，更能貼近文本，宛如鬱結般的眷戀與失落並非耽溺於對於母愛缺席的情感癱瘓，反而賦予小說中角色更為深厚的動態親密關係。大姐及小弟面對美麗並不是一味地歸咎責任，而更是在複雜的情感依戀中展演修復的劇碼。²⁶³ 正如小說中：「她（大姐）苦笑，她跟美麗有什麼差別？美麗藏匿頭髮集塵袋，金色筆記本裡集滿一生個著男人。她這個大女兒還不是搜集了一堆爛東西。她曾發誓說絕對不要跟美麗一樣。結果還不是這樣。」²⁶⁴ 並在此時，披露出美麗真正的死因是被白色Toyota撞死，面對創傷的修復、母親的死亡，大姐拋下一切的行李及包包，衝入濃霧之中，盡情狂奔、盡情飛舞。對於媽媽的依戀情感，也在動態的

²⁶¹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126。

²⁶²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170-171。

²⁶³ 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心不在焉的母親與家庭親密關係想像：動漫與文學作品中的「死媽媽」〉，《中外文學》，43（3）（2014），頁139-174。

²⁶⁴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325-328。



親密關係中進行修復，經歷德國旅程的洗禮，重新思考活在正典結構中的非正典生活、容貌及行為。

小說結尾，大姐和小弟一起用手機觀看《新天堂樂園》的預告片，當電影的鋼琴配樂流出時，所有的記憶都湧上了姐弟的心頭，正如小說所說：「想起了，原來根本沒忘」。²⁶⁵ 小弟逃至柏林，嘗試以空間的距離拉開與童年創傷的關係，卻始終無法修復自童年而起的一系列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及性暴力的壓迫。大姐卻在仍然厭女的員林中，發芽出修復情感的「網內互打」動能，並在看到手機裡傳來大弟的訊息時將其都進垃圾桶，最後回到臺灣時，碰巧遇見刀疤好人，被問到「妳怎麼還在這裡？」時，她回應什麼都不要，並衝進濃霧中，無事一身輕。

眾角色在父權結構中所受到的壓迫，也呼應現實社會以更加幽微的男性特權呈現。一系列女性主義運動的演化及法律改革、工作環境、生育權等釋憲也促使女性抑或多元性別權利更加受到重視，當代臺灣酷兒文學的繁複綻放，也更朝向多元化當代思潮的反芻，建立臺灣文學的在地酷兒脈絡。同婚於二〇一九年的通過，看似完成同志及邊緣族群權益的跨時代里程碑，實際上則關鍵地反映了全球化的政治部署的「同性戀正典化」（homonormativity）²⁶⁶ 批判及臺灣內部反同團體所形塑的反挫力量。斯貝德（Dean Spade）透過量化數據研究同婚通過後對福利法案的影響，指出當同性戀權利話語使用統計數據將同性戀描述為「良好父母」，從而獲得同性伴侶的認可和利益時，實則是討論「養育子女」資格的問題。這些主張在實質上支持了種族國家的規範，導致黑人父母、在監獄中的父母、原住民父母、貧困父母以及身心障礙父母被兒童福利體系關注並加以監控。²⁶⁷ 延續交織性的視角，大姐在正典結構中生存，卻在柏林

²⁶⁵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頁321。

²⁶⁶ 關於同性戀正典化（homonormativity）的相關討論可參考本論文緒論。

²⁶⁷ Dean Spade and Rori Rohlfs, "Legal Equality, Gay Numbers and the (After?)Math of Eugenics," S&F ONLINE: The Scholar and Feminist Online, October 23, 2023. Legal Equality, Gay Numbers and the (After?)Math of Eugenics



的闕限時空中產生自我內反的破口，以非正典的各種特質及標籤在柏林敘事線與筆記本敘事線中來回穿梭，體現出異質文化、異質空間、異質時間的能動糾纏，具有鄭芳婷評論《花開時節》時所謂的「高度『自反』（reflexivity）及在地屬性的實踐行動。」²⁶⁸ 特質，並非以現代性思維下的線性進步史觀思考柏林比員林更加開放及進步，而是在重新部署這一系列的記憶及經驗後，選擇以修復的行為處理這段記憶。大姐以身在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的社會結構中，不斷地反思自我的非正典性及建立此中的動態親密關係，將原先被視為負面的非正典特質轉化為修復的動能，以體現修復行為的不同可能及多種面向。

呼應海瑟愛以污名（stigma）為「連線政治」（coalition politics）的基石，質疑同性戀正典化所忽略的酷兒落後（backwardness）經驗，披露酷兒群體中的非正典群體正遭受仍然偌大的壓迫。進而以性與障礙為例，說明酷兒作為連結一切對抗正典及承載歷史創傷的不同群體之間的符碼，結合被社會汙名且產生落後感的群體，形成污名的連線政治。²⁶⁹ 柯恩（Cathy J. Cohen）強調交織性的重要性，關注性／別、種族、階級如何動態地調節不同個體間的區別。亦呼籲不同身分政治、不同壓迫系統間的聯盟，以「改革性連線政治」（transformative coalition politics）為連結基礎，提醒我們社會規範類別中的權力差異，及共同抵抗所具備的潛力，進而透過這種認識，創設一種新的政治形態：「改革性連線政治」。²⁷⁰ 海瑟愛及柯恩皆嘗試放下身分政治的包袱，聯手不同性／別、種族、階級及壓迫體系，共同抵抗權力的壓迫。陳思宏的小說同樣展演跨越不同邊緣性之間的串連，無論是《鬼地方》中的陳天宏與姐姐、《佛羅里達變形記》中的龍子龍女，一直至我直接說明非正典性之間動態關係

²⁶⁸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銚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2020），頁93-126。

²⁶⁹ Heather Love, *Feeling Backward: Loss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²⁷⁰ Cathy J. Cohen,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3(4)(1997): 451-452.



聯盟的《樓上的好人》，都在在呈現出身分政治界線的流動，以酷兒為公約數，團結進行最具動能的抵抗／生存戰術。

第三節、結語：陳思宏的自我修復

經歷一系列德國旅程的洗禮後，這個時間段的大姐早已不是原先「不辨性向、不識創傷」的大姐，而是在「自體」反思中進行修復，這兩個時間段的大姐，亦非早於德國旅程的先驗主體而存在。反倒是由德國旅程的現象，進而在動態互動的關係中進行能動的糾纏，兩者能動的差異並不意味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因為能動本身並不作為單獨的元素存在，因此兩者能動的差異僅擁有不同的糾纏過程，也就是面對不同的時間性、物質性、空間性上的體現模式差異。

由此，《樓上的好人》指出時間、空間和物質在尺度差異的動態演化過程。小說本身就是一部完整虛構化現實的有機體，角色也非一成不變地貫穿某種單一性格及遭遇，而是在具備不同能動糾纏模式時的情動反思。作為一種修復方法《樓上的好人》將歷史性和差異性融入文本及理論本身的實踐中。揭示德國旅程前的大姐及德國旅程後的能動糾纏差異，其自體內反的修復過程形塑時空物質化的抵抗戰術。誠然，員林仍然是員林、柏林仍然是柏林，然而，正因美麗、大姐及小弟的情感糾纏，複雜化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與角色的能動糾纏，不僅拆解異性戀父權機制中的正典結構，更揭示建立在此背景中的能動性如何以非正典的感知方式突顯源自於因非正典創傷與焦慮而導致的共享修復感覺結構，並以此自身渣滓重建感覺結構。

陳思宏出生於永靖，並在此生活至高中畢業後，前往臺北求學。對他而言，永靖的保守氛圍令其深感壓抑，當地的正典性別觀強調父權體制下的重男輕女，並推崇婚姻與生育的異性戀時間性。此外，性別與身體的本質化規範，



以及將同性戀視為禁忌的荒謬現象，進一步構成了他所面對的社會壓力。²⁷¹ 面對各種非正典的酷兒創傷記憶，陳思宏試圖透過文學書寫進行探索與解決。然而，針對個人的童年經驗，他認為並沒有正確的答案，甚至在某些時刻，他認為「不和解才是小說創作的核心目的」。²⁷² 他藉由小說作為媒介，深入探究不和解的根源。因此，書寫對他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過程。對於陳思宏而言，他的創作並非旨在原諒他人或尋求被原諒，而是要揭露那些無法與不願被和解的故事及其背後的原因。

《樓上的人》同樣是陳思宏修復及披露過程的創作之一，過去的記憶並沒有過去，而是經由現實中自我的想像，重新創造出屬於小說的虛構的現實，突顯出陳思宏書寫小說的創作母題：角色們不斷地想逃離童年的創傷及原鄉的束縛，並在尋找自由及和解的可能性中，重新回顧這段創傷的起源。²⁷³ 對於這段創傷的理解，陳思宏並沒有答案，甚至認為「不和解才是寫小說的目的」，²⁷⁴ 《樓上的人》的創作並非提出理解創傷的答案，而是回顧整段歷史，並理解創傷形成的原因，其中，關於婚姻平群的創作動機是陳思宏「想知道一個來自員林的小家庭如何面對這個撕裂社會的議題，以及，一個女性為何想加入反同陣營？」²⁷⁵ 陳思宏認為這些反同的女性都是受異性戀正典化所排斥及壓迫的女性，將教會視為家庭的延伸，進入如同婚姻般令人不解的體制中，舒緩在原先婚姻中的孤寂感，同時做著不明究理的事。因此即使這些女性反過頭壓迫酷兒的權益，但那些對於酷兒的怒吼，轉化為「不用好看，不用瘦，不

²⁷¹ 陳思宏，〈第九個身體〉（臺北：九歌，2018），頁10-119。

²⁷² 蔣怡婷，〈他與德國男友登記為伴侶 姊弟互虧都是為了愛〉，《鏡週刊》（2024年9月28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5>）。

²⁷³ 蔡孟哲，〈酷兒創傷與歷史修復——簡評陳思宏的《鬼地方》（兼及《夏日三部曲》）〉，《臺灣出版與閱讀》，23（2023），頁96。

²⁷⁴ 蔣怡婷，〈他與德國男友登記為伴侶 姊弟互虧都是為了愛〉，《鏡週刊》（2024年11月17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5>）。

²⁷⁵ 翟翹，〈《樓上的人》作者陳思宏：我寫女性都希望她們能盡最大力量違反「原廠設定」〉，《鏡文學》（2024年11月17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5334>）。



用結婚，不用溫柔，不用體貼，不用當母親」，顛覆了原先對於女性的刻板想像及期待，進一步理解這些女性的選擇，呈現其最柔軟最無所畏懼的一面，即使和解並非最後的終點，但對於非正典修復的披露，也使得這段創傷得以修復。尤其《樓上的好人》藉由大姐為象徵，似乎小弟的酷兒創傷已退位為次要論點，但兩者的修復實踐皆建立在與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相佐的非正典性之上，在美麗、大姐、大弟及小弟身上共同生成彼此的創傷模式及修復可能，突顯動態親密關係中的情感糾纏。陳思宏也在修復大姐及小弟的同時，藉由小說的創作，修復自我童年的創傷，透過文學的虛構性，展現了心中及小說中的酷兒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描繪酷兒主體在嚴苛的生命境遇中，如何於幻滅後的孤島上奮力掙扎，緊握如同短暫花火般的希望，體現出堅韌不拔的生命力。

第五章、結論：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



遺憾是很強大的力量，推我們前進。明明走不下去了，用盡全身力氣，孤單腐蝕，但還找不到，還沒親眼看到，還沒說出那句真心，還沒喝到那一碗湯，只好起身，繼續……帶著遺憾與孤單，出門去，走到出汗，回家洗個澡，躺下，開始數穿山甲，好好睡個覺。一，二，三，四，五。醒來，我們全身都是穿山甲鑽出的洞。千瘡百孔。我們散步去。

——《第六十七隻穿山甲》²⁷⁶

陳思宏的小說以極富情感深度的筆觸，揭示了酷兒群體在臺灣社會中的集體創傷與生存困境，同時也開啟了文學作為修復實踐的可能性。他的作品並不僅僅停留於壓迫的描述，以再現的方式重述生活中的「現實」，而是試圖透過對情感結構的捕捉，重塑酷兒群體的歷史記憶與社會關係。這種重塑過程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後同婚時代，修復是否真的可能？如果可能，它又應該如何進行？

修復作為情感的政治實踐，其核心在於將創傷轉化為行動的契機，而非終結或純粹懸置的過程。在《鬼地方》中，陳思宏不僅刻畫了原鄉的主流性別文化如何壓迫酷兒的肉身性與身分政治，還描繪了酷兒主體如何在集體記憶中找尋自身的修復策略。不訴諸弭平創傷的修復打破了「創傷→修復→和解」的線性和解路徑，嘗試一種不斷試探和重構的情感過程。這種過程不僅拒絕了線性進步的時間觀，並提出了一種酷兒時間性：創傷不會被遺忘，而是作為抵抗的能量被持續帶入當下與未來的行動中。

陳思宏的小說同時體現了一種修復的動態倫理，挑戰了傳統修復論述中「創傷終結」的假象。在文本中，記憶與創傷並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持續在個人與集體的層面中流動。以《鬼地方》為例，故鄉的形象既是酷兒群體創傷

²⁷⁶ 陳思宏，《第六十七隻穿山甲》（臺北：鏡文學，2023），頁333-334。



的源頭，也是其情感抗爭的主場。小說中的角色透過重新審視故鄉的記憶，逐漸認識到修復並不等於與壓迫和解，而是與過去進行具有張力的對話。這種修復的動態性讓我們重新思考，酷兒群體如何在矛盾中生成能動性。修復過程中的不和解，是文本的核心重點之一。陳思宏並未嘗試提供「最終解決方案」，而是選擇揭示酷兒主體如何在壓迫中尋找可能性，甚至將矛盾視為生存的必要條件。這樣的修復不僅是個體情感的療癒，更是一種挑戰壓迫性規範的政治行動。

修復的另一個重要層面是對內部困境的反思。酷兒群體內部的「正典化」現象，揭示了修復的雙向性：它既可以是解放的工具，也可能成為新的壓迫形式。正如《樓上的好人》中呈現的，酷兒主體在試圖修復自身創傷的同時，也面臨著群體內部的階層化壓迫：異性戀機制／菁英主義／容貌正典化促使酷兒被視為正典及非正典的代表，形塑新的二元對立關係。這種正典化危機曝露出酷兒群體內部的異質性及多元性。修復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同時抵抗外部壓迫與內部階層化，而不失去其本身的多元性。

總結本論文所提出的三種情感修復理論框架：集體酷兒修復、酷兒生存戰術及非正典修復。首先，「集體酷兒修復」是一種建立在酷兒時間性與集體記憶交織之上的修復模式，拆解「創傷→修復→和解」的和解時間性邏輯，《鬼地方》的文本結構正展現了這種拒絕和解化修復的敘事策略，尋求酷兒群體的情感修復以建立記憶的連結，拒絕單一的創傷來源真相，允許創傷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時間之中，在流動的記憶中持續被重新理解。「集體酷兒修復」不僅能夠挑戰異性戀霸權下的歷史敘事，使酷兒創傷不再被視為需要被遺忘或掩蓋的過去。另外，更透過見證與擬造，使創傷成為一種共享的情感資源，這種共享的過程不僅有助於酷兒群體內部的情感聯繫，也為酷兒文學提供了一種集體性的記憶場域，使文本本身成為修復的一部分。更進一步，這種修復方式更具備政治行動性，它提供新型態的創傷修復範式，拒絕和解作為終點，延伸至社會文化層面，促使讀者重新思考修復的意義，它不再是為了回到某種完整



的狀態，而是在不完整之中尋找生存的路徑。因此，「集體酷兒修復」不只是對創傷的回應，更是一種文化實踐，使酷兒記憶得以在文學與社會層面持續運作，成為抵抗異性戀霸權的一種方式，也為酷兒群體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未來。

而「酷兒生存戰術」是一種針對結構性壓迫與社會規範的主體性實踐，它不僅是對於異性戀霸權、階級再製與社會規訓的逃逸戰術，更是透過在邊界處的生存，創造出新的可能性。這種生存戰術並非單純的反抗或顛覆，而是一種在社會規範與個體慾望之間協商與調整的動態過程。這種戰術回應了霍布斯坦的（Jack Halberstam）「酷兒時間」，即酷兒生存方式在異性戀時間性（heteronormative temporality）的斷裂處尋找生存的可能。這樣的酷兒生存戰術帶來的效果，不僅在於它挑戰了主流異性戀社會對於「成功生活」的定義，也為酷兒群體提供了一種心理及生命存活的可能性。小說並未提供一種單一的、理想化的酷兒未來，而是揭示了在社會壓迫與創傷之下，酷兒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連結，繼續存在於不斷變動的社會結構中。這種戰術並非純粹的逃避，而是一種對於當代酷兒生命經驗的實踐與回應。在酷兒面對家庭暴力、異性戀正典化、線性史觀等壓迫時，酷兒生存戰術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抵抗方式，透過不完全顛覆結構、但又不完全服膺規範的曖昧戰術，尋找一種生存的縫隙。《佛羅里達變形記》所展演的酷兒生存戰術，並不是一種可預測的、系統化的抵抗模式，而是如安清所說的「非縮放性」（nonscalability），它無法被直接轉化為一種固定的政治方案，而是透過個體與群體的偶然選擇，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中形成的特定策略。

最後，「非正典修復」指得是一種不依賴於傳統和解路徑、偏離主流正典規範的修復模式，強調透過個體與群體的自我覺察、情感糾纏與關係性動態來重新調整創傷記憶，而非將修復視為通往某種既定的和諧或完整狀態。《樓上的人》透過柏林敍事線與筆記本敍事線的交錯鋪陳，展現了修復並非單向的過程，在時間、空間與文化差異的條件下，讓個體在非正典的情感與關係中重新審視自身的創傷經驗，進而發展出新的生存戰術。這種修復方式不試圖抹去



過去的痛苦，而是藉由非正典的身體經驗、異質文化的碰撞、家庭與親密關係的重新審視，來發掘在現存規範之外的修復可能。非正典修復帶來的效果，不僅僅在於個體層面的療癒，更在於它如何挑戰既有的修復框架，提供酷兒文學與創傷書寫不同的觀看視角。它拒絕線性時間性與異性戀規範下的救贖敘事，而是將修復視為一種無法徹底完成、但持續進行的動態過程。透過大姐的自體反思與親密關係的轉變，小說展示了修復不一定要回歸社會認可的正典框架，而可以在偏離主流的生命經驗中尋找新的修復可能性。非正典修復是一種建基於異質文化、非主流身體經驗與動態親密關係的修復模式，它不試圖復原創傷所造成的缺損，而是透過重新發明記憶、在動態的關係中尋找情感連結來達成修復的可能。

修復在當代框架下成為一種歷史性的動態情感，透過記憶的回顧與當下的重構，提供新的身分框架及聯盟。這種根基不僅依賴於個人經驗的重構，還包含了酷兒群體在社會邊界的自我確認，其核心在於將過去創傷性的記憶與當下情境進行對話，並藉此提供新的身分框架及聯盟網絡。陳思宏的小說借由對酷兒身分的深入刻畫，以不同的敘事策略揭示酷兒群體的創傷經驗與修復可能。小說中的人物往往身陷孤立與矛盾的情感困境，其生命經歷交織著家族、社會與國族的創傷記憶。這些作品不僅描寫了異性戀家庭結構對酷兒主體的壓迫，也通過角色的內在掙扎與外部聯結，刻畫出酷兒群體如何在既定的社會秩序中尋求情感重建。作品中屢次提及的回憶片段，無論是家庭暴力、性別壓迫還是跨世代的沉默創傷，都將個體經驗融入更廣闊的歷史敘事之中，揭示了酷兒情感如何在集體記憶中找到安放之處，這不僅是酷兒文化的豐富性所在，更為酷兒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隨著文學創作的推進，酷兒情感修復的圖景仍然在不斷拓展。陳思宏的最新作品《第六十七隻穿山甲》仍然為這一主題帶來新的視角，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於酷兒生存戰術的理解。故事描寫異性戀女主角與同性戀男主角在年幼時因共同拍攝床墊廣告而相識的愛恨糾纏，對比一樣的素材，描寫容貌正典的網



羅，但這次女主角卻是擁有符合大眾規範的典型女明星，卻仍然深受正典的束縛。時間段也是建立同婚通過後的背景下，但當女主角的小兒子參與同志大遊行的現場時，卻傳來基督教團體向身為政治人物的父親告狀，小兒子向父親控訴他也經常出席同志大遊行，卻換來父親的政治語言回應。一切在看似較為性別友善的2024年的臺灣中，各種壓迫的系統及機制都以幽微的方式，變相地將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包裹於正典／非正典中，並對酷兒群體進行更加強烈、更加不可見、更全面性的迫害。因此「看不見的負面處境」（the negative status of what cannot be seen）²⁷⁷ 的這種細緻體現，以及消極對待這種負面處境的論述，更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面向。呼應本論文緒論「第一節、自由與困境：在同婚通過時」的「同志婚姻通過後的困境」，亦正如《第六十七隻穿山甲》所述：「她想到自己參加的婦女組織，請江海濤來演講，題目是兩性平等。哈哈哈，法律增修了，性別平等了，新時代，女人男人平等，同性戀可以結婚了，世界從此太平，哈哈哈，再也沒有性別失衡性別歧視，手牽手邁向美好的燦爛明天。」²⁷⁸ 而這位江海濤便是小兒子的政治人物父親，「哈哈哈」充滿著對於壓迫系統的訕笑及嘲弄，諷刺性演講更加突顯出實際生活與演講內容有多麼巨大的斷裂。

我提出「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作為酷兒文學情感研究的研究框架，嘗試以臺灣當代酷兒文學的脈絡回應全球理論中未能充分處理的在地化與文化差異性問題。我提及臺灣酷兒文學受到的歷史與文化條件影響，尤其是在解嚴後至同婚通過這一關鍵時期，臺灣酷兒群體如何從政治邊緣走向相對中心，這一過程中的文化與政治互動。另外，我在緒論曾提及「同性戀正典化」與同婚合法化的同構關係，針對這種文化現象如何在臺灣在地化的脈絡進行具體分析。此中，本文主要的分析對象聚焦於陳思宏的「夏日三部曲」，旁及陳思宏先前出

²⁷⁷ Sue-Ellen Case, *Performing Feminisms: 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and Theat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 Peggy Phelan, *Unmarke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3), 11.

²⁷⁸ 陳思宏，《第六十七隻穿山甲》，頁321。



版的多部短篇小說集及散文。然而，正如上述陳思宏的最新作品《第六十七隻穿山甲》則是本文尚未處理的文本，故事中所呈現的正典化異性戀女性與酷兒的連線政治，延續第四章所提出的「非正典修復」，實際展演各種危脆生命的結盟狀態。此外，本文所提出的論述框架誠然並不侷限於陳思宏的作品分析，其他當代臺灣同志與酷兒文學作品類似議題。比如，楊双子的《臺灣漫遊路》。²⁷⁹ 楊双子的小說以跨域流動為背景，描繪了多重邊緣身分如何在異質空間中形成新的情感聯結與文化實踐。《臺灣漫遊路》通過主角在臺灣鐵道漫遊式的經歷，展現了兩位分別來自臺灣及日本的女性，如何在地理與文化的邊界上追尋自我認同，並通過與其他邊緣群體的交織敘事揭示出酷兒群體在當代臺灣的處境與挑戰。小說中，角色如何跨越地域限制、結盟多元生命的形式亦可呼應本文所論之「非正典修復」理論框架。

另外，除了文學創作外，不同媒介也可能涉及酷兒文學中「情感修復」的相關議題。比如，《勸世三姊妹》²⁸⁰ 音樂劇結合戲劇、音樂與視覺元素的形式，以臺灣的牽亡歌為基礎，融入現代音樂劇的元素，重新詮釋酷兒主體在歷史與文化中的位置。《勸世三姊妹》描繪三姐妹闊別多年後重歸故土，回到雲林虎尾村老宅，陰錯陽差地捲入牽亡歌陣傳人的爭奪中，展現了創傷、邊緣身分與情感修復的多層次動態。這部音樂劇不僅挑戰了傳統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更透過音樂與表演的跨界結合，為酷兒群體在文化實踐中提供了新的聯盟框架。音樂劇中的敘事結構以多重時空交錯的形式展開，呈現角色在家族創傷與社會壓迫下的情感困境。這種非線性的敘事方式類似於陳思宏小說中「闕限時空」的處理，通過打破現實時間的邊界，讓角色的過去與現在得以對話，從而促進情感的重建。《勸世三姊妹》的文化背景與表演形式也提供了另一種「地方化修復」的實踐策略。音樂劇在處理臺灣歷史與文化創傷時，結合了在

²⁷⁹ 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臺北：春山出版，2020）。

²⁸⁰ OPENTIX，〈躍演《勸世三姊妹》中文音樂劇〉（2024年12月16日，參考來源：<https://reurl.cc/Egolzm>



地性的牽亡歌美學，突出酷兒群體與地方文化之間的對話關係。這種在地性實踐不僅強調了酷兒修復的地脈絡，也為全球化語境下的酷兒文化生產提供了一種反向的在地回應，與陳思宏小說對於地方創傷的刻畫相輔相成。最後，音樂界藉由牽亡的展演，從中修復生命裡的諸多缺憾，渡化命運給予她們的大小關卡。

總結上述情感修復在各種媒介的展現，情感修復作為酷兒文學的重要主題，不僅在陳思宏的作品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也在其他當代作家的創作與跨媒介的文化實踐中得到多樣化的呈現。此中，修復的實踐並不局限於文字敘事，跨媒介的創作形式，包括電影、戲劇、音樂，甚至數位媒體，都為修復主題提供了全新的表達方式。透過視覺、聲音和表演等多元媒介，酷兒文化實踐進一步突破了文字敘事的限制，賦予修復更為豐富的身體性和感官衝擊力。因此，情感修復的研究不僅限於個體文本或單一媒介的分析，而是涉及跨作家、跨媒介乃至跨文化的多層次探索。這種多元敘事與文化實踐反映了酷兒主體對壓迫性結構的挑戰與超越，同時展現了修復作為一種情感與社會策略的豐富可能。本文受限於篇幅，未能將這些跨域文本納入討論，但未來的研究若能進一步關注修復在不同文化與媒介中的互動，將有助於深化對酷兒文學及文化實踐的理解，並為修復理論提供更多跨領域的視角與啟發。

另外，關於理論輸入的文化動態影響也是本論文力有未逮，但企圖在未來持續深化的部分。誠然，臺灣酷兒文學深受美國理論（如賽菊寇的修復性閱讀）的啟發，但我主要針對「同性戀正典化」及「情感修復」的輸入過程的地化機制進行分析。此中，臺灣酷兒文學中的地方性敘事策略，例如幽默、魔幻與荒誕，如何在修復理論中與全球理論接軌，進一步拓展文學與文化的敘事邊界，這些都是修復理論的關鍵議題。將臺灣的修復經驗視作在地性創傷的途徑，如何與「全球酷兒研究」產生批判性的對話，當中除了反思「同性戀正典化」及「情感修復」的地脈絡外，其中諸多的面相同樣是未來可能持續深化的研究。另外，本論文處理修復理論對交織性的應用主要性別、階級和酷兒視



角探討創傷修復，但對其他交織性因素，如種族、階級、身心障礙與性別壓迫的聯動分析亦尚未完備。特別是在臺灣多元文化的語境下，原住民酷兒群體的特殊經驗，跨性別者在「同性戀正典化」下的邊緣化，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議題。例如《鬼地方》中角色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階級是否影響其創傷經驗與修復路徑？這種可以藉由移居德國的修復方式，是否也建立在經濟資本的優越之上？或者，陳思宏作品中的酷兒主體，是否在修復過程中同時體現了階級與性別壓迫的多重疊加性？這個問題也涉及到酷兒內部壓迫結構的批判，也就是同性戀正典化導致酷兒內部的邊緣化問題，《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和《樓上的好人》都涉及到主角「陰柔」與「娘」的刻板特質，進而可能遭受霸凌。這反映出在臺灣酷兒社群中，「陽光健康」的同志形象是否壓制了「陰柔」、「娘」等不符主流審美的酷兒主體？這種內部文化壓迫如何在修復理論中得到處理，也應成為一個核心議題，不停留純粹批判及修正的態度。由此延伸伸出的修復的過程是否可能對其他邊緣群體，如未婚者、未婚母親、跨性別者、非二元性別者，而形成新的譏斥，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總結上述，文化與歷史脈絡的深化、以及交織性分析的拓展，乃是本文目前侷限，亦是未來發展的願景。這些歷史與文學在情感結構上的沾黏及修復過程中的權力結構檢視則是未來可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部分。因此，本論文將來的發展，可更跨領域地結合史料研究、跨文化比較以及多重壓迫軸線的深度文本分析，進一步深化理論的批判性與適用性，從而使「承載集體創傷的修復」不僅成為一種在地性理論，也能對酷兒研究議題提供更具批判力的素材與工具。

臺灣酷兒文學，作為全球酷兒文學場域中一個獨特的存在，具備挑戰既存理論框架的潛力。陳思宏的小說改編為戲劇的跨媒介轉譯，亦更加深化不同感官的衝擊，而臺灣文學跨文化的轉譯過程呈現出一種雙向的文化交流，既將在地經驗帶入國際場域，也借助全球化語境重新詮釋在地文學的內涵，²⁸¹ 同樣

²⁸¹ 張俐璇，〈台灣文學轉譯初探—以桌遊《文壇封鎖中》為例〉，《文史台灣學報》，15（2021），頁181-216。



地，臺灣酷兒文學通過修復集體創傷，展現出其超越地方性書寫的潛力，成為挑戰異性戀霸權與內部壓迫的重要文化實踐。這是一個不斷延展的故事，不僅預示著臺灣酷兒文學在未來的多樣性和可能性，同時也預言了更加全面及隱微壓迫的危機。這些文本不僅書寫著創傷與壓迫，更承載著對自由和認同甚至生存的深切渴望，讓酷兒群體在無數次的創傷、修復、生存、認同中，一次次充滿情感地擁抱並串連無畏的希望。



參考文獻

- 中央選舉委員會，〈107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結果〉，《中央選舉委員會》（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www.cec.gov.tw/upload/file/2018-12-03/9617f16e-8616-42d9-b052-a6efa6595712/c0e7ec8903c018054138e2f7b5a409cc.pdf>）。
-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2003）。
- 王鈺婷主編，〈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
- 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閻翊均、廖珮杏譯，〈性 / 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臺北：時報出版，2023）。
- 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申昀晏譯，〈危脆生命〉（香港：手民出版社，2023）。
- 左眼看世界，〈在今日台灣，如何當個左派？〉，《苦勞網》（2025年4月12日，參考來源：<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9228>）。
- 史書美，〈跨界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3）。
- 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發表於黃美娥主持，比較視野的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課程演講）（2025年2月21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 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著；林浩立、謝孟璇譯，〈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論資本主義廢墟中生命的可能性〉（臺北：二十張出版社，2024）。
- 任杰，〈同性婚姻合法化歷程：美國經驗，臺灣借鑒〉（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2016）。
- 李奇紜，〈男同志的網路交友文化及其潛在的數位性暴力〉，《性別平等教育



- 季刊》，93（2021），頁31-37。
- 寺尾哲也，《子彈是餘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
- 阮劇團，〈鬼地方〉，《阮劇團》（2023年11月20日。https://ourtheatre.net/2023_ghost_town/）。
- 邱美衡，〈地方、空間、創傷記憶敍事／陳思宏《鬼地方》的家鄉書寫〉（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 邱貴芬，〈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
- 邱錦添，〈台商在大陸包二奶所衍生之法律問題〉，《市師社教學報》，2（2003），頁57-72。
- 季季，〈【第十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廁所裡的鬼 評審意見〉，《自由副刊》（2023年12月28日。<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839323>）。
- 何玟珒，〈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臺北：九歌，2022）。
- 吳哲宜，〈台大經濟系學生「歧視政見」遭炎上 系上教授首發聲！3點譴責：我們的教育沒做好〉，《風傳媒》（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795390>）。
- 吳瑞元，〈正在創造的歷史- 介紹台灣現代同志情慾運動〉，《史匯》，2（1997），頁103-107。
- 汪宏倫，〈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文化研究》，19（2014），頁189-250。
- 林佩苓，〈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林瑋嬪，〈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臺北：春山出版，2023）。
- 法務部，〈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23年10月20



- 日，參考來源：<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B0000008>）。
- 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二〇二二年增訂版〉（臺北：玉山社，2022）。
- 周婉窈，〈光，遮蔽，及其再現：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年回顧與省思〉，
《臺灣與海洋亞洲》（2024年9月5日。<https://reurl.cc/6dvodZ>）。
- 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論老年》（臺北：漫遊者文化，2020）。
- 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
向度》（臺北：群學，2009）。
- 紀大偉，《酷兒啟示錄：當代台灣 QUEER 論述讀本》（台北：元尊文化，1997）。
-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 紀蔚然，〈閹限概念與戲劇研究之初探〉，《考古人類學刊》，88（2018），
頁9-34。
- 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2)。
- 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2002）。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2006）。
- 范綱皓，〈同志的「厭女」情結：交友軟體上的拒C文化〉，《性別力
GENDER POWER》（2023年10月20日，參考來源：<https://reurl.cc/Q5XAGZ>）。
- 酒井直樹，〈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30（1998年6月），頁205-236。
- 高行健，〈文學的見證——對真實的追求〉，《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



- (2006) , 頁165-174。
- 孫梓評紀錄，〈【自由副刊】尊重小說的技藝 - 第八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決審會議紀錄3之3〉，《自由副刊 文學庫》（2025年1月24日。<https://art.ltn.com.tw/article/paper/637274>。
- 耿曜；林琮盛，〈全球化背景下的兩岸關係與台商角色〉，《中國大陸研究》, 48(1) (2005) , 頁1-28。
- 陳昭如，〈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思想》, 23 (2013) , 頁207-233。
- 陳昭如，〈非婚法學——婚姻之外的（不）平等〉，《台灣法律人》, 3 (2021) , 頁1-18。
- 陳佩甄，〈「褲兒」生存模式：《誰在找麻煩》和《日常對話》中的酷兒時間與修復轉向〉，《文化研究》, 31 (2020) , 頁7-42。
- 陳佩甄，〈愛的文化政治：台韓現代親密關係的殖民系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2023）。
- 陳佩甄，〈冷戰的感覺結構：台韓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與情感政治（1950-1980）〉（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
- 陳佩甄，〈弱重思女性同性親密性：台灣歌仔戲和韓國女性國劇文化再現中的性身分政治與情感聯盟〉，《中外文學》, 53(2) (2024) , 頁99-138。
- 陳信傑，〈柴貓、夢的浮艇與德魯伊〉（臺北：啟明出版，2020）。
- 陳思宏，〈指甲長花的世代〉（臺北：麥田，2002）。
- 陳思宏，〈叛逆柏林〉（臺北：健行，2011）。
- 陳思宏，〈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臺北：健行，2014）。
- 陳思宏，〈去過敏的三種方法〉（臺北：九歌，2015）。
- 陳思宏，〈第九個身體〉（臺北：九歌，2018）。
- 陳思宏，〈鬼地方〉（臺北：鏡文學，2018）。
- 陳思宏，〈佛羅里達變形記〉（臺北：鏡文學，2020）。



- 陳思宏，〈叛逆柏林（增訂新版）〉（臺北：健行，2020）。
- 陳思宏，〈樓上的好人〉（臺北：鏡文學，2022）。
- 陳思宏，〈第六十七隻穿山甲〉（臺北：鏡文學，2023）。
- 陳思宏，〈社頭三姐妹〉（臺北：鏡文學，2025）。
- 陳思宏，〈陳思宏【2020金典年度大獎】〉，《臺灣文學獎》（2023年11月13日）。<https://award.nmtl.gov.tw/information?uid=4&pid=1819>。
- 陳彥仁，〈邁向酷兒荒謬：臺灣當代大眾文化生產中的國族與性別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 陳昱勳，〈2020台灣文學金典獎 陳思宏《鬼地方》獲年度大獎〉，《自由時報》（2023年11月13日。<https://art.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341773>）。
-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
- 馬翊航，〈山地話／珊瑚化〉（臺北：九歌，2020）。
- 馬翊航，〈假城鎮〉（臺北：九歌，2024）。
- 許振傑，〈台灣中南部大學生之性別意識、語言性騷擾知覺及語言性騷擾態度之關係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2021）。
- 曼恩（Kate Manne）著；巫靜文譯，《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
-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王紹中譯，《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時報出版，2020）。
-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林志明譯，《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臺北：時報出版，2022）。



- 曾國祥、徐斯儉主編，《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臺北：左岸文化，2012），頁181-231。
- 程廷Apyang Imiq，《我長在打開的樹洞》（臺北：九歌，2021）。
- 張君攷，《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臺北：群學，2023）。
-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
- 張誦聖，《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
- 張俐璇，〈重慶之民，自由之國：「後1949」臺灣小說中「民國文學機制」的承繼與演繹〉，《中國現代文學》，26（2014），頁89-105。
- 張俐璇，〈台灣文學轉譯初探—以桌遊《文壇封鎖中》為例〉，《文史台灣學報》，15（2021），頁181-216。
- 曾秀萍，〈鄉土女同志的現身與失聲：《失聲畫眉》的女同志再現、鄉土想像與性別政治〉，《淡江中文學報》，35（2016），頁1-35。
- 曾秀萍，〈身障·底層·跨世代：周美玲《漂浪青春》中的同女漂浪與女同志情慾實踐〉，《臺灣文學學報》，44（2024），頁37-65。
- 楊双子，《花開時節》（臺北：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2017）。
- 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臺北：春山出版，2020）。
- 楊隸亞，《男子漢》（臺北：時報出版，2022）。
-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銳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7（2020），頁93-126。
- 鄭芳婷，〈純真早就滅頂了評陳思宏長篇小說《佛羅里達變形記》〉，《聯合文學》（2023年11月12日，<https://www.unitas.me/archives/20448>）。
- 鄭芳婷，〈臺灣當代劇場內捲景觀的後殖民根源與批判芻議〉，《戲劇研究》，33（2024），頁123-156。



鄭芳婷，〈影子戰術：台灣當代數位創作的修復性幽默〉，《中外文學》，53(2) (2024)，頁17-54。

賽菊寇 (Eve Kosofsky Sedgwick) 著；林玉珍譯，《閨櫃知識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24）。

蔣怡婷，〈陳思宏專訪菜市場巧遇當年愛過的男孩 他感受青春流逝嚎啕大哭〉，《鏡週刊》（2023年10月26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4>）。

蔣怡婷，〈文學獎百萬獎金得主憶兒時 全家11口擠進4人座裕隆轎車〉，《鏡週刊》（2023年11月19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2>）。

蔣怡婷，〈他與德國男友登記為伴侶 姊弟互虧都是為了愛〉，《鏡週刊》（2023年12月27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10225pol005>）。

蔡孟哲，〈酷兒創傷與歷史修復——簡評陳思宏的《鬼地方》（兼及《夏日三部曲》）〉，《臺灣出版與閱讀》，23 (2023)，頁96-101。

潘柏霖，《藍色是骨頭的顏色》（臺北：尖端，2019）。

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心不在焉的母親與家庭親密關係想像：動漫與文學作品中的「死媽媽」〉，《中外文學》，43 (3) (2014)，頁139-174。

劉乃慈，《奢華美學：台灣當代文學生產》（臺北：群學，2015）。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58 (2015)，頁101-128。

劉文，〈評《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帝國、酷兒時間、置疑同志主體〉，《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3 (2018)，頁127-134。

劉文，〈非西方、亞洲或中美冷戰結構？重置酷兒臺灣的戰(暫)時主體〉，



《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6（2021），頁3-35。

劉文，〈弱情感與「新冷戰」：美中臺地緣政治衝突下的網路迷因與中介情感〉，《中外文學》，53(2)（2024），頁55-98。

劉亮雅，《後殖民與日治記憶：二十一世紀台灣小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趙帝凱，〈華語語系台灣鬼魅敘事的性別與家國：以聶華苓、李昂與陳思宏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華語文教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

羅逸晉，〈存在之匱乏：論拉岡「慾望原因」之概念〉（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及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

Agamben, Giorgio,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gamben, Giorgio, Heller-Roazen, Daniel(Trans.),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Ahern, Emily, *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Ahmed, Sara, *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hmed, Sar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Alexander, Jeffery,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Atshan, Sa'ed, *Queer Palestine and the Empire of Critique*.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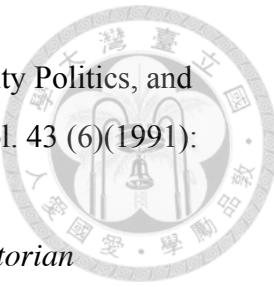
Authors, Many, "Ghost Town," Goodreads, November 20, 2023.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57680782-ghost-town?from_search=true&from_srp=true&qid=ln3WFicwbg&rank=5.



- Baker, Peter C. , "Title of Article or Page,"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2023.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0/books/review/kevin-chen-ghost-town.html>
- Barad, Karen,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Barad, Karen, "Diffracting Diffraction: Cutting Together-Apart," *Parallax* Vol 20(3) (2014): 168-187.
- Berlant, Lauren, *The Queen of America Goes to Washington City: Essays on Sex and Citizenship*.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erlant, Lauren, Michael Warner, "Sex in Public, " *Critical Inquiry*, Vol. 24, No. 2(1998): 547-566.
- Berlant, Lauren, 'The Subject of True Feeling: Pain, Privacy and Politics',in *Transformations: Thinking Through Feminism*, ed. S. Ahmed, J. Kilby, C. Lury, M. McNeil and B. Skeggs (London: Routledge, 2000), 33-47.
- Berlant, Lauren,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urgerlijk Wetboek November 11, 2024. <https://wetboekplus.nl/burgerlijk-wetboek-boek-1-artikel-30-huwelijk/>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Butler, Judith,"Agencies of Style for a Liminal Subject," in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ed. Paul Gilroy, Lawrence Grossberg and Angela McRobbi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30-37.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 Butler, Judith,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 Case, Sue-Ellen, Performing Feminisms: *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and Theat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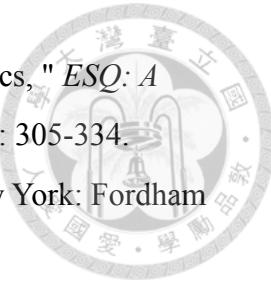
- Chambers- Letson, Joshua, *After the Party: A Manifesto for Queer of Color Life.* (New York: NYU Press, 2018).
- Chang, Doris, Women'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Taiwan(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 Chen, Chao-Ju, "Catharine A. Mackinnon and Equality Theor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ed. Robin West and Cynthia Bowman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171-187.
- Cheng, Fan-Ting, "Towards a Queer Island Disidentification of Taiwan," *Golden Bough Theatre'sPirates and Formosa*, Vol. 28(2014): 427-441.
- Cheng, Fan-Ting, "Visioning a queer documentary: Huang Hui-chen's *Small Talk*, "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Vol. 34(2020): 530-542.
- Chiang, Howard, and Alvin K. Wong, eds.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Chiang , Howard eds. *Queer Taiwanese Literature: A Reader*(Amherst: Cambria Press, 2021).
- Cho, John (Song Pae), “ ‘Deferred Futures’: The diverse imaginaries of gay retirementin post-IMF South Korea,”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Vol 58(2)(2017): 243-259.
- Clarke, Mollie, "'Queer' history: A history of Queer," The National Archives, November 20, 2024. <https://blog.nationalarchives.gov.uk/queer-history-a-history-of-queer/>.
- Cohen, Cathy J.,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 Vol. 3 (1997): 437-465.
- Collins, Patricia Hill, *Intersectionality as Critical Social The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Crenshaw, Kimberlé,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Vol. 1989, Issue. 1(1989): 139-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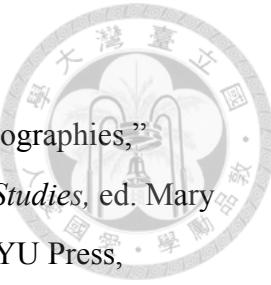
- Crenshaw, Kimberle,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43 (6)(1991): 1241-1299.
- Cvetkovich, Ann, *Mixed Feelings: Feminism, Mass Culture, and Victorian Sensational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Cvetkovich, Ann, *An Archive of Feelings: Trauma, Sexuality, and Lesbian Public Cultur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vetkovich, Ann, *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Duggan, Lisa,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 Duong, Kevin, "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Intersectionality?" *Politics & Gender*, Vol. 8(3)(2012): 370-386.
- Durkheim, Emil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Edelman, Lee, *No future: Queer Theory and the Death Dr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Esposito, Elena, 'Fiktion und Virtualität', in *Medien – Computer Realität*, ed. Sybille Kräm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98), 269-296.
- Freeman, Elizabeth, *Time Binds: Queer Temporalities, Queer Histo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Foucault, Miche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Ethics: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Ed. Paul Rabinow*.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223-252.
- Fotopoulou, Aristea, "Intersectionality Queer Studies and Hybridity: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for Social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13 (2)(2012): 19-32.
- Gayed, Andrew, *Queer World Making: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ern Diasporic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Edinburgh: University



- of Edinburgh, 1956).
- Gorton , Kristyn, "Theorizing emotion and affect: Feminist engagements," *Feminist Theory*, vol. 8(3) (2007): 24, 334-335.
- Halberstam, Jack,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alberstam, Jack, *The queer art of fail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Haraway, Donna,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 Vol. 14(3) (1988): 575-599.
- Haraway, Donna,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 Hung, Hsiang-Ting, Social media as participatory art—— the collective practice of Kevin Chen' s Facebook page.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29th Annual Conference Taiwan Studies Matters: Worlding the Contested Frontier (New York City, USA: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 CUNY, 2024).
-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R. Price(Cambridge: Polity, 2014).
-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I*,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Cambridge: Polity, 2015).
- Lauretis, Teresa de,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 An Introduction," *Differences*, Vol. 3(2) (1991): iii–xviii.
- Li, Wen-chi, "Made in Taiwan: Reading Chiu Miao-chin's Lesbian Tales as World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ed. Pei-yin Lin and Wen-chi Li (London: Bloomsbury, 2022), 171-187.
- Liu, Wen, "Pandemic paranoia: Toward a reparativ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psyche, " *Psychoanalysis, Culture, & Society*, 26(4)(2021): 608-622.
- Liu, Wen, Facebook (2025年4月11日。<https://reurl.cc/YYezOX>)。
- Love, Heather, *Feeling Backward: Loss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ove, Heather, "Gyn/Apology: Sarah Orne Jewett's Spinster Aesthetics," *ESQ: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Vol. 55, No. 3-4(2009): 305-334.
- Malabou, Catherine, Steven Miller(Trans.), *The New Wounded*.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ayeri, Serena, "Marital Suprem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onmarital Family, "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103, No. 5(2015): 1277-1352.
- Manne, Kate,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Muñoz, José Esteban, *Disidentification: Queers of color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Ngai, Sianne, *Ugly Feel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Nyong'o, Tavia, *Afro-Fabulations: The Queer Drama of Black Lif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8).
- Olick, Jeffrey,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OPENTIX, 〈躍演《勸世三姊妹》中文音樂劇〉 (2024年12月16日, 參考來源 : <https://reurl.cc/Egolzm>
- Otis, Hailey Nicole,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ort Collin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021).
- Phelan, Peggy, *Unmarke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3).
- Rofel, Lisa,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Rowe, Sharon, "Modern Sports: Liminal Ritual or Liminoid Leisur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Vol 12(1)(1998): 47-60.
- Savci, Evren, *Queer in Translation: Sexual Politics Under Neoliberal Isla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Schechner, Richard, *Performanc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77).
- Schechner, Richard, *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 Pennsylvania Press, 1985).
- Schweighofer, Katie, "Rethinking the Closet: Queer Life in Rural Geographies," in *Queering the Countryside: New Frontiers in Rural Queer Studies*, ed. Mary L. Gray, Colin R. Johnson, and Brian J. Gilley (New York: NYU Press, 2016). 223-243.
- Sedgwick, Eve Kosofsky,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Sedgwick, Eve Kosofsky,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hin, Layoung, "Avoiding T'ibu (Obvious Butchness): Invisibility as a Survival Strategy among Young Queer Women in South Korea," in *Queer Korea*, ed. Todd A. Henr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95-322.
- Spade, Dean and Rori Rohlfs, "Legal Equality, Gay Numbers and the (After?)Math of Eugenics,"S&F ONLINE: The Scholar and Feminist Online, October 23, 2023.
- Tsing, Anna Lowenhaupt,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 Turner, Victor, *The Ritual Proces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 Turner, Victor, "Frame, Flow and Reflection: Ritual and Drama as Public Liminality," *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Vol 6(4)(1979): 465-499.
- Turner, Victo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Whitehead, Alfre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eds Donald W. Sherburne and David Ray Griff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
-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Wiegman , Robyn, "The Times We're in: Queer Feminist Criticism and the Reparative 'Turn,'" *Feminist Theory* 15(1)(2014): 4-26. doi: 10.2307/2504889
- Wolf, Arthur,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edited by Arthur Wol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182.

Zankar, Rajesh Dattatray, "Queer Literature: A Glocal Over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Publication and Reviews*, Vol. 4(7) (2023): 953-957.

